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邓小平复出后首次亮相

台湾「二二八」亲历者的评说

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就难前进

吴江：平心论胡适

我敬仰东林党又痛具愚顽

2003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总第96期

炎黄春秋

英 杰 谱

- 2 邓小平复出后首次亮相……………宋毅军 邵桂花

求 实 篇

- 7 台湾“二二八”起义亲历者的评说……………吴克泰
14 平心论胡适……………吴 江

春 秋 笔

- 22 胡耀邦最后的27个月……………张黎群
28 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廖盖隆

群 言 堂

- 33 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就难前进……欧远方
38 诚信如金……………郭毅生

亲 历 记

- 40 “四人帮”最后一次反扑……………张根生
42 “关系牌香烟”报道始末……………陈英茨

耻 辱 柱

- 45 杀害项英的凶手刘厚总……………徐则浩

古 镜 台

- 50 我敬仰东林党又痛其愚顽……………刘志琴

人 海 浪

- 54 学者·大师·革命家黄侃……………高 文
56 妇女运动先驱者李文宜……………茅于兰

文 荟 苑

- 61 彦涵夫妇携手共沉浮……………康胜利
66 台湾百岁女作家苏雪林……………沈 晖

两 岸 情

- 72 孙中山四处台湾……………何 标

九 州 景

- 75 一座牌坊 三个时代的缩影……………赵友慈

编 读 窗

- 78 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熊向晖
39 读第一期后的几点意见……………王 荆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 绳
陈 沂 杜润生 赵朴初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镏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法律顾问: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美术设计\激光照排:

北京瑞和轩盛经济信息咨询中心

紫东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邓小平复出后首次亮相

□ 宋毅军 邵桂花

“文革”初期被打倒了的邓小平在 1973 年戏剧性地复出，曾使中外惊讶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之后，1973 年戏剧性地突然露面，曾使中外惊讶，舆论关注。

这年的 4 月 12 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宴会，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当时，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邓小平：“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还说他“只身孤影，缄默无声”。其实，这位记者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因为邓小平的复出，符合中国人民的心愿，他内心也一直洋溢着能重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焕发的欢快。

1950 年就同邓小平相识的阿沛·阿旺晋美，曾到钓鱼台对面邓小平复出后居住的一幢公寓里拜访，邓小平很

高兴，乐观坦城地对这位老朋友说：“我这几年在下面过得很好，你看我的身体不是还很健康吗？我过去学过钳工，后来干革命，手艺生疏了……”随后，他不无幽默地说：“这几年又干钳工，还学到了不少新技术，这也是一件好事。”

阿沛·阿旺晋美说，“文革”初期红卫兵还未来得及批判他，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了下来。邓小平不由得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你是进了保护伞，对你这样的人是应该保护的。”接着邓小平又说到自己：“我也是得到主席和总理保护才活下来了。

送我到外地一个小地方，也是一种保护。”

邓小平还特意会见了已故元帅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

邓小平对生死与共数十年的罗荣桓表示深切怀念。他对跟着林月琴前来探望的孩子们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对时时关心自己的老部下，总是宽慰地说，他在江西工厂锻炼时没干扰，啥事都没有过，身体也很好。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

决定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前，毛泽东写信告诫江青“不要反对”。周恩来抱病主持这项筹备工作

1974年4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当一年前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采取了石油提价的措施，这表明了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可以说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以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一着重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会议，与会者大多为各国首脑。

会议本身重要，我国由谁率团出席的问题既重要又敏感。当时，周恩来病势加重，全国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国外纷纷猜测中国政坛上的格局变化。可见，由谁率团出席这次会议，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为各方面所瞩目。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此前，他们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使重病中的周恩来政治处境更为艰难。在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江青等虽暂时收敛了气焰，但眼见率团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有空子可钻，便力图把他们帮派中的人推出来。

3月20日，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呈送到毛泽东面前。年迈的毛泽东仔细地审阅报告，当即拍板：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同时，他又觉得有必要再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于是，他嘱咐：这件事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在外交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来，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此时，江青也在揣摸毛泽东的意向。这一天，她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会面。毛泽东看穿了江青求见的真正意图，立即写信答复：“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写到此，毛泽东觉得还未达意，随即又批评道：“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江青在毛泽东处吃了闭门羹却仍不醒悟。3月24日，周恩来接到了外交部重新写给党中

央、毛泽东的报告后，立即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也圈阅了这份报告表示同意。但是江青却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蛮横地要求外交部撤回这份报告。周恩来只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份报告。

3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举行，由于会前周恩来做了工作，除江青外的与会政治局委员都赞成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江青一看自己彻底孤立了，在会上吵吵闹闹，声称对这件事“保留意见”。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以沉默态度相对。会议的情况于第二天汇报到毛泽东处，他感到很恼火，本来他已决意让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只是为了听听大家的反映才不便明说。可是在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已经同意他的意见后，江青还在胡闹。于是，他马上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这当头棒喝，使得江青不得不在当晚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意见时，表示同意。

小平同志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作出国准备。虑事缜密的周恩来，嘱咐安排好小平等同志的安全工作，并要求在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文革”期间老俩口相依为命

邓小平认为，出国准备工作“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他在联合国首次提出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诺言

3月底的一天，外交部长乔冠华带领凌青等人，到邓小平住处请示出席联大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乔冠华首先关切地问：“邓副总理身体怎么样？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一向不把自己生活待遇放在心上的邓小平神态自若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在座的人都面面相觑。

邓小平却直入正题：“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话仅一句，就概括他数十年的外交工作经验，特别是他60年代起数次率团去莫斯科同苏共谈判的经验。

代表团同志为发言稿再次来向邓小平汇报时，邓认为他的想法同代表团起草发言稿的同志，不谋而合，即除了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

原来，这几天他经常想起这样一件事，一个多月以前，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亲切友好的谈话中毛泽东讲：“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毛泽东解释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当对方表示同意自己的分析时，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邓小平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委会主席布迈丁时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邓小平认为，如此重要的内容，必须利用联大这一国际舞台向世人宣布。

发言初稿很快起草完毕，邓小平决定用一天时间和外交部同志一起修改。念一段，议论一段，逐段讨论。中午就在讨论的地方用餐。邓小平和大家一样，也领得了一份菜饭。

在讨论发言稿的结束语时，邓小平胸有成竹地提出：“应该讲这样几句话：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侮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邓小平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上述话的，在座的人都感受到了一个政治家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心中骤然升腾起强烈的震撼力。当凌青记下这几句话时，邓小平又嘱咐了一句：“你就这样写，不必改。”后来，邓小平在联大上用这种语言首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

4月初，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接连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的发言稿，讨论批准代表团在联大期间的工作方针。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却借口“有病”请假，拒不参加会议。4月3日和4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联名致信给毛泽东，简要报告联大发言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于4日收到报告后，对发言稿等表示满意，于是，他在这份第六稿的发言稿上批示：

“好，赞同。毛泽东”

为了防止江青等人将来再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邓小平、乔冠华，转告毛泽东的批语，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成员传阅后归档。

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讲话令联大会议会场为之震撼。一顿晚宴的直接会谈，改变了基辛格对邓小平的看法

4月6日上午7时许，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仍抖擞精神跨上红旗牌轿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聚集了数千人的队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欢送仪式。

邓小平紧握着既是兄长又是战友的周恩来的手。

想到他为自己能在这一国际外交舞台上出头露面而殚精竭虑，一向很少外露情感的邓小平禁不住眼睛湿润了。

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世界各国代表团纷沓而至，而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则显得不急不缓。邓小平率团与会，已为各国的消息灵通人士所探明，但邓小平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有极少数资深的政治家才心中有数。至于涉足外交舞台不深的外交官员们，心里则是一片茫然。甚至连当时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也对邓小平知之甚少。

就是在这种窃窃私语的议论声中，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了纽约。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坛。

然而，基辛格等人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11年后，他坦率地讲对邓小平的当时印象：“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4月7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达纽约，4月9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开幕。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副团长乔冠华、黄华沉稳地坐在座位上。仔细倾听着别国代表的发言。

4月10日下午，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到了。随着主持会议主席的宣布，邓小平步履矫健地走到了演讲台前。他深沉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下会场，脸上浮现出平和、沉静的表情，给翘首以待的与会者留下从容老练的印象。特别是当他翻开讲演稿开始一般性辩论发言时，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和旁听的众多记者，刹那间感受到了一位高瞻远瞩、经验丰富的老政治家、外交家的倾人魅力。

首先，邓小平分析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指明了国际关系变化中的“实际上存在着的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

只见邓小平抬起头，面向大会主席说：“主

席先生，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他抬高声音说：“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论断性的语言真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讲话风格 and 特点。

邓小平双手撑在讲台上，两眼注视着会场，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会场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听到这里非常高兴，觉得邓小平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邓小平的长篇精彩发言结束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很多国家的代表、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走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前，和邓小平团长以及乔冠华、黄华副团长热烈握手，表示祝贺。连少数敌视中国的国家代表，也不得不从内心对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的发言感到钦佩。

此后的一个星期里，邓小平分别拜会或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代表。

值得提出的是，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举行宴会招待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美国的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温斯顿·洛德等待客人邓小平、乔冠华、黄华坐好后，也一一落座。然后，宾主寒暄一阵，共同举杯祝酒。

由基辛格出面主持的这次宴会，看起来是一般礼仪中的相互往来，实际上主要是要与邓小平商谈中美两国关系如何实现正常化。所以，宴会的欢快气氛中又包含着拘谨、严肃。但是，邓小平应付自若，柔中有刚。

开始，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为美中两国实现正常化竭尽全力，“但一时想不出办法

来”。他说完此话后，眼镜后的两只眼睛注视着邓小平的面部表情，试图寻找出对方赞许甚至热情的表示来。然而，只见邓小平挟起菜，不慌不忙地送到嘴里，表情也只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邓小平十分清楚：半年前就是面前这位国务卿受尼克松总统委派，第六次来到中国，设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办法，作出了一定的承诺。今天的表示，可能是美国总统又面临了什么新的困难。所以，邓小平不露声色。

无奈，基辛格只好继续讲下去，他说，总统表示要在任期的头两年削弱美军驻台湾的军事力量，美中两国互设联络处；后两年采取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最后是“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既然基辛格已经代表美国政府推出了有步骤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底牌，其中不乏表面上过于主动之意，邓小平应该有所表示了：

“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不卑不亢、不急不缓地回答，令基辛格暗暗称赞。

途经巴黎，买了上百个 羊角酥分赠当年同在法国的 同志。有识之士评说，邓小平 是周恩来“最好的代理人”

4月16日晚，邓小平、乔冠华乘坐的专机，在茫茫的夜空中东行，离开了纽约，离开了美国国境，第二天上午，抵达法国巴黎，在归国途中暂作休息。在巴黎期间，邓小平除同乔冠华前往总理府拜会了法国总理梅斯梅尔之外，还特意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陪同前往巴黎市内意大利广场，去查看广场旁边S街5号的一个小咖啡馆。原来，这里是五十多年前邓小平、李富春编印《少年》（后改为《赤光》）杂志的所在地。据蔡畅回忆，在这里“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当时，《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钢板，李富春同志发行。”但是，岁月流逝，景物不再依旧，邓小平触景生情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不能在五十多年前的小咖啡

馆喝咖啡了。”第二天早上，邓小平只好叫使馆的同志到别的咖啡馆买来咖啡给他喝，还叫人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准备带回国分别送给当年同在一起的周恩来、聂荣臻、蔡畅等。

4月19日下午，首都机场上一片欢腾，周恩来、叶剑英等又来到这里，热烈欢迎代表团的胜利归来。在专机旁，邓小平等代表团成员还和欢迎的领导人合影留念。邓小平的右侧是周恩来，左侧是江青。此时的江青身穿灰白色风衣，满脸堆笑，似乎她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国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世界舆论普遍关注着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会议之行。特别是4月10日邓小平的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更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注意到了5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布托总理的情节，并加以议论。他讲：按照多年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坐法，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手一侧，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手一侧（除译员外），但这一次坐在“周恩来座位”上的却是邓小平。周恩来坐在了布托一侧稍远的座位上。

应当说，外国人已经注意到邓小平纽约之行后的政治作用的加强。6月1日，周恩来在等候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归来，又处理完手头几件重要事情后，才同意入院施行手术的。为了确定接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入选，10月4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周恩来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12月下旬，周恩来到长沙面见毛泽东，建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邓小平就是这样在重返政坛后，很快被进一步推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烂摊子”，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

（责任编辑 洛松）

台湾“二二八”起义 亲历者的评说

□ 吴克泰

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更加为国人所关注。《炎黄春秋》编者为满足读者多了解一些台湾历史情况的要求，特邀我在“二二八”起义53周年纪念之际，写一点回忆性的文字。正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北京另一家杂志发表的《救救台湾》的长文。该文在批判李登辉“两国论”的同时，谈到了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但无论述事与评论，我认为多有不当。“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我是台湾《中外日报》记者，恰在台北，第一篇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详细报道，就是我和周青先生合写的。事件后，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并被迫离乡。作为当年参加起义的一分子，我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见闻、感受、认识写出来，以正视听，并求教于方家。

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二二八”起义已经53年了，当时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惨遭国民党军的屠杀，在台湾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是，在台湾近四十个年头的戒严时期中（世界历史上最长的戒严），蒋家父子禁止谈论“二二八”，“二二

八”成了禁忌。台湾人民心中的创伤久久不能愈合。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台湾各界人士的努力，“二二八”的真相才开始点点滴滴地报道出来，随之人们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查公布真相，进行平反、道歉、抚恤。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台湾当局在解除戒严之后，不得不替已故的蒋介石承担罪责，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几年的调查，公布长达500页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并进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立纪念碑等。虽然平反还很不彻底，但台湾民众以史为鉴，开始理性地历史地对待“二二八”，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尽量消弭省籍矛盾，把2月28日定为“和平日”。

回顾当年2月末，正是国共和谈完全破裂，



台北中山堂受降典礼，会场外台湾民众热烈庆祝光复

中共派驻南京、上海、重庆和北平的代表被迫全部撤退，国民党“洋洋得意”、积极部署进攻延安之际，被认为国民党后方一片净土的台湾突然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二二八”起义，起义迅速扩及全岛。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顿时陷于瘫痪。它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蒋介石不得不从大陆调遣重兵，火急赶赴台湾镇压。“二二八”起义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要求进行政治改革，铲除国民党的专政和贪污腐败，实行地方自治。它的性质和当时国统区发生的大小“民变”一样，是官逼民反，反抗国民党的暴政，只是其激烈程度和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其他省份而已。它是台湾史上乃至当代中国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进步的历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我拟分六个小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台湾光复。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苦50年的台湾人民，盼望台湾回归祖国，能够做一等公民，过上幸福生活。想光复之初，台湾万人空巷，通宵达旦，欢庆回到祖国怀抱；张灯结彩，箪食壶浆迎接中国军队和接收大员陈仪等到来。谁能想到盼来的是国民党暗无天日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迎来的是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陈仪其人，原是鲁迅、郁达夫的同乡好友，为人耿直清廉，有事业心，在国民党官僚中是少有的。据说，早在抗战末期，他在重庆就受命筹备接收台湾的工作，制定了一套计划。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朽的与人民为敌的政府，它的反人民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失败。陈仪赴台主政后，失误接踵而至。

首先是没有集中力量抓生产的恢复。光复之初，遭受战争破坏的台湾百业待兴，他没有抓好生产的恢复，面对数十万失业者（当时台湾总人口才六百万），既没有采取辅导就业的措施，又无力救济，造成台湾人民的极大痛苦和不满。

其次是用人不当，不重视台湾人才。陈仪起用的主要干部是他任福建省主席时的老班底。

陈仪的用人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的老班底中不能说全是坏人，但多数还是官僚习气极重的贪官污吏，如专卖局长、贸易局长、台北县长等都是大贪污犯。在这些人的贪污罪行被揭发出来以后，陈仪又没有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惩处，让这些人逍遥法外。中下级干部及军警大都是从大陆各地招募来的，他们以胜利者、征服者姿态君临人民头上，他们欺压百姓，为所欲为。而大批台湾的有用人才却以不懂国语、不会“等因奉此”这一套而被排除在政府机关和官营工矿企业之外。少数被留用的中下级台籍干部的待遇又比外省籍的差一大截，受到歧视。台湾人民对此当然深恶痛绝。

第三是经济政策的失误。陈仪原想筑一道“防波堤”，防止大陆的通货膨胀影响到台湾，防止江浙财阀（四大家族）到台湾兴风作浪。但他该紧的不紧，该松的不松，一误再误。“民以食为天”，大米配给制本来可以延续一段时间，等条件成熟了再放开，以保证人民基本口粮。但陈仪到台之初就废除了大米配给制，大量的大米被调运到内战前线，贪官污吏也偷运大米出台，大赚其钱。结果米价不断飞涨，光复时每斤1.5元的大米，到1947年2月涨到每斤32元，带动各种物价上涨，最后各地发生抢米风潮。他设立贸易局控制对大陆的贸易，剥夺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海的香烟比台湾的香烟质优价廉，陈仪却以香烟专卖为由禁止上海香烟进入台湾，专卖局就到处查缉“私烟”，断了售烟小贩的生计，以此为导火线终于酿成了“二二八”事件。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国民党反人民大打内战的大形势是分不开的。1947年初，国民党的反人民内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迅速贬值，台湾的黄金价格向上海行情看齐，成倍上涨，最后有行无市。金价一涨，各种物价跟着狂涨，许多机关长期拖欠工资，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在台湾采访的南京、上海的记者目睹这种险象惊呼：台湾百病齐发。上海《观察》杂志驻台记者2月2日在一篇通讯中预言：“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动或暴乱的。”面对这种局面，台湾国民

党政府不思改进，反而开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黑名单，包括一批外省籍记者，准备逮捕，陡然增加了社会的紧张气氛。台湾已到了民怨沸腾，一触即发的地步。

所以“二二八”事变的发生有其客观必然性，问题只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规模发生而已。

二、“二二八”事件的两个阶段和责任问题

我认为“二二八”事件应该分成两个阶段看：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2月27日。是夜专卖局缉私人员打昏烟贩林江迈，接着开枪打死路人陈文溪，引起公愤，群众漏夜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严惩凶手。第二天手无寸铁的民众向长官公署请愿时，遇到机枪扫射，死伤多人，愤怒的群众占领广播电台，登高一呼，全岛各地都纷纷起来响应。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惩办凶犯，来纾解群众的情绪，反而宣布戒严任事件扩大。虽然陈仪后来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但实际是虚与委蛇，施缓兵之计。国民党兵仍不断开枪杀人，群众看到“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复杂性（有王添灯那样仗义执言的人士，也有蒋渭川那样的中统、军统人物，多数是地方士绅）、妥协性，认为不能依靠，便为了自卫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正义的。

第二阶段从蒋介石下令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一个宪兵团于3月8日开到台湾，实行血腥镇压开始。国民党军抓住台湾人就杀，从基隆、台北一直杀到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又杀到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台东，杀了上万人，真是血流成河，横尸遍野。一直为民喉舌，受

人尊敬的王添灯、宋斐如以及一批社会名流被暗杀，连尸首都找不到。随后又进行清乡，又捕杀许多人。这一阶段是国民党反人民本性的大暴露，是非正义的、反动的。

至于造成“二二八”事件的责任，我认为事变发生前的责任主要应由陈仪来负。事变中的更大责任则在蒋介石。四年前的夏天，陈仪当年的侍从舒桃（贴身保镖，陈的来往函电都要通过他手）来大陆访问，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长官公署自己有电台，每天都跟南京通报。2月27日晚上，陈仪就电告南京。蒋介石立即回电：‘以强硬手段平息’，3月1日下午一两点，陈仪又电告南京，1日晚蒋介石回电：‘格杀勿论’。”

当时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的何汉文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也说：“二·二八起义开始爆发时，陈仪以为问题不大，所以他在最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市民与经济警察之误会，发生冲突，虽有少数奸徒，乘机滋事，致有死伤，旋即平息。’到3月2日，他看到群众起义斗争已如火燎原席卷全省，方慌了手脚，把事变的酿成说成是由于‘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气。’蒋介石立刻抽调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驻福州的一个宪兵团，限期开赴台湾执行军事镇压。



“二二八”事件时的“台湾省长官公署”，国民党士兵在此楼上向请愿民众开枪射击

何汉文当时曾受“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指派,参加另一位“监察委员”杨亮功的调查,何是了解内幕的。

可以印证何汉文所述的,是当年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副官处处长何聘如所写的材料。他说,1947年3月3日早饭后,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参谋长江崇林电话,叫他到军长刘雨卿办公室开会,说是“奉主席蒋电令”,说台湾乱民暴动,令一四六师、一四五师3月8日前到达高雄,“到台后归陈(仪)长官指挥”平息叛乱。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是3月3日晨之前下达的镇压命令,且陈仪肯定会及时收到。由此也可以推断,“二二八”之后台湾当局搞的缓兵之计,是蒋介石和陈仪共同导演的。

在3月8日大屠杀之后,台北以及台湾各地都有一批社会名流被暗杀,连尸首都找不到。据陈仪侍从舒桃说:“黑名单由各单位提到陈仪那里汇总,统一确定后交参谋长柯远芬。柯再分派给几个单位去执行。”当然也有不少是“先斩后奏”的。既要卸下历史包袱,取信台湾民众,我认为台湾当局应该公布这些档案了。现避居美国旧金山不敢返台的柯远芬,也有责任把事情说说清楚。再者,“二二八”早上,“长官公署”临时调来了卫兵,陈仪准备在阳台上向群众讲话之际,卫兵从“长官公署”顶楼上,未予警告就突然向请愿群众猛烈扫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有权下这个命令的只能是柯远芬。

至于当时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宪兵第四团团长沙慕陶,都因杀人有功受到提拔,尽管他们都已死了,骂名还在台湾人民心中。

三、所谓省籍矛盾与“二二八”的政治诉求

这是关系“二二八”事件基本性质的大问题。

先说省籍矛盾。光复之初,台湾人民欢欣鼓舞回到祖国怀抱。只是不久,看到国民党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对国民党政府的热切期望就开始幻灭,1945年年底,我在上海就听到了故乡人民骂陈仪,骂大陆去的政府官员为“阿山”了。又

过一年两个月,台湾社会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台湾省同胞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强烈不满的同时,确实也出现了本省籍人与大陆来的外省籍人的矛盾的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二二八”,在事件发生的头一两天群众在惩罚贪官污吏的同时误打了一些外省籍的一般公教人员,这是群众自发斗争中难以避免的。但是台湾人民很快自己起来纠正这一错误。很多材料都说明,许许多多外省同胞如教员、商人、学生及一般公务人员都受到了保护。至于外省籍同胞死亡数字,据国民党方面调查统计,台北市死7人,基隆市死4人,台中市因伤致死4人,嘉义市死1人,高雄市死3人,屏东市死1人,台东县死1人,共21人。台北县、新竹市、彰化市、台南市、台南县、花莲县、澎湖县的外省同胞均无一死亡者。许多正义的公正的外省同胞都理解这一点,他们对于台湾人民“二二八”斗争,给予积极地支持。如台大外省籍学生领袖周自强,因同我在一月初台北学生反美抗暴万人大游行中相识,“二二八”发生后,他主动找她表示,他们外省籍学生已经组织起来待命,愿听从我的指挥,随时准备参加斗争。因此,说“二二八”是台湾人打外省人,是以偏概全,颠倒是非,模糊了台湾人民“二二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本性质。

至于说“二二八”是台湾人民要“搞台湾独立”,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开脱其实施血腥镇压的罪责,强加给台湾人民的罪名。

“二二八”台湾人民的政治诉求,集中表达在“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处理大纲(32条要求)中。这些诉求归纳起来无非是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滥用军权,反对对台籍公教人员的歧视和差别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实现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简化起来就是要求民主和自治。这些要求并没有超出旧政协决议的范围,但是,“长官公署”的报告却把它歪曲为“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杨亮功的报告也说:“此项大纲提出后,不仅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在“二二八”期间一直在台北,从没有看到过、听到过要求“独立”的口

号。事后走了许多城市和乡村，也没有听到过哪些人、哪些组织有“台湾独立”的诉求。

事后，国民党公布了“二二八”“要犯”的通缉名单。其中有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的名字。国民党以为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列进去，“二二八”要求独立的罪名就成立了。这实在可笑

之至。当时在台北的人都知道廖文毅在“二二八”前不久竞选伪国大代表落选，还跑去南京旁听伪国大开会，回来后召集记者表示他的主张仍是联省自治。“二二八”当中，他们兄弟二人正在庐山游山玩水，根本没有参加。他们后来跑到香港，开始提“联合国托管”，50年代跑到日本才打出“台湾独立”的旗号。到了60年代就被国民党招降过去，当了曾文水库的“主任”。“台独”开山鼻祖廖文毅就落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下场。

相反地，“二二八”是爱国运动的证据则俯拾皆是。例如高雄学生军的传单一再地强调：“我们是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我们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的精神”、“打倒腐败官僚，建立民主政治”。又如“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在3月6日告全国同胞书说：“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热情来，和我们共同推进。我们很诚恳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协助。”真是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新生报》报道处理委员会发出的《告全国同胞书》，内称“争取本省政治改革，并非排斥外省同胞”

正因为“二二八”是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当时大陆各界和媒体包括《正言报》、《申报》、《益世报》、《立报》、《大公报》、《新闻报》、《文汇报》、《新中华报》、《新民报》等都表示对台胞的深厚同情和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更是给予及时支持和高度评价。“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32条要求，3月7日下午6时20分由王添灯在台湾向中外广播，3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发表《台湾的自治运动》的长篇文告，给予肯定和支持。文告后来于3月20日作为《解放日报》的社论发表。这篇文告指出：“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二二八”事件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四、台湾农民对“二二八”斗争的态度

《救救台湾》一文的作者认为：战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在城市士绅阶级、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间，而在广大贫苦佃农与大地主，士绅阶级之间，“二二八事变”的“发起者事实上并没有代表台湾的主要人口”，“并没有代表主要人口的农民的利益”。这位作者进一步说，“在那里（按指农村），‘二二八事变’勾不起人们伤痛的情绪，因此也无法营造任何政治影响力，因为那次事变当时根本没有波及到农村”。《救救台湾》一文作者的这些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台湾光复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台湾人民同国民党法西斯反动统治的矛盾。这在本文的前几段已作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至于“二二八”事件中农民的态度，我作为“二二八”的参与者、目击者，不能不多说几句。

战后，国民党政权接收的日本官民拥有的土地占台湾全部耕地的70%，国民党成了台湾的超级特大地主。那时国民党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别无选择地站到了佃农的一边”。那时候，不要说国民党台湾政府没有搞什么“土地改革”，连发生在当年秋至1948年的台中、台南等地农民的“三七·五”减租斗争，还遭到了残酷镇压。

那么，台湾农民是否参加了“二二八”斗争呢？《救救台湾》一文作者持否定态度。1947年4月16日“国民党监察院闽台监察使署”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调查报告中，确实也有“惟全省农民，则均持安静之旁观态度”一说，但我所知的情况是：省会台北市3月5日凌晨未遂的武装起义就有为数不少的农民队伍在郊外待命。各中小城市都有农民参加。台中、嘉义的起义告急时，台中、台南农民乘坐卡车一队一队地连夜赶往支援。台中的“二七部队”、嘉义的“民主联军”中都有不少青年农民。斗六的“民军”领袖陈篡地于3月中旬率众退入小梅地区继续进行游击战，直至5月中旬。在受到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和支援，这是不

可想像的。再说如果农民没有参加，农村没有波及，为什么国民党军在镇压城市起义之后，要立即在全省进行长达数月的“清乡”，用连保法收缴武器捕人杀人呢？1948年4月我也曾潜入台南大山中，到起义人员的据点工作，5月1日全岛户口大清查前夕，突然来了数十名因参加“二二八”斗争而逃亡的青年，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农民。他们在户口大清查过后陆续离去，多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或外围骨干。

诚然，“二二八”斗争台湾农村没有城市那么轰轰烈烈，“二二八”事件平反后也没有在农村设纪念碑，但不能就此说农民没有参加“二二八”斗争，更不能引申出“二二八”事变本身不“具有社会革命的进步性”的错误结论。

五、中共台湾地下组织与“二二八”的关系

中共台湾地下组织即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于1946年6月正式在台湾建立组织系统。到“二二八”时，全省只有党员七十多名。“二二八”这一突发事件发生前，台湾地下党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作为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的成员之一，事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更没有组织上所作的任何部署。但是，当事件突然爆发时，我们在台北的为数不多的党员，都立即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一面参加斗争一面找组织，只是互相联络不上。到了第三天下午，组织才找到了我，告诉我国民党军宪警到处在杀人，为了自卫，根据各界群众的要求，地下党成立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北的组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同志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同志进行宣传活。其他各地的党组织都按照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地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嘉义的武装斗争是省工委委员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张志忠同志指挥的，武装斗争开展得最出色，有的地下党员在斗争中牺牲。台中、高雄、屏东、宜兰、基隆、新竹、彰化等地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

“二二八”群众斗争被镇压以后，一切团体都被打下去了，只有中共地下党独树一帜，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二二八”斗争中的积极分子看到

中共地下党员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纷纷集合到地下党的周围，因而“二二八”以后地下党有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开展了工人的斗争、农民的“三七·五”减租斗争以及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到了1948年，随着大陆上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上海进步报刊在台湾的广泛流传，台湾广大人民觉悟大大提高，社会上弥漫了盼解放迎解放的气氛，中共地下党进一步发展壮大。

可惜，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陆上最反动的军统、中统头目集中到台湾，台湾地下党遭受了残酷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台湾。据统计在长达数年的白色恐怖中，被杀的共产党员大约四千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是外省同胞，被捕坐牢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群众有一万人左右。坐牢时间最长的林书扬被关了34年。中共台湾地下党为继承“二二八”未完成的事业，为了台湾人民的解放，为了全国的解放，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到1954年。他们中代表人物就是张志忠、钟浩东、郭秀琮、吴思汉等许多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我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志忠及夫人季沅在被捕前已被特务跟踪一个多月，被捕后没有出卖任何人。蒋经国曾两次到狱中对张志忠以礼劝降，均被张以死相拒，最后壮烈牺牲。经多年调查核实，张志忠、季沅两同志已于1998年初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为烈士。

六、日本是“几乎兵不血刃” 占领台湾的吗？

这个问题，本来与“二二八”没有直接关系，但谈到“二二八”起因，人们（包括当年延安的《解放日报》）往往作一般意义上的比较，说“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然而，绝不能就此说日本占据台湾期间实行了仁政，更不能如《救救台湾》一文中所说：“台湾虽在1895年后沦为日本殖民统治下，但占领过程中几乎兵不血刃，没有经历大陆那样残暴的侵略和屠杀。”这就背离历史事实太远了。日本侵略军于1895年5月29日从不设

防的北部小渔村澳底偷偷登陆，便遭到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军民奋起抵抗，瑞芳、基隆、新竹、大甲溪、彰化八卦山、嘉义、曾文溪等地均发生了大规模的阻击战，新竹、彰化、嘉义等地反复争夺多次，经过五个多月大小百余战，使日军付出了死4800人、伤2.7万人的代价。这比此前甲午战争中日军的伤亡多一倍。日本侵略军主力近卫师团（即日皇御林军）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嘉义的激烈战斗中受重伤，不久毙命。

是年11月18日，日本侵台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向日本明治天皇报告“台湾全岛平定”的话音刚落，抗日游击战的烽火便在台湾燃烧起来。北部农民武装首领陈秋菊、詹振等率二万多人除夕之夜包围攻击台北城；中部的柯铁、南部的黄国镇、凤山的林少猫等也先后率众起义。后又有北埔事件、林圯埔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西来庵事件等农民武装暴动的接连发生。1930年埔里雾社的高山族同胞还发动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可以说，直到日本投降，台湾人民的抗日、反日斗争就没有停止过。

日本侵略占领台湾50年，我台胞65万人牺牲。日本侵略者1938年3月出版的官方机密文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卷，以835页的篇幅，记述了此前20年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和日军残酷镇压的情况。该书306页、307页记载日军在我家乡宜兰镇压林大北起义时说：“从1896年1月12日……至1月28日，诛戮者大约一千五百人，烧毁房屋一万间，宜兰平原大半归于灰烬”，此类日军宪警的暴行，在该书中随处可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人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始于台湾。难怪该书的序文表示，“相信这些体验，对于对满（洲）、对支（那）治安工作大有参考（价值）”，此书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印成，“是合乎时宜的”。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台湾人民历来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今天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歪曲台湾人民的历史，对台湾同胞贬污，都是不能允许的。

（责任编辑 洛松）

平心论胡适

□ 吴 江

关注胡适的起因

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胡适。记得读小学时，家父赠我《胡适文存》第一集（共四册），这是一件意外事。我出身农家，家父一辈子当乡村小学教员，却家无一册藏书。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胡适的书，其意思大概是希望我学写胡适那样的白话文吧。那时我读不懂胡适的文章。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文存》时，完全不明所以。等到小学毕业进入中学，不知怎么一来，独醉心于文艺，读鲁迅、高尔基的小说，后来自发地搞起农民运动，完全把胡适撇在脑后了。以后革命数十年，都不曾留意“思想”这一门学问。待到50年代批判胡适，胡适这一名字才又重新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但我当时正忙于实际工作，无暇顾及这项规模宏大的批判运动，只零碎地读些报纸上的文章。这场批判给我的印象是，胡适竟然“一身都是毒”。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家乡人为我送来了抗战前我留在家里的几部书，其中除了

我颇为珍视的鲁迅所编的那部《海上述林》（瞿秋白译文集）和瞿秋白所编的《鲁迅杂文选集》等书以外，居然还有久已遗忘的那四册《胡适文存》。但当时我也并未因此引起阅读胡适的念头，只是对胡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完全如批判所说的那样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兴趣，但这点淡淡的好像是局外人一样的关注不久就又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了。

最近几年，思想界突然兴起了评论历史人物的风气，特别涉及到过去各类文化人，胡适当

然是重点人物之一。有些评论家的言论甚至有些情绪化，好象说：“是马是骡子，不妨重新拉出来遛一遛”。这种情绪也未可厚非。评论现实中的人和历史上的人有时确不相同，尤其对于像胡适这样多方面的复杂人物。《读书》杂志1995年第9期载有郁之（想是化名）谈胡适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有一段话说：“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



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时的胡适

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做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郁之同志这段话我看是说得对的。虽然过去的政治纠葛也有一个是非问题要弄清，例如50年代的那场激烈的政治性的批判，现在来看是明显地过分的了。

这一回，我是以各种评论意见为线索去读胡适的，显然是晚了一点，而且仍然谈不上认真研究，堆在胡适身上历来被人谈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这里我只想就胡适作为学术界思想界人物他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右翼代表人物在政坛上所扮演的角色及酿成的悲剧(这两个问题最影响胡适的历史定位，前者人们谈得较多但估价不一，后者人们尚未全面涉及)，试着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白话文运动与实验主义思维术

胡适(1891-1962)，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尤其在二三十年代)，桃李满天下。这应是判定胡适的历史定位的主要依据。而胡适对于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首创文学革命，成功地推行了白话文运动。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文化水平乃至解放国民思想都有重大的意义。

大家知道，秦推行“书同文”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条件。但秦以后中国的文字仍数经流变，主要是由古散文逐渐衍化为骈俪文与“四六体”，这种文体以工巧雕琢见长，但是远离现实，远离人民群众，只为少数上层文士所欣赏，至此中国的文体遂衰。唐韩愈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号称古文体，这也是一种革命。以后自宋至清五百余年，盛行这种古文体，即以古文为散文正宗。然此古文体仍不适于说理记事，又遭明代“八股”浩劫，

遂逐渐成为死文字。胡适从青年时代起便受宋人谈哲理的语录体及元以后的民间白话戏曲、白话本、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的影响，认为这才是适应时代的“活文字”。他认为文学的生命只能用适应时代的活的文字形式即活语言来表达思想和情感，各国皆然(如但丁之创新意大利文，马丁·路德之革新德意志文)。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和朋友间的争论，胡适在1917年的第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首次提出以白话作文作诗，废除古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此议首先得到陈独秀、钱玄同等的支持，在此之前，胡适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孤独的文学实验”。他在他的《自传》(吴按：我读的《胡适自传》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内包括《四十自述》与《口述自传》两部分，后者时间在1958年，由其弟子唐德刚先生翻译整理)中这样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按：即胡适在文中提出的八项改良主张)还有点怀疑(《新青年》2卷2号))。其时国内好学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说：说理记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文耳(见《新青年》2卷4期)。但陈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他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大运动了。”

我写上面这段话，为的是使今日的读者认识当年胡适对于中国文学革命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实要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退之，亦不逊于西方近代在文字语言改革方面有功于文艺复兴的但丁和马丁·路德等人。尤其难得的是，胡适在以白话作文作诗方面身体力行，他的明白流畅的白话散文的中国气派至今仍值得我们欣赏，至少比今天有些生硬艰涩的译文式的

文字(我自己的文字也在内)要好读得多。胡适还特别提到,毛泽东是共产党人中间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虽然,今天对于用白话作诗尚有争议,因为自从提倡白话文以来,除少数人写出较好的白话诗外,许多白话新诗(而且采用的是欧化形式)不受人欢迎。连毛泽东除在公开场合表示白话新诗是“方向”外,私下里却说:现在的白话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读”。可见,白话新诗和旧体韵诗的关系究竟如何,还值得重新探讨。

下面我要特别谈谈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亦称实用主义)。1955年批判胡适时,实验主义是主要批判目标,批判者异口同声地把实验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是百害之源。今天看来,这个问题也需要重新认识,至少有加以分析的必要。

究竟什么是实验主义,我们还要以胡适自己的解释为准。胡适在《杜威论思想》一文中扼要介绍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如何思想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胡适看重方法论。按照胡适的说法,实验主义就是一种“科学方法”,首先,是一种创造能够应付环境的思想、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的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我们今天有重新介绍的必要。为此,这里将不厌其烦地抄录《胡适自传》中有关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部分(杜威自己把这种实验主义称为“思维术”):

胡适说:杜威认为的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找出并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的)证

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把这一思维术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50年代的批判者认为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货色。但是胡适在其《自传》的另一处又有如下一个说法:“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要证明一个理论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上牵涉到各种情况;然后在实验中观察这一特殊理论是否能解决某一问题的初步困难,从而进一步找出一个原来所要寻找的解决方案。”(按:这里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在1978年讨论实践标准问题时,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在最后改定这篇文章时根据列宁的一句话定下这个题目的,但胡适居然早在1958年口述他的自传时就已用了这一句话。是胡适当时的原话如此,还是唐德刚先生整理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呢?这就要问一问唐先生了。当然即使是同样的话语,其包含的内容也会不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胡适在《自传》中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提出“文学改良刍议”,至少一半也是应用实验主义方法的结果。他当时说,他的以白话文为活文学的这一理论(也是假设),便是已经在小说、故事、元曲、民歌等文学领域里,得到实际证明了;只是能否用白话作诗,还需等待实际证明。所以



1961年胡适与夫人江冬秀

他努力作白话诗,并把他的白话诗集题名为《尝试集》,借以证明他的尝试主义。

翻译整理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在他的加注中曾这样评论胡适:胡适先生最服膺程颐所说的两句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话。胡适推崇朱熹是对古代典籍深具批判能力的人,对古籍研究不拘泥于传统,每每使用新方法,另创新论。他认定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所以唐先生说:胡适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

唐先生的话究竟何所指,是指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骨子里等同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宋理学,还是指在使用新方法上、批判能力上两者有共通之处呢?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楚,也只有等待唐先生来说明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讨论。如果不把实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或从其政治主张方面来深究,单从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则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它也是颇有影响力的西方近代社会学方法之一。胡适能运用这种方法发动一场波澜壮阔的白话文运动,并写出半部《中国白话史》和半部《中国哲学史》,并用以整理其他“国故”,做出开创性的成绩,就是说明这种方法用于做学问具有一定的功效,未可轻视,更不宜一概否定。后来别的中国哲学家运用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也是胡适开的头。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胡适运用实验主义方法,不是生吞活剥,而是像他自己所说,与“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相结合。胡适是在中国考据学、考证学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实验主义方法来治学的人。他认为:在清乾嘉时代达到高峰的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考证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所以深有“考据癖”的胡适,他做学问更着重于“小心求证”这一点上,并获得不少成绩,而他在政治方面的“大胆假设”的方案则往往陷于失败(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胡适 1919 年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

义》,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并自称这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这是由他实验主义的改良主义政治立场决定的,自然是错的。50 年代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错。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公平地指出,胡适并不反对一切学理或主义,相反,胡适从他实验主义方法论立场出发,认为“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出特殊假设的可能后果。……‘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尤其在《四论问题与主义》这篇争论文章中,胡适着重指出:“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我们须先知道那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较,然后可以下判断。……输入学说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病。”胡适这些话的本意是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他所说的一切学理(或“主义”)都只是一种假设,这也是实验主义者漠视客观规律的一种偏见。但从上面他所说的那些话也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实验主义方法论显然包含着一种反对“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的精神在内。胡适是从反对者的立场第一个提出在宣传和实行“主义”时必须警惕教条主义的人。今天看来,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在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时,对反对者这方面的意见也应当表现出一点尊重,因为历史事实证明,教条主义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

对于胡适所推崇和运用的实验主义思维术,我只能谈这样一点粗浅的看法。

胡适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右翼领袖在政坛上扮演的角色及酿成的悲剧

胡适是一个珍视思想甚于世俗声誉的人。1957 年,中国共产党方面曾托人(据说是曹聚

仁先生)捎话给胡适,欢迎胡适归国,说50年代初的批判只是批判胡适的思想而不是对胡适其人(大意)。据说胡适对此甚为反感,在其日记(1957年3月16日)中竟称曹聚仁为“妄人”),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又说:“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说起那场批判时(胡适当时正在美国过潦倒生活),胡适也只淡淡地说:批判“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什么是胡适的思想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实验主义之外,从根本上说,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属于右翼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有人一般地称胡适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理由见后)。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常被人误解,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通常将自由主义解释成一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言论和行为,即作为一个贬词加以反对。其实,这不是自由主义的本义。自由主义就是关于自由的学说,正如民主主义就是关于民主的学说,平等主义就是关于平等的学说一样。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都是十八、十九世纪人民反对封建等级势力的压迫、束缚,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政治民主、社会平等的斗争的产物。自由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崇尚自由、推广自由的大运动。其中,争取个人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大目标。不同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会遭遇不同的命运,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走向分化,在思想上、政治上形成左翼和右翼。这个问题我想另写专文论述,这里不谈。

近现代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里,在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除少数人之外,大众均处于无自由缺温饱的被奴役状态。所以,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要获得自由,获得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最主要的是要推动和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运动,争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特别经过1919年的“五四”大运动,并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中国已开始出现一批自由

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战士,有的是国内生长的,有的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言人。青年胡适也是这批战士成员之一,并且以提倡白话文运动而名震于世。但也就从“五四”运动开始,胡适这位自由主义战士就逐渐走上了歧途,逐渐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右翼领袖,与真正的自由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战士分了手。其故何在呢?

这里首先要说明,胡适在其后来也并未背叛开初的新文化运动。他在1958年的《口述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中,仍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当时的新思潮热情赞扬,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特别肯定新思潮采取“批判的态度”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尼采语),继续主张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当时他的同事周作人先生认为光主张用语体文来产生新文学是不够的,新的文学必须有新的文学内容,这“内容”就叫做“人的文学”。胡适很重视这一点。这说明胡适仍可算得上是一个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他终于向右转了,主要原因在于他错认了中国的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任务。他认为中国在二千年前就不是封建社会,他也不敢正视列强的侵略和新旧军阀的残暴统治。他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要打倒的只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胡适的这些主张当时就遭到许多人的严正批评(包括梁漱溟在内,梁当时致书胡适,指出他否认列强侵略和不以军阀为仇敌,正是其症结所在),但胡适并不醒悟。按照他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立场,他坚守“一点一滴地改良”的政治理念,反对以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和平的无抵抗论者。他说,当时“日本由攻击德国在山东的领土以加入世界大战时,向世界宣布说,这些领土‘终将归还中国’。我在留美华人中是唯一相信这个宣言的人,并以文字辩驳说,日本于其所言,说不定是意在必行的。……及至1915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对华二十一条,留美学生人人都赞成立即与日本开战。我写了一封

公开的信给《中国留学生月报》，劝告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且屡被斥为卖国贼。”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五四”群众运动来临、强烈提出“打倒列强，反对军阀”的时候，胡适直认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幸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按：现在也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叫做“以抗战压启蒙”），“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见《口述自传》）

胡适就是这样和“五四”运动的政治和政治目标（反帝反封建）分了手，并像他自己所说的从此把中国共产主义者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反对派。

在完成了政治上的这种转变之后，接着胡适又从思想上为自己的自由主义定了位。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因环境和时机的不同而有两个不同的主题：一个是先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争得国家的独立自由，以及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这里所谓社会解放首先是完成民主主义改革），其中当然也要争个人的自由权利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把个人应获得的自由权利暂时约束在首先为国家民族争独立自由的范围之内；另一个是，任何时候都是个人自由第一，先争个人的自由，然后争国家的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来的”（胡适语）。后者便是胡适的自由主义观。这两者的差别具有原则性，虽然两者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自的弊病，例如，前者容易产生过分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乃至禁止个人思想自由即实施所谓“舆论一律”和“思想大一统”的弊病，但是后者所产生的弊病的危害性则更大、更为严重，因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它不仅争不到个人的自由，反而会必然造成延长反动统治和牺牲掉国家民族争得独立自由的机会的可能性。

这样，胡适就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完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及民主主义运动）右翼方面的代表人物了。

我们试看胡适为争自由所走过的一条道

路，这条道路证明胡适试图在国民党反动极权统治及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条件下，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包括改良国民党的政府）争取自由和建设一个“自由中国”，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他的反共产主义立场以及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斗争，不管他采取什么样好听的说辞，实际上都是站在国民党方面，帮国民党的忙。因此其最终的结果不是真正推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前进，而恰恰是将这个运动引入了歧途。

办《新青年》的最初几年，胡适曾提出“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他要的是一个“纯文化运动”，因此他怪“五四”运动是以“政治”干扰了新文化运动。但是在“五四”之后，胡适却通过办刊物大谈起政治并干起政治来了。他在上海的一帮朋友（高梦旦、王云五等）曾劝他“专心著作是上策，办刊议政是下策”，无结果。胡适表示：“梁任公吃亏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义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他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在国内至少争取到言论的自由即个人议政的权利、批评政府的权利，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但是大家知道，胡适虽然珍惜自己的独立地位，但他最终还是身不由己地由议政走向参政，进入了国民党的官场，虽然其官场地位并不算显要。

下面我们可以将胡适在20年代后谈政治和干政治的行动择要介绍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胡适最初在陈独秀主编（陈被捕后由胡主编）的《每周评论》杂志上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阐述他的“一点一滴地改良”的政治理念，说“政治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到了1922年由他自己主办《努力周报》的时候，他就大谈起政治来了，并提出“好人政治”、“好政府主义”的政治方案。当“好政府主义”的幻想破灭后，又以《新月》为阵地，将其谈政治的新努力推进到人权和宪政的制度层面上。胡适在《新月》杂志（1929年9月10出版的那一期上）曾率直地指出：“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按：这时国民党也公开批判胡

适，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一书)。到了《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更以其独立的地位和无忌的言论，纵论政局，点评国是，批评政府。但这时胡适已把自己定位为政府的“诤臣诤友”了。

(二)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确曾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谓“人才内阁”，独裁者蒋介石为装饰门面，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从这时起，胡适已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但胡适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仍保留其独立的形象。此时国民党有意拉胡适出任政府部长级职务，包括行政院长的职务，胡适均推辞，最后于抗战期间(1937-1942)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自称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其任务是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并促成美国对日作战。第二次机会就是1948年的所谓“行宪国大”。在此之前，1945年胡适曾致书毛泽东，重弹他的改良主义老调，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此时国民党正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但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连援助国民党的美国也大感失望。于是蒋介石想出一个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把戏。主要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是搞民主

的，蒋一度设想由胡适出任总统，自任握实权的行政院长，并遣王世杰探询胡适意见，希望胡适能够出山。其时胡适正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对此意外事件的态度是：又惊又喜，欲拒还迎。当时参与其事的前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兼记者的陆铿在其《回忆与忏悔录》中说：“胡适指出，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不负责具体行政事务，行政院长即内阁总理掌握行政权。……如果蒋先生决意不当总统，行政院长当然要他担任了。”陆铿又说：“最后谈到对共产党的态度，我问他，你当了总统以后，是否重开和谈？想不到他的反共态度比蒋似乎还坚决，用英文说：‘绝不’。”陆还说，胡适遵蒋命填写了自己的小传送了上去，作竞选总统用。胡适是个城府极深的人，这时也有些忘形，他甚至还对他的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故作姿态的骗局，为此胡适情绪消沉。1949年4月胡适赴美，在美国整整潦倒了九年，其间曾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及馆长，并继续研究《水经注》。直到1958年4月才回到台北，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

(三)在居美的九年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胡适在总结国民党遭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写了一封长达四千余字的信致蒋介石。这封信直到1997年才由台湾《联合报》公布。胡适在这封信中除分析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成功之处并劝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胡适特别向蒋介石推荐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着重分析和批评国民党自身失败的原因，特别指出“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时“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最后他要求蒋介石辞职。胡适在信中对国民党提出一条重要建议，原文如下：“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并随即指出这种改革的第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关于胡适



胡适给陈独秀的信的手迹

要蒋介石辞职的理由，胡适在1956年为蒋介石七十大寿的贺信中有更具体的说明。他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他劝蒋介石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这是胡适善意地向蒋介石推荐一种较开明的政治哲学，也是胡适婉转表达他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的不满；同时，这或多或少也表示胡适仍坚持他的西方一般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回台以后的行动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胡适这种言论当然触怒了台湾当局。台湾曾由蒋经国主持半公开的批判胡适，指出主张言论自由是一种“毒素思想”，更指出要总裁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是“荒谬绝伦的言论”，甚至还指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但胡适毕竟是胡适，蒋介石对于胡适的信半是赞赏，半是冷淡。台湾当局于是又在1957年底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遂于1958年4月返回台北。

胡适从1958年回台直到1962年逝世，这一段时间内是受冷落的。国民党已失国，败退台湾一省呈割据之势。此时胡适的利用价值对国民党来说自然已经不大了，所以这时胡适受冷落并不奇怪。更使胡适感到无奈的是，他自信赤胆忠心为国民党，而国民党竟认他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因此受到了两面攻击。尤其胡适回台北后遭遇了一场“雷震案”，胡适直接卷入其中。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底，台湾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们创办了一份《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为雷震，发行人为胡适。胡适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民主和极权的冲突》一文，文中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虽然该刊的创刊宗旨说明

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实际上许多批判文章是针对台湾的政治环境和国民党而发的，主要负责人雷震带头发表了一系列用辞激烈的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文章。1956年胡适趁为蒋介石祝寿的机会劝蒋介石要“无智、无能、无为”的文章也发表在《自由中国》上。为此，雷震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不久，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交军法审判。时在美国的胡适为此事向舆论界大声疾呼，抗议此事，无效；胡适回台后再向蒋介石直陈此案不当，仍无效。雷震被判处徒刑十年。此事对胡适刺激甚大，以致心脏病复发，迄未痊愈。1961年病中的胡适送诗（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给狱中的雷震，祝他65岁生日。延至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一次讲话中终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胡适数十年的自由主义声音，至此终于绝响了。

台湾有一位著名的“狂才”、历史学家李敖先生，他是胡适晚年的忘年交。胡适曾告诉梁实秋，说“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梁实秋将此话转告李敖，李敖说：“我相信这是真的。”就是这位李敖先生在他写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除指出“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这一点外，还对胡适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神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运动的时代，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的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这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谈胡适，也只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专家学者们予以分析评论。

（1999年12月于广州）

（责任编辑 洛松）

胡耀邦最后的27个月

□ 张黎群

耀邦同志是我1937年到延安后开始认识的，他比我只大三岁，可是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挚友，更是一位令我尊崇的良师。在他逝世前二十天，我还同他促膝谈心，他走了十年了，我感觉他仍然永生在人间。

耀邦同志1930年15岁时即投身革命，当了小红军。1987年1月，他卸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千钧重担。1989年4月8日上午，他病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于4月15日溘然长逝。当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民公仆，最后以身殉职。自1987年初辞职从中南海勤政殿搬回家，到他告别人世，共计27个月。

革命人生须为乐

1987年初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去北长街他家看望。一进门，他就热情相迎。我看到他的气色不太好，显得有些憔悴，忧郁的心情也难以掩饰；但是他仍然沉着镇定，两眼炯炯有神。坐下后相互道问了近况，我想竭力回避他辞职的事，可是他却主动谈开了：“生活会上，不少同志对我有很多批评帮助，当时我也

来不及细细体会和思考。搬回家后，我把这些年搞的文件、各种场合的讲话稿找了出来，正在逐篇地细看，检查检查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深为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当即说：“这些年的功过是非是明摆着的，大家是看得清楚的。”他说：“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吧，让历史来检验吧，不能凭自己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久我又一次去看望他。他已经专心致志地用三个月的时间重新检查和回顾了自己这些年的工作，他的结论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他谈锋颇健，

出语幽默，富于智慧。谈着谈着，我吟了陆游诗中的两句：“人生失意须为乐，甲第朱门祇自困”。他苦涩地笑了，边笑边说：“‘须为乐’、不‘自困’，我都做到了。这叫‘革命人生须为乐’。”

他对我说，离职后的日子，过得是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也充实。他将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40分起床，中午只休息半小时，晚上10点半睡觉。每天还坚持走一万步路，每餐饭后沿着走廊走几圈，上下午还都要在户外走一走。他走路时挺胸直腰，



1989年3月24日胡耀邦的最后留影

步伐很快。每天上午坚持学习,看文件。有时练书法,写诗填词;有时也看一些古今中外的诗歌、小说等文学名著。他学习时不许人干扰,一直潜心研读马恩著作,光是读书笔记就写了好多本。下午不是看书就是会客,偶尔也打打牌,这也是活动脑筋的一着。

写诗填词发心斋

耀邦同志素来爱好诗词。现在赋闲在家,他有机会来吟诵唐诗宋词,并且把练字与读诗词结合起来,抄写了很多首。他尤爱杜甫的诗和辛弃疾的词,赞扬杜诗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吟诵之余,他也情不自禁地写诗填词。诗言志,“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是“达”、“穷”都一心念念不忘“兼济天下”。

我读过耀邦同志写的三首诗,创作于1987年9月25日,是他卸下重担8个月之后写的。诗曰: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
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

(三)

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情。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这是多么真挚感人的诗啊!

有一次,耀邦同志向我展示了他书赠文怀沙教授的一首古风:

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去岁饯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
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
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文怀沙教授在1987年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后,从陆游集中采撷五言两句,写成对联一副以赠耀邦。联曰:“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以之刻划耀邦同志对祖国对人民的眷恋,以及“忍而不能舍也”的心态,真是既含蓄又深沉。

文教授读了耀邦同志的诗说:“耀邦同志在这首诗中所展现的是苦苦追求、坚定信念、伟大预见以及寄希望于中国青年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多少能理解屈原,也多少能理解耀邦同志。所谓骚作的传统,实为一条贯穿至今的民本主义的线。把屈原精神现代化,使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在于继承发扬这种‘民为本’以至‘民为主’的思想。所有肩负着历史重任的人,请听听屈原的告诫:‘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葛艾也。岂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耀邦同志所苦寻的屈原魂,今日而言,就是建设四化中这种与民共呼吸的芳草品格。”

文教授满怀深情地说:“诗是写给我的,字面上写的是我,更深刻的内涵是耀邦同志的自我展示。他高洁的人格无愧是九嶷山上的云,耀邦心中则埋着屈原的魂。他才真是‘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的光明磊落人物。近两年他‘闭户’、‘心悲’,沉默——其实是沉思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畏‘天寒’,坚信‘寒极’之后的‘艳阳’之‘春’。他热情欢呼即将来临的艳阳之下,桃李千千万的‘芬芳’世界。明确指出‘一番变化一番新’,‘春蕾一绽更精神’。这是人间更为晓畅的哲理,更是对中国青年的热情礼赞。因为任何时代,总是由青年代表着新生的活力和前进的方向。”

文教授赞曰:名垂青史的胡耀邦,即以这首必传之作,也定将名垂诗史!他无愧是当代真正的大诗人。

耀邦同志9月中旬离烟台,回来途中经济南,很想与中央苏区的老战友谭启龙同志一聚,不料谭去上海治病了,耀邦同志怅然若失,提笔命诗一首: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蒙冤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怀疑胡耀邦和谭启龙这些十七八岁的小红军都是AB团分子，险遭厄运。耀邦同志是很想同60年前的战友重新舒怀的，但是命运竟然让他们失之交臂，从此再也未能晤见。

顾大局何其悲壮

耀邦同志是人民心中德才兼备的好领导，大家信任、尊敬、热爱他。虽然他不当权了，可是他的门庭不冷，常有人前去看望他。

1988年春节刚过，邢方群同志手提一只扒鸡去看他。方群向我描述会见情景：“耀邦同志问我近两年来的生活情况。他说：近来物价上涨了，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我说：够得上小康水平，比我困难的人还多着呢！……我随后问他1987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他深情地说：他本来决心从此解甲归田，作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平民百姓，不想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耀邦同志着重对我讲，只有把自己的想法搁在一边了，他的态度是两句话，十二个字，即‘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我随后向他讲了我接触到的一些高中级干部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称赞，说着说着，我掉下眼泪。我赶紧擦干了泪痕，把来时全家决定送的扒鸡拿出，对耀邦同志说：‘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意，也是我全家对你的敬意。’耀邦同志说：‘那我拿什么送给你家庭呢？你就把桌子上的几个蜜柑带回家吧！’我说：我们家里的人，一定会珍惜这几个蜜柑”。

方群说，“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和耀邦同志依依告别时，我把自己写的文章《离休之后》送给他。文章中引用了李白一首诗中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下来时，犹能簸却沧溟水’。我说：‘耀邦同志，你就是大鹏’，他听后感然一笑”。

耀邦“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的愿望，是出于真心的，他为党、为国、为人民之事，身体熬得几近油干灯草尽了。他视高官要职为革命的工种，得离退时且离退！因此，这个要求和态度本

身就是光明磊落的品格的体现。可是，当党中央向他提出须当接受任命时，他把个人的委屈抛出九天之外，报之以“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十二个璀璨光辉的大字。

耀邦同志自我制订的这十二字箴言，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度理智，这就在世人眼中树立了他胸怀大局、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形象。

耀邦同志是一个将自己的精力、智慧无保留地献给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他忘我地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小病小拖，中病中拖，能拖就拖。1981年4月他因为颈椎病十分严重，中央决定他休息一个月，结果他还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浙江、山东进行调查考察。到他古稀之年离开中南海办公室之时，“公行胡滞留”之际，已是积劳成疾多病缠身了。但当邢方群问他健康如何时，他还漫不经心地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一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实际是，他体力下降了。一次我带一方李白纪念馆制作的“学士砚”相赠，他喜形于色，双手接过，却呈现不胜负荷状。他在1987年秋冬和1988年春在305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

调查研究访易县

胡耀邦辞职后，戴着病号帽子，度过了1987年。但是他心系天下，时刻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想着人民的疾苦。1988年春，他从305医院出来，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离京作点调查研究。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派出四名干部同行。

1988年5月，耀邦同志来到河北省易县，他用三个上午的时间听县委书记和县长关于易县基本情况和资源优势、经济建设和改革、重点工程建设和扶贫等情况的详细介绍。耀邦同志边听、边问、边记，十分细致认真。

紧接着，耀邦同志又用三天的时间走访了八个地方：紫荆关古长城，紫荆关三级电站，安格庄水库，西陵区马兰台村，龙泉庄村，太平峪村，后部林场，易县图书馆。每到一处，他都向有关同志殷殷垂询，了解各方面情况，专心听，开口讲，针对汇报中的疑难问题，发表意见。当紫

荆关乡长叶魁贤谈到前些年因造林而限制养羊，近两年开始解决林羊矛盾，羊只有所发展时，耀邦当即明确指出：“千万不能养林轻羊、保林宰羊。”他紧接着说：“前些年出现造林宰羊的问题，责任不在乡，也不在区、县。”他继而谆谆开导说：“现在羊的价值很高，我穿的这件毛衣，毛线就二十多元一斤。要正确处理林牧矛盾，想办法在山上多种一些草、灌木等适合羊吃的东西，解决羊的温饱问题。如果每年绿化有所发展，羊只再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他还过问了高易铁路能否与涞源铁路接上轨的问题。他站在十八盘公路旁眺望紫荆电站，提出把小水电站建设好的要求；最后，他还到苏格庄水库作了一番视察。

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到西陵区马兰台村的村北山顶上，考察了这个村的造林绿化情况，并向村干部询问了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和当前群众有哪些意见。村支书崔永泉如实讲了群众对农用生产资料和水电费涨价、化肥柴油等供不应求的意见较大。耀邦同志说：“你说的不错，讲的是实话。你要带领群众努力发展生产，使财源像你的名字一样长流不断。”

耀邦同志来到后部林场观看了他前几年亲自采集来赠给易县的白皮松树籽的育苗情况，林业局长靳洪年汇报了育苗过程和准备移栽到

狼牙山、荆轲山和西陵等几个旅游地区的打算，耀邦听了很高兴。随后，耀邦来到县图书馆。他与馆长王家燕谈话时说：“我们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办好文化事业很重要，群众阅览图书可以象征性地收点费，这样读者看书就认真了。也可以让读者为图书馆搞义务活动，服务是相互的嘛。”

在易县九天，耀邦同志一贯从实际出发、一切为群众利益着想的老作风，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鼓足余勇奔涿州

1988年5月22日上午，耀邦同志从易县到涿州，下榻于东方宾馆302室，他一再交代：“我就在302室内吃饭，不到你们餐厅去，不用那么多人陪着。我爱吃白薯、面条，千万不要给我做什么好吃的。”有个电工到302室去换保险丝，耀邦对他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还递给电工一支烟，准备再给他点打火机，电工一边道谢，一边忙着退出。电工碰上服务员就说：“这个老头真是一个好样的共产党员，尽说家常话。”

耀邦同志此次来到涿州是有渊源的，早在80年代初，河北省有些领导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贯彻得不起劲，上面怎么也推不动。思想僵化是拦路虎，有些人误认为新华社“动态清样”和“内参”不断反映的安徽、四川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胡耀邦于1984年召集22个县的县委书记到中南海汇报工作，交流思想。其中有两件事令他大为兴奋：一是，大名县农民一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生活有显著改善；二是，涿州市乡镇企业东方实业公司搞股份制，织出的地毯远销国外。他这次来涿州，就是想实地看一看东方实业公司的发展情况。

东方实业公司总经理霍宗义，而今已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人



胡耀邦在北京家中看他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照片

5月24日早晨，耀邦一行离开涿州，人们自动来送他。

素面一碗庆古稀

到达长沙后的第十天（11月20日）黄昏，耀邦同志下榻的住处外面，黛绿的古樟，青青的翠竹，渐渐地消融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之中。身着铁灰色中山装的耀邦同志，腰板挺直地坐在餐桌前，脸庞瘦削，但两眼炯炯有神。服务员送来一碗面条，他看了看，露出满意的微笑，拿起筷子不停地往嘴里夹面条，不时用小勺加点辣椒油。看到耀邦同志吃得津津有味，一直伺立在旁边的警卫参谋齐东然漾起惬意、舒心的微笑。耀邦同志为什么今天要提出吃面条？几天之后，齐参谋才向接待员透露秘密，原来那天是耀邦同志73岁生日。一个为亿万人富裕、幸福奋斗了60年的老人，在他的最后一个生日，只吃了一碗素面，真是共产党人洁来还洁去的生动写照啊。是啊，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家不搞特殊化，几十年如一日。他三子一女规规矩矩，自食其力。他亲哥哥胡耀福和侄子都在老家务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准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去办事。当时地方领导出于关心，给耀邦同志的侄子胡德资安排了工作，耀邦同志知道后硬是不肯。直到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全是普通农民。

1988年11月25日，省委接待处一辆旅行车上下来一个鬓发斑白、皮肤粗糙，面容清瘦黝黑的老汉，身上黑呢子衣服的细绒毛几乎磨光，沾满黄土灰，他就是胡耀邦同志的哥哥胡耀福。他比耀邦个子高，年长三岁。胡耀福手提一个已被泥水染黄了的尿素袋，走进五号楼。袋子里装满了弟弟喜欢吃的红皮南瓜和晒干的茄子皮、苦瓜条、刀豆片。耀邦71岁的老嫂子和侄子

物了，但他也是千万个起于陇亩的凡人之一。他向耀邦同志讲自己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创业的经过：他1953年入党后到乡政府工作，1957年任乡团委书记，1970年任西河公社的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借了6000元办起一个社办企业——砖瓦厂，他担任厂长，逐步扩大，慢慢发展。1980年转为地毯厂。而后，企业红火起来了，四面开花，包括四川、云南在内，全国有20个加工厂，织毯工人5万名，涿州市现有53万人，近几年富起来了，在地毯厂基础上组建的东方实业公司已发展到有下属单位62个，包括设立在外国的，还有几个基地。

耀邦同志听了这个汇报，高兴极了，他亲眼看到了乡镇企业如此繁荣昌盛，表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成效不小。接着他在霍宗义的陪同下，参观了东方实业公司几个基地。路上碰见涿源县委书记马权，耀邦同志对马权说：“你什么时候把你们那里工作搞好，使涿源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保护过我们。你有计划吗？”他还不断地问：“涿源县人民有多少人富了？有多少人还穷？”

第二天下午，在霍宗义陪同下，耀邦同志参观了包子铺村。他先看了小学校，再到村图书馆看了介绍这个村子发展情况的图表，然后到幼儿园，看见孩子们正在唱歌、跳舞。访问的头一家农户是崔桂芝家。耀邦等一行坐在沙发上询问崔桂芝：有几口人？每年收入多少？现在生活怎样？崔桂芝一一回答说，这几年生活好多了，置办了彩电、冰箱、沙发，她还请耀邦看了她的家庭织毯。耀邦摸摸正在织着的地毯问崔桂芝：“这村里还有比你家更好的吗？”答：“有”。耀邦再问：“有不富裕的吗？”答：“有十多户，不会过日子。”大家笑了。接着访问了郭玉芳家，这家比崔桂芝家还豪华。耀邦说：“看来那一户没说假话。”耀邦问郭玉芳：“你们怎么安排生活？”答：“农闲织毯，搞副业；农忙就种田。”耀邦说：“好！”耀邦问郭玉芳家庭一年收入多少钱。答：“一万元左右。”耀邦笑着说：“农民怕露富，不止一万元吧？比我强嘛。”

霍宗义要求耀邦同志写几个字给他留作纪念。耀邦同志写了“强国富民”四个字。

都没有来。因为耀邦同志怕来的人多了给接待部门的同志添麻烦。

这次来湘，耀邦同志照样深切关心当地的情况。他不时向省负责人发问：“明年的日子怎么样？下面的情绪、精神面貌怎么样？”说起不久前去的张家界，他动情地说：“湘西山好、水好、人更好，可是湘西现在还很贫困，一些群众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有愧于他们啊！”

耀邦同志还对人讲了他到岳阳君山遇到的一件事：“在君山，有一对外地来旅游的夫妇遇到了我，并提出了要与我单独谈几句话。我让他们当着大家的面讲。女的说：‘我要向您提点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还提不得意见，不知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见您才说这些话。我是党员，我要退党，共产党腐败了，党没希望了。’我想了想，严肃地说：退党，党章有规定，个人有自由，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耀邦同志讲完这件事，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说：“这件事说明，我们党的凝聚力也减弱了。但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现在全党都在抓，是能够抓好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只要党风好了，党员心里装的都是群众的事，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党群、干群关系就会好。”耀邦同志接着说：“端正党风，关键是各级领导要带头，为政清廉，艰苦奋斗，为党员作表率。”

自古难能去后思

耀邦同志虽然离职赋闲在家，病魔也不断地折磨他，迫使他休息、治疗，然而他一直心系党和国家的大事，和亿万人民息息相通，心境难以平静。

1989年3月26日，我听说他已回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去看望他。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地同我推心置腹，谈天说地。他说：“我正在读《周恩来传》。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他举起左手，伸开右掌，动情地说：“我们必须坚持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说着说着，他举起两个拳头，模拟牛头上长的两只角左挑右突：“你看，少年儿

童一出生就摆出一副战斗架势，勇敢向前！老头子么，双手一摊，腿一伸，躺下了！”从他幽默的语言和灵活的动作中，我顿悟出他的那颗赤子之心，是何等地关怀青年、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啊！

“两亿两千万文盲中，青少年多的是。”他快活的音容笑貌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接过我的话头：“小孩不读书识字，弃学摆生意摊摊。随我去山东的秘书告诉我，他问一名13岁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这孩子回答得干脆利落：俺干这个买卖，比老师挣的钱多！”

“不挣学问只挣钱，不爱识字喜钞票。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身教重于言教’——老师挣钱少，这岂不是由老师‘身教’来的？我这是笑话一句。学生厌学，非年轻人之过，责任在长辈啊！”

在座的陈沂同志也插话了：“耀邦啊，我们这些人干了几十年革命，一身精光，全部奉献给党了。现在国家建设的事这么多，我们哪能高枕无忧呢？”

我紧接着说：“耀邦同志还记得不？1973年我出狱来京，向你倾吐真心话，反映自己忧国心情。你对我说：一定要相信毛主席和共产党人打出来的江山会治理好的，不会自己搞垮的！哪能自己搞垮自己创建起来的事业呢？”

耀邦同志看看陈沂，又看看我，沉默不语，只是笑了一笑，尽管不无一丝苦涩，但笑得多么纯真！他哪里会对伟大事业失去信心？只是眼前那么多的问题使他忧心忡忡啊！他哪有一晚高枕无忧过？只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事实上，他是从点点滴滴的事上来谋政啊！他所言所行又那点脱离政治啊！他那共产党人的忠诚品质永远不泯，不计成败，锐进不已，自强不息。“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欤！”就在那次我见了他后的13天——4月8日，他仍然兴匆匆地离家去出席讨论教育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他毕竟精疲力尽，郁积于心的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突然在会议桌前一病不起，一周后即与世长辞。一个多么忠贞的共产党人，永远停止了战斗！“自古难能去后思”。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大家永远怀念他。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

□ 廖盖隆

全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已经五十周年了。在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包括我所在的中央宣传部）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前往北平（北平不久后即改名为北京）。临行前，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绝大多数都遭到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失败，只有刘邦和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和明朝；但这些胜利的起义终于也挣脱不了封建主义的牢笼，它们做到的只不过是封建主义统治的改朝换代，这归根到底也仍然是农民起义的失败。

但是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去了，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至于前面讲的毛泽东所提到的李自成，他率领的农民革命军虽然迅速地攻占了北京，宣布了建立大顺朝，自称大顺皇帝，但是实际上他连改朝换代也没有做到，就像一颗流星一样转瞬即逝了。他在山海关战败后退出了北京，很快就兵败被杀。李自成就是这样失败的悲剧性的农民起义领袖。

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得这样快呢？毛泽东断然指出，这是他因为胜利时骄傲所造成的种种错误，包括他对形势的认识和作出的决策等各种错误，也包括毛泽东所充分肯定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指出的，李自成一进北京就改变了他“能纳人”（即能听取不同意见和批评），“采取民主的会议制来解决重大问题”等良好作风和制度所造成的结果。我认为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不容怀疑的。

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做什么事，更不用说像革命，夺取政权这样的大事，只有谦虚谨慎，才能取得成就和胜利，骄傲自大必然招致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早在1944年5月20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我党历史上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接着讲了大革命后期（指1927年上半年）的骄傲，导致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1930年一些同志因为红军打了一些胜仗而骄傲，结果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也使革命力量受到一些损失；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些同志又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指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

结果犯了与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指抗战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又使部分地区的革命工作受到重大损失。

因此他说：“全党同志对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还表示希望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毛泽东所讲“写太平军的经验”，很明显地指的是，我们要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洪秀全等因为骄傲而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作为鉴戒。可惜郭沫若后来没有写太平天国的史论。

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进北京前的1949年3月23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一点他做到了没有呢？

总起来说，在建国后的最初8年，他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兢兢业业地遵循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去想问题办事情的，因此他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迅速地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级人民政府，迅速地接管了官僚资本企业

和收回了外国垄断资本在华的企业，并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迅速地恢复了遭到长期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在迅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以后，又创造性地基本上完成了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6年2月起，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还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的教训，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探索的成效表现在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党的许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正确意见、以及八大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到4月所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上面。

但是从1957年中期起，毛泽东还是因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骄傲了。他在他长达39年的革命活动的晚期犯了“左”的错误，包括3年“大跃进”，10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对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不幸的错误。虽然他的错误没有使革命失败，但造成的沉重损失还是很大和很令人痛心的。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特别需要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



1949年毛泽东进入北平

顶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这种历史原因也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笔者认为上面引述的中共中央 1981 年 6 月历史决议的这一段话,是分析得很深刻、很有说服力的。可以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李自成的因胜利时骄傲而招致挫折和失败的悲剧,特别是重演了党的历史上几次骄傲、几次错误、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悲剧。但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 error。他一生的功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以他为集中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永远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因为“大跃进”所造成的 3 年严重困难(据统计在这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 4000 万人)和“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浩劫(“文革”浩劫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没有统计,但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被毁灭,这是因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经在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的中国人民中扎下了深根,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了强大而不可战胜的生命力。1967 年得到周恩来支持的一大批老革命家的二月抗争,1972 年

到 1974 年周恩来的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1975 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1976 年千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和同年 10 月的粉碎“四人帮”,就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运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自己纠正过来,自己医治好创伤的。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从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这些错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正如邓小平在 1988 年 9 月 5 日所作《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谈话中所说:“毛泽东同志从 1957 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 1921 年建党到 1957 年,36 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总结历史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可以满怀自豪感地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引下,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健康道路的开辟者。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的一项新事业。

我们从“文革”10 年浩劫中走出来,经过两

年徘徊,就在邓小平带领下,走上了一条无限光明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我们要怎样认识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本质呢?我认为首先要把握住邓小平所说的从毛泽东晚年错误到新时期的三大转变。他在1988年6月22日的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10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按:同时固守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的成规——引者),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社会主义,就对内政策而言,就是全面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改革是与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相伴随的。这就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法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法治;进行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建设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对外政策而言,就是对一切类型的国家开放和交往,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关系,因为中国有世界五分之一多的人口。坦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首先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1949年,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建国后的前8年我们搞得不错。1978年以来,(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

一步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1986年4月4日所作《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的谈话中精辟地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他在1987年4月26日的谈话中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假设那时我们有15亿人口,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6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在1991年8月20日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搞清楚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的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崭新的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谈到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们应持的态度时又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按:指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引用者),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将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世界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

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时起,用一百年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从1949年3月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以来,时间已经流逝了50年。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是,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但取代的过程是曲折的。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同样,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

过程中,我们看到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也是不奇怪的。但社会主义在东欧、苏联的失败,这只是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弊端、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的旧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同它们相反,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对旧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进行了坚决改革的新模式的真正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所说的通过“进京赶考”取得了“好成绩”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新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土地上,不但取代了资本主义和旧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定将战胜企图在中国复辟的阴谋,并且成为人类解放和幸福的伟大旗帜。

(责任编辑 杜 方)

代 购 代 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订购较多的书籍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思痛录	韦君宜	13.00	3.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世纪三伟人	龚育之等六人	28.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直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3.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载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赵桂来	17.00	3.00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与故事	许启贤	23.0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的自述	温济泽	28.00	4.00
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原上草	牛汉 邓九平	24.00	4.00
六月情	牛汉 邓九平	25.00	4.00
荆棘路	牛汉 邓九平	23.00	4.00

(购买全套《思忆文丛》邮费7.00)

《温济泽的自述》,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肺腑之言。本书纪录的有他亲见的许多中共党史重大事件,有他对友谊往来的政治风云人物。他对瞿秋白、李维汉、博古、周扬、胡乔木等人的追忆、评价,尤其引人注目。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29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思忆文丛》收集了1957年的文章200余篇。以此献给曾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以往鉴来”以期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资料中育出更多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邮编:100007,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就难前进

□ 欧远方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
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邓小平(1986年)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改革(变法),有的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次改革,无不经历曲折,斗争总是尖锐的,因为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旧体制中受益的人,常是反对改革的。改革中的倡导者,常遭到政治迫害,或杀头、或坐牢、或流放。但改革的成功,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50年,其中“左”的路线政策推行达二十多年,至“文革”而登峰造极,置国家于崩溃之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有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叶剑英等一批老革命家反思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订中兴之策,乃有改革开放之举,再造共和,二十年于兹,业绩卓著。然而,在改革开放中,同样由于触及利益之得失、转换、消长,因而产生许多磨擦、撞击、曲折,甚至弯路,这是符合规律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

世界充满矛盾。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就充满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中更充满矛盾。矛盾不可怕,就怕回避矛盾,不敢认真处理矛盾。我们亟需继承发扬邓、胡、陈、叶诸先行者之远见卓识、雄伟魅力,务求揭露矛盾,剖析矛盾,寻求解决之法。

从“新的经济增长点”谈起

大家都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两年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我从中国情况出发,忆及二十年前改革从农村首先兴起,从而推动全面改革,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发展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而在当前,当改革已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之际,改革既有新的成就,又有新的矛盾。就农村而言,自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生活逐步改善。到1985年以后,农村新矛盾越来越多,

主要矛盾表现在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对农业投入远不能满足发展农业的需要,对农业的服务体系未能加强(有的还削弱了),在农民中引起不满,关心农村的领导干部和政府界人士也为之忧虑,且不断呼吁,虽采取若干措施,但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市方面国营企业改革措施不断出台,但仍然步履维艰。

解决这些矛盾不是没有办法的，若干年来许多人都在研究改革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突破口，以求得新矛盾的解决。实际上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虽不只一端，而培育农村大市场则为重中之重。对培育大市场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为增加农业投入，二为减轻农民负担，三为健全服务体系，四为给农产品保护价格。这四条，目的都在于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购买力。八亿农村人口（除农民外，还有工商学各界）购买力的提高，将为工业品找到广阔市场，商业也会活起来。农村活了，城市也活了，这岂不是又一轮工农互助、城乡互助的良性循环吗？

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与此同时及以后，类似观点的文章、讲话屡见于报端。海外企业家也已看到，他们对中国农村这块广阔大市场早已垂涎三尺。

然而两年过去了,为“三农”(农村、农民、农业)呼吁者虽多,但实际效果却不明显。即以农民负担一项来说,叫了十几年,国务院出面压下了一批,但农民负担仍未根本减轻,且有的地方有加大之势。从许多农村调查材料和从报刊上登载的资料来看,现在农民负担名目之繁,之怪,之重,皆超出农民的负担能力。上边下来的“达标”负担层层加码,某县农民负担县级下达任务每亩 206 元,乡里 250 元,村里 300 元。农民说村里的负担在 300 元至 500 元之间。农民卖粮时,粮站代扣各种费用,把钱都扣得差不多了。只有饭吃而没有钱花,很多人被迫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现在不仅谷贱伤农,猪贱也伤农,近一年来,猪价暴跌,猪仔也大掉价。皖南山区黟县某些农民小猪卖不出去,又养不起,干脆把小猪仔放到山上变成野猪,自寻生路去了。这两年,粮价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大,谷贱已经伤农,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所养的猪,也大幅度掉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九日)

附：2—甲

110-15

國政擴大會議，以蔣委員長和國家領導制度為中心，以第一等大事為範圍。

聯合團體尋求其他協助。這項運動是天主教社會行動的重要組成之一。這次運動，包括華南地區天主教平權運動，包括教區團體、修會、平教會、教友會、天主教青年團、天主教婦女會等團體，如地方團體的自治會、天主教青年會和天主教婦女會等。此外，天主教平權運動，在天主教社會行動團體網絡中也有發展。中國政府認為，天主教平權運動是與政府對立的運動。這與中國政府對天主教的態度一致。以上這些團體，在中國政府對天主教的態度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中國政府對天主教的態度中，天主教平權運動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政府對天主教的態度中，天主教平權運動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政府對天主教的態度中，天主教平權運動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必须走市场经济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二是战略。战略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孙子兵法》说：“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五成，而天下之不殆也；先知而不知己，一胜一负，五成，而天下之不殆也。”

[illegible]

“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也是中国人民自己实现的。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也是中国人民自己实现的。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也是中国人民自己实现的。”



（2004年12月，第十一届中国法治论坛， 南京中国）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此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音乐》卷中，对“中国音乐”的定义是：“中国音乐是指产生于中国、流行于中国、为中国人所喜爱的音乐。”这一定义，从地域、民族、语言、文化、审美等几个方面，对中国音乐进行了界定。这一定义，不仅明确了中国音乐的范围，也明确了中国音乐的特征。这一定义，不仅明确了中国音乐的范围，也明确了中国音乐的特征。

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8年，日本出口总额为1484.9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对美出口额为547.1亿美元，同比增长1.1%。日本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械、运输设备、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金属制品、农产品等。日本进口的总额为1484.9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总额为281.1亿美元，同比增长1.1%。日本进口的主要产品为农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电子产品、机械、运输设备等。

雖然如此，但這些藝術家在市場和社會地位上，還是一落千丈。許多
一流藝術家，到了一流畫廊，但他們的藝術創作又與當時國家社會的人
們脫離了千里的光年，不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和欣賞。這是一流藝術家與
一般大眾的斷裂，不啻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悲劇。所以，我們必須認真
地思考一下藝術與文化、社會、政治的關係。

2005年12月29日，中国铝业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组建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铝业公司正式进入中国铝业行业，成为国内最大的铝业企业。

● 本公司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收到 2014 年度 100% 的股利，并已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支付完毕。

报纸上的文章

价,真是雪上加霜,农民收入不能增加,购买力如何提高?

农民负担如此之重不外三个原因:

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为创造政绩,下达各种建设指标,但却不给经费,基层政权为了“达标”,只有向农民摊派,否则对上级不好交待。二是来自某些基层干部,手中有权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利用这个权为个人谋利益,现在某些地方小恶霸厉害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打死农民,安徽1999年即有两三起。至于因强迫交费逼死人命的也非个别。三是脱产干部队伍无限地扩张。淮北某村,经中央某单位调查列出详细表格,脱产半脱产干部、人员达46人之多。《半月谈》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同心县,人口仅33万,但吃‘皇粮’者为数1.1万人,超编人员达2800人,这支超编大军中,有大批拿着俸禄不上朝的‘挂职干部’,轮流上班的‘轮岗干部’,9岁、10岁的娃娃干部,甚至个别转干者居然是劳改释放人员。”这种情况,绝非个别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农民如何负担得起?!基层组织和农民关系如何不紧张?!干部大多是先农民而富,许多乡镇干部在县城有住房,生活在城内,坐小汽车到农村上班。这种以城市生活方式领导农村工作的工作作风,能了解民情吗?能密切联系群众吗?能关心群众疾苦吗?能为人民服务吗?

通过对上述种种情况及其产生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培育农村大市场,光从经济角度去改革是没有效果的,必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经济改革才能深入有效,已得到的经济改革成果才能保得住。

再看城市企业改革

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一篇又一篇的理论探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试验,结果是有一批企业搞得很好,但多数未见效果,或效果不大。

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提出了大胆的突破,如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搞特区,引进资金、技术,最后决定推行股份制。就是说

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方法,能用的基本都用上了。尤其以实行股份制代替国家(政府)所有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个大突破。然而事情并不如想象那样简单,某些领导人把这个改革看得太容易,未认真对待。有一些干部,有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他们口头上说和中央保持一致,但行动上则是另一回事。中央说应当党政分开,他偏要党政合一。中央要他政企分开,他偏要政企合一,甚至把党、政职务当作奖品,奖给那些厂长、经理。中央要推行股份制,他们表示积极拥护,积极响应,其实他们并未认真学习,了解其精神,甚至也不懂什么叫做股份制,什么股权啦,董事会如何产生啦,董事会的性质啦,经理如何产生啦,都不甚了了。有不少地方一哄而起,宣布股份化实现了,实质上哪里是什么股份制,换汤不换药而已。淮北工人概括得很形象:“出票子,换牌子,还是那几个×孩子。”因为这种所谓股份制,并未按股份制的规范进行工作,关键性的董事会并不是股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原来把企业搞垮的领导人仍稳坐领导岗位,不过换个职务名称罢了。结果呢?企业经营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股份公司,究竟占多大比例,谁能说得清楚?每一次这样的假改革,都给企业添乱,亏损没有解决,却给蛀虫们增加一次发财的机会,“富了和尚穷了庙”,国家资产在大量流失!

请看1999年6月14日《安徽日报》发表记者潘峰的一则报道:“1997年前后,池州地区对地直企业进行了大面积改制,25户地直骨干企业中,有22户实施了公司制改造,改制面达88%。然而该地区近期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改制后的企业运行状况并不理想,部分企业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从总体上看,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债务负担沉重,1998年底入户骨干企业资产总额为98605万元,负债总额为80786万元,资产负债率达81.9%,有7户已严重资不抵债;二是经营全面萎缩,1998年25户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3304万元,比上年下降14.4%;三是经济效益低下,1998年这25户企业累计实现税利1509万元,比上年下降13%,奖金利税率仅为1.53%。25户骨干企业

11户盈利,14户亏损,盈亏相抵后,净亏738万元。今年头5个月,企业总体运行状况仍走下坡路。”报道分析了原因:“池州的决策者们对此进行了冷静的反思,从形式上看,改制存在着‘一刀切’现象(当时要求必须达到70%以上)。”在改革实施中,采取了‘刮风式’的方法,一些企业不是‘我要改’,而是被动应付。”

像股份制这样复杂的改革,居然沿袭了老毛病“一刀切”,“刮风式”。以这种态度和方法对待改革,怎能产生效果?这样的“改革”还带来了副作用,人们会怀疑股份制是不是灵丹妙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三十年才实行的股份制,并在经营中发挥了良好作用?为什么我们有本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魔术般地实现了“股份化”?这不是股份制本身不优越,而是一本好经被歪嘴和尚念糟了。人们把推行股份制看得太简单。股份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止一处提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高级经济活动,是经营方式和经营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利于资金的高度集中,加速资金的流通,在缓和劳资关系方面也有其作用。说它是经营管理的民主化也可以。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如列宁所说走向“垂死”,且增加了活力,二十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有更大的发展,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与股份制之实施均有密切关系。党的十五大决定在国营大企业实行股份制,在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无疑是一种重大的举措,但落实很难啊!

对于这项复杂的改革,应精心指导,努力学习,以掌握其精神。首先,首长负责,亲自“试点”,取得经验,然后以点带面,逐步推开,分批分期完成,期以一年、两年、三年,按股份制规范加以改造,这是我们共产党长期在实践中创造的有效方法。而计不出此,摇身一变,像点石成金一样,宣布股份制改革一举成功,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个中原因,不在“工作作风不深入”、“官僚主义”——这些成份固然有,根本的问题在于某些掌权干部,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权力过份集中”的痼疾不从根本上改革,推行股份制肯定是搞不好的。

如本文开头所说,任何改革都涉及权力的

再分配,真正的股份制也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大改革,掌权者抓住权力不放(核心是人权、财权),这种情况不改,要想把股份制建立好,无异缘木求鱼。可见,经济改革不管有多少妙策,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证,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

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最先提出的,那时,农村改革完成之后,中央又提出“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革,可惜未能落实,错过了许多时机。以农村来说,假如农村改革实行之后,紧接着就趁热打铁推行村民自治、“还政于民”,让农村人民当家作主,改革的成果还易于巩固,农民也就有权抵制任何不合理负担。中国封建主义影响太深,农民民主意识薄弱,没有这方面的启蒙和制度的保证,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还是个别或少数领导人说了算。许多基层干部十几年来比一般农民受益多多,是既得利益者。现在来搞民主选举,阻力不知大了多少倍。邓小平在1986年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邓选三卷76页)“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发展,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邓选三卷177页)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落后,已越来越暴露改革中的矛盾。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如鸟之双翼,有双翼才能起飞,这也就是当年为什么提出要“全面改革”的原因。邓小平在1980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政治体制弊端主要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然而后来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以至于经济改革成功的同时,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因不受制约和有效监督而产生严重腐败现象——腐败风蔓延之广、之快,也是始料不及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十五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报

告,且单列一节,提出了建立制约机制、监督机制、舆论监督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决策,有识之士不断在探讨,如何使十五大的决定得到落实,中国的制约机制究竟是个什么模式?它的形式是什么?方法是什么?

所谓制约机制也就是制衡,其精髓在于把过份集中的权力加以分权,且互相制约。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制约的机构之设置,其所起的作用大小,要看皇帝开明程度如何,不但是人治,而且实质上仍是封建专制。资本主义兴起,欧美实行了彻底的民主革命,提倡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在政治体制上则实行权力制衡,方法是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互相独立,互相制约,这就是以法治代替封建时代的人治。二三百年来,三权分立制度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它对巩固政权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已证明行之有效。各国政治体制采取的形式虽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形式,为什么不能借鉴这种形式,创造自己的形式,以适应中国国情呢?但这种权力制约机制的方法、形式,也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独专,而是人类几千年来政治管理经验的积累,并成为人类政治、文化的共同财富,正如“市场经济”、“股份制”不存在姓资姓社一样,它也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它们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同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要搞好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要搞好社会主义,从政治上说,权力制衡也是不可逾越的。中央已提出“依法治国”,经全国人大通过,写入宪法,单列一条。实现依法治国,必需有一种以权力制约为基本内容的方式来体现,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如邓小平所一针见血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

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进行,互相促进,中央提出“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并单独提出“舆论监督”,不是没有原因

的。分权的作用,核心是便于互相制约,实行有效监督。至于舆论监督,则是另一种有效的监督,二者可以互为表里,构成监督体系。制约机制的监督产生于权力机构之间,而舆论监督则属于群众性的监督,这种监督具有相当大的威力。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政治制衡机制的同时,广泛推行“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二者对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运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监督方法也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同样可推行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也把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进去。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就是靠发挥这些政治优势战胜了国民党而取得了政权,并通过宪法而加以巩固。假如我们反而放弃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政治优势,似乎这些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这是令人不解的。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本质,就是让人民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民主自由权利。新闻舆论不是洪水猛兽,不是异端,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本身所需要的。凡是爱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依法应用它,反对腐败和一切不正之风,弘扬正气,为巩固人民共和国尽一份义务。环视今日之中国,加强舆论监督,不但合法合理合情,而且为客观形势所必需。目前各地“腐败风”、“浮夸风”、“官僚主义风”已成为社会公害和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三害”也就是“三乱”,它们已乱了国家,乱了社会,“三乱”不除,国无宁日。我们不需要乱,需要安定,为建设创造良好环境。为此,我们必须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清除“三害”中的巨大作用,绝不能把新闻舆论监督清除“三害”看作“添乱”,它只能给“三害”添乱,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充分运用舆论监督反对“三害”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十年过去了,事实已证明,邓小平所讲的“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论断之正确。一切宣称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人,重温邓小平这个论断,必须以实际行动投入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

(责任编辑 杜 晋)

诚信如金

□ 郭毅生

诚实是金，意味着真善美；谎言如粪土，意味着腐败和堕落。诚实和守信连缀在一起，便构成“诚信”这个道德范畴的专有名词。它被公认是做人 and 处事的规范和准则，从古至今像一棵常青树一样存活在人间；谎言和欺骗也连缀在一起，但它总要遭到社会和公众的谴责，像老鼠一样不敢见天日。

对军事家而言，特别是在战争中，有“兵不厌诈”之说。一切为了战胜敌人，设谋用间，是孙吴兵法所乐道的。但对建国立业而言，开诚布公，取信于民，则不仅是座右铭，而且是成功和不败的基石。

验之古今中外，诚实和守信是创造大业绩的精神财富，或者说是一块闪烁的金牌匾。享誉全美的钢铁大王卡内基，他不采取倾轧苦难而是诚恳联合，他的钢铁产品质量上乘，有名的旧金山大桥屹立至今，成为他的丰碑。中国的大庆油田，他们的成功被总结为：“三老四严”。“三老”，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的本质就在于认

真，而决不是假冒伪劣，对国家和人民进行欺骗。北京的同仁堂，不仅对贫富一视同仁，它的药材更是货真价实。它在长白山有自己的人参园，在吉林开辟了广袤的养鹿苑，所以它的参茸丸不仅有洁白的外壳，而且它的内涵更是丰泽滋润，代表了中华民族医药家一颗诚挚爱人的心。香港的“十大财东”，人们但知其富甲南海，却很少了解他们原是严守信誉的诚笃的东家。如是实例，读者自可从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中，列举出更多更多。

在中国璀璨的古代文明和辉煌的炎黄文化中，诚信和仁义一样是它的基本支柱。儒家把“仁、义、礼、智、信”并列，被称为道德范畴中的“五伦”。近代之前的二千年岁月，“孝、悌、忠、信”是衡量士人的一个标准尺子。商品经济的涤荡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扫掉了许多早就该扫掉的垃圾。但是，诚和信则不可像泼脏水一样被泼掉，诚是内在的美德，信是这种美德外在表现。在《论语》中，孔夫子倡导的是：“言忠信，行笃敬”。这位

文化巨人自己也身体力行，他“主忠信，过则勿惮改”。孔门七十二贤中的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即是说信和义都是具体可见诸于行为和实践的。孔子还有句震古烁今的名言，他指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先秦时代的诸侯和霸主，有些人是体验过这其中三昧的。

当时出于争霸的政治需要，“诚信”常被诸侯作为招贤纳士、收取民心的一种手段。《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召王即位于国势倾危之际，想招贤纳士以图振兴，他筑“黄金台”礼敬师事郭隗，表现了诚信之心，于是乐毅和邹衍等一批军事和政治人才奔赴燕，助燕强盛起来。秦国敝处西戎，用商鞅变法图强，商鞅在颁布法令之先，曾有一段“徙木立信”的故事，传扬千古，为后世当作典范。秦末群雄并起，发生楚汉之争，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行军秋毫无犯，马上争取到三秦父老百姓的信任。

但是，事物是复杂的。真理与谬误、诚实与谎言，相生相克，同时并存，互为消长，此种社会现象，无论在驿路传烽的古代，还是媒体发达的今世，都不罕见。封建专制统治下，只许皇帝扯谎，不许百姓说假。煌煌明诏，什么“奉天承运”，“拯我黔黎”，都是颠倒乾坤、鱼肉百姓的代名词。晚清的咸丰皇帝，怀疑百官弄虚作假，一次他问某大臣：“卿以为报捷奏章可信者几何？”对曰：“不过十之二三耳！”这就是说

70%至80%是谎话。曾国藩被尊为咸丰、同治的中兴名臣，是个正襟危坐的理学家，他在《家书》中谆谆教导家人子弟：“要早起，不谎语”，这响当当的名句，言简意赅，可圈可点。但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谎言时代，在官场中，为保住乌纱帽，他也往往是要扯谎的：1864年6月，曾军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城，他在奏报《克复金陵折》中，谎话层出。如天京围城中军民总共只万余，他却奏称有兵民十多万，以此开脱他久攻不克的失职；幼天王逃亡出去了，他奏报称死于乱军中以塞责，等等。这些欺骗招致朝廷的不满，于是有派大臣调查之议。

日记应该是写真或心灵的独白，但同治、光绪年间，无论官吏或士人的日记也往往不真实。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里，

首先抄上谕，又不惮涂改。他早有准备，期待皇上御览。鲁迅读后说：“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三闲集·怎么写》）在有名的《翁同龢日记》中，翁为了避祸，将戊戌变法数月的日记毁掉，重新改写。既可怜，又可叹！我曾阅读过他先前接见谭嗣同的日记。翁在日记中评价谭为“杰出者”，政变后却不得不涂改为“桀傲者”。在极权专制雷霆下，写日记也不自由，还有什么诚实存在的余地？撒谎是罪过，但逼人撒谎的体制，才是该“纸船明烛照天烧”的。

据载：晚清的慈禧太后，一次在颐和园中的大戏台看戏，光绪皇帝侍立在旁。慈禧很喜欢一小丑的风趣表演，

便宣上来颁赏并赐座，小丑机智地谢道：“皇上还站着呢！奴才哪敢坐？”慈禧这才说：“皇帝也坐下。”在那女皇专制的年月，王公大臣、百官九卿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个小丑敢于出来说真话，这岂不与《皇帝的新衣》童话相似么？大清朝堕落到这个份上，不被推翻才怪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个可资借鉴的镜子，政治上谎言弥漫，纵容和助长贪污腐败，将会使国家和民族坠入无底深渊。五四时期一位先锋人士呼唤道：“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人，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让我们仔细玩味他这段含义深刻的话，身体力行，为振兴中华，作一名坚强的战士。

（责任编辑 程 度）

读第一期后的几点意见

□ 王 荆

《炎黄春秋》第一期看了一部分，先写下一些想法。

编辑部的开篇文章写得不错。给我的感觉是：高瞻远瞩，眼界开阔，态度鲜明，坚持原则。

“六人谈”各有特点和偏重，是对刊物的回顾与肯定，也是对刊物的展望与期待。

《“大跃进”席卷神州，周恩来险些辞职》和《令人赞叹的生化学家“陆大傻子”》两文，很值得一读。这里提供的正是“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全党全民都应“记取”。

《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是我拿到刊物后，最先阅读的一篇。1947到1948那一年我正在北大，读西语系四年级。胡适当时的复杂心情和窘态，文章写得很细，很深，很透，我们这些过来人会是深有同感的。胡适当年大概是很想在国共之间走“独立”、“自由”的第三条道路。但总起来说他偏向国民党，远非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也是很明显的。既然做了“过河卒子”，就难以后退了。傅斯年说：“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

但“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平时尽可小骂，关键时刻则大帮忙，这是深知胡适的不刊之论。不过胡适这一本色，鲁迅也早就看出来了，而且指出很可能充当了贾府的焦大。

文中有一错字，较重要，即68页第一栏倒第2行末，“并使扬墨之外的超然分子……”句中的“扬”，误，应为“杨”。“杨墨”指战国时代的杨朱和墨翟。孟子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话，见《孟子滕文公》。“杨墨之外”典出于此。

《说长道短刘师培》一文也颇引起我的兴趣。但文中说到：“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按：应应为‘《警钟》日报’），刘师培与林獬担任主编”，与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所记有异。据《年谱》：《俄事警闻》日报系由“蔡元培先生及王小徐、汪允宗、蒋维乔等组织对俄同志会，出版”的。1904年2月，“对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原主编王小徐他去后，蔡元培先生接任《警钟》主编”。同年7月蔡元培“辞去《警钟》日报主编，推汪允宗接任”。1905年2月中，“《警钟》日报因鼓吹革命，报馆职工被逮捕，报纸被封停办”。以上我未作进一步的考证，不敢断定孰是。

“四人帮”最后一次反扑

□ 张根生

1976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财政经济情况都完成得不好，国务院为了扭转工业生产下降的趋势，向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报告，提出在7月6日召开一次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没想到“四人帮”却伸进了黑手，提出要批判所谓“条条专政”。这实际是对1975年邓小平抓整顿，反派性、抓生产、抓铁路、抓钢铁的一次大反扑。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有一亿多农民吃不饱饭，铁路运行很不正常，煤炭和电力供不上，许多工厂停产、半停产。周恩来患重病，国务院工作急需加强，毛主席在1973年末决定起用邓小平，任命邓为党中央副主席、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日常工作。这是“四人帮”极端反对的，但又无法改变。小平同志首先抓了铁道部，调万里任铁道部长，召开了铁路工作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突出抓整顿纪律，坚决打击、镇压破坏铁路运输的偷抢行为，对闹派性的头头一律调开。他接着抓冶金工业，都很快见到效果。邓小平的一系列整顿措施，确保了经济较快增长。不久，毛泽东突然提出看《水浒》，要批宋江的投降主义，又提出要反对修正主义，既反教条主义，又反经验主义，使大家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觉得它与当时的工作实际毫无联系。人们在心里拥护邓小平抓整顿，反派性，把重点转向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敢直接提出来。即使这样，还被毛泽东指责为“纲目颠倒”了，“抓目不抓纲”。“四人帮”也乘机攻击邓小平同志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泽东当然不能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一伙就把批邓塞进了计划工作会议中来。会议于1976年7月6日召开预备会，由谷牧副总理和李素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主持，宣布了会议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为批邓的“条条专政”，第二段是安排下半年计划，时间各为七天。当时国务院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副总理都因病休息，不在北京，实际是他们已无法工作了，只好躲出去。只有谷牧同志一人在家，不得不主持会议。8日会议正式开始，由谷牧讲话，并有一个书面自我检讨。李素文、姚连蔚是中央指定参加主持会议的（纪登奎、吴桂贤也是副总理，但没参加会议，陈永贵只参加两次汇报）。会议正式代表174人，各省市为92人，中央各部门82人，会议还邀请了14名工人和14名基层干部代表列席会议，还有吉林省两名造反派列席参加并有书面材料。我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

第一阶段实际开了19天，到26日才转到第二阶段。在我们中南组的会上各省发言对国家计委、各部委多是具体工作方面的意见，没有上纲上线。大组会是全体会，只开过两次，一些

同志的发言,都是作自我批评,没有推到邓小平身上,更多的是开中组会讨论,人人发言,自己审定记录,出简报。

少数紧跟“四人帮”的人,心领神会地批邓。有的说,邓小平1961年抓铁路就是垂直领导,地方党委只能监督保证,削弱了党的领导,1975年又是这一套,这就是“条条专政”;有的说“万里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要管一代人,管整个过渡时期;还提出反派性是主要矛盾,就是整造反派。万里派许多工作组去积极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万里对铁道部一批二撤,在整顿的名义下打击新生力量,破坏了老中青三结合”;“万里一到铁道部就三气未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还说不管八三、四一、九三、四一,还是六厂二校,二七车辆厂,都要先搞好生产”;“万里是紧跟,不遗余力的推行邓小平路线,大搞资产阶级专政”等等。会议开到十天左右,上海一个革委会副主任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直接策划,首先提出来,去年夏季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是怎么回事?是否邓小平主持开的?讨论的什么内容?矛头转向国务院李先念、余秋里,也包括华国锋等副总理。辽宁省革委会一个副主任,在毛远新的直接支使下,与之相呼应,提出75年计划会议问题。当时毛远新偷偷跑到开会的京西宾馆给人出点子,策划攻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当时开会人员不准外出,每天晚饭后只能在京西宾馆大院散步。这时我们知道毛主席已经病危,气管被割开,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在7月25日晚开的召集人会议上,谷牧传达了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中央下达的指示,除了讲会议下一步议程外,还专门讲了这次会议上有的省市提到了国务院务虚会和去年计划会议问题,中央指出不管那两个会有什么错误都可批评,但本次会议还是批条条专政为主,仍按原计划进行。谷牧还作了简要说明:关于务虚会实际上主要是讨论了计划工作的问题。在中央解决了铁路、冶金问题之后,觉得一个一个解决不行,应把计划问题一起进行统筹解决。当时会上认真总结了过去计划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如何改进工作。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到务

虚会,我们都向中央作了反映,报告了政治局。会议转入第二阶段,主要解决下半年计划安排问题。

当时的一些报纸是不切合实际地报道:由于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形势大好,经济有新的增长,这都是骗人的鬼话。实际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经济工作,抓铁路、抓钢铁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比74年增加了480亿元,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粮食总产量达5690亿斤,增加13%;钢达2390万吨,增13.1%;原煤增16.7%,原油增18.8%,铁路货运量增12.9%,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都比较好。但是“四人帮”又搞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再次打倒,使国务院无法正常工作,经济工作再次造成严重混乱,生产大幅度下降,1976年比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7%,大大低于7%的计划要求,钢产量只完成计划的79%,铁路货运量只完成计划93%,财政收入减少了50亿元,外贸出口减少了10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状况都很不好。因此,才建议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安排下半年计划任务,结果又大搞批邓的修正主义路线,经济情况更加下滑。

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人对批条条专政并不积极,只是对计划安排的过于集中,对地方项目安排减少了,财政上给地方机动权小了,原定的物资、燃料、资金要抓紧落实等提出意见。谁也说不清什么算条条专政,又怎么解决。最后华国锋作了结束讲话,也是说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慎重研究,不能轻易改变。

第二段会议只进行两天,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人们更加无心讨论了。7月30日晚,华国锋作了简要的讲话,会议就仓促结束了。虽然有少数人紧跟“四人帮”,妄图进行一次大反扑,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和国务院领导人,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但是由于大多数人眼光是清醒的,立场是坚定的,识破和抵制了他们的阴谋破坏,更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和丑恶的面目。

(责任编辑 舒 蓝)

国内外的政治实践表明,制止腐败行为,单靠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是远远不够的,主要依靠法律和广大人民的民主监督。而民主监督的有效武器之一就是舆论。邓小平说,“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的作用。《“关系牌香烟”报道始末》一文,从侧面反映了舆论监督在廉政建设中的威力。有些人害怕舆论监督会影响社会稳定,实际上,以“莺歌燕舞”掩盖歪风邪气,社会反而无法稳定。只有公开地无情地揭露贪官污吏及一切不正之风,才有助于社会真正保持稳定。

当然,坚持正义的新闻从业人员可能因此遭受非难,但是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只要像彭德怀那样,具有为人民的疾苦“鼓与呼”的精神,同邪恶的腐败行为作斗争,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法律的保护,成为亿万百姓钟爱的新时代的喉舌。

“关系牌香烟”报道始末

□ 陈英茨

《炎黄春秋》1999年11月号上,刊出杜导正同志《鼓励记者讲真话》一文,其中谈到《光明日报》1982年披露一烟厂“万条香烟送人情”的一组连续报道。这组报道在当时的反不正之风中,起了积极作用,在新闻报道中也有创新。虽然事隔十七八年,但对新闻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笔者是当年这组报道的亲历者之一,很愿把其来龙去脉以及得与失,略作介绍。

1982年4月,笔者收到山西省科委一友人转来的一封揭发信。寄信人是某卷烟厂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邓俊三,揭发该厂把五千余条香烟送人情。我这位朋友见义勇为,支持揭发者的义举,并请新闻单位给予援助。我把这封揭发信排出小样送总编室,当时一位副总编认为烟厂以烟送人情可能存在,但是否有这么多,需要核实。不久,核实材料转回来了,认为事实没有出入。随即领导又指示,把小样寄山西省委,请求

调查处理,然后再考虑是否发表。

当年8月,杜导正同志由新华总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我把此稿跟他谈了,他很高兴,说党中央现正在反不正之风,这个材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好作为一个典型抓它一下。于是即派我同编辑徐尊六一起去太原,拜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罗贵波。罗省长对揭发信公开见报表示支持,他说,已对报社的材料作了批示,太原市纪委已为此派人到烟厂调查。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和太原市委书记李好山等领导也表示支持,并准备在调查结束后对此事作出处理。我们拜访太原市纪委领导时,他们说,来信揭发的问题是属实的,从1979到1981年有单据可查的,乱拿乱送的香烟就达一万多条;该厂管理混乱,党组织生活不正常等情况也很严重,对此要一查到底。劳模出身的市经委主任对烟厂存在的问题也感到十分气愤,对我们说,报社公开揭露非常好。

回到报社，杜导正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指示我们再去太原一趟，把收烟人的名单拣重要的抄一份来，公开见报；同时开一些座谈会，把发言整理出来见报。8月12日，揭发信在《光明日报》一版重要位置发表后，我们就奔赴太原，同市纪委的同志一起到烟厂，从4600多张白条中，摘取了一些，将接受卷烟厂领导人送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制成表格寄回报社。

8月26日，本报在《同志，请警惕“关系牌”香烟的污染》的标题下，发表了太原市几名读者的来信和接受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许多读者投书本报，表示非常支持，并希望舆论在纠正不正之风中起促进作用。

27日，又刊出了记者整理的《烟厂部分人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言者大多数是知情人，揭发比过去更详尽。

28日，《光明日报》又刊载了由山西省轻工厅、省经委、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烟草公司、省委研究室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发言。大家在发言中就不正之风进行了严肃而中肯的批评。

8月31日，报上又发表了支持揭发“关系牌”香烟的读者来信，编辑部还加了《编者按》。

此后，《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同志又在众多读者来信中，选择了一些陆续发表。这些读者就卷烟厂问题继续提出批评并建议：对白拿烟的单位和个人，限期一个月交还烟款；对检查不好、拒不交还烟款者可再公布名单。有的读者说：“纠正不正之风应见行动”，他们认为“公开点名好”，“要把公布名单的做法坚持下去”。

接着，报社又发表了北京、武汉、苏州等地以及海军、装甲兵等单位的一批读者来信，也加了编者按。

9月10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山西轻工业厅党组要求下属单位以卷烟厂为镜子，检查侵占国家财产的不正之风等措施。该厅还通知各地市轻工业局、直属企事业单位党委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严格控制报送试用产品、样品和展品等，坚决刹住类似卷烟厂发生的不正之风。

9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接受香烟单

位和个人退还烟款的消息，并发了编者按，对许多单位在领导督促下，知错改错，迅速退还烟款的行动表示欢迎。9月16日，轻工业部纪委组织的座谈会发言在《光明日报》刊出。杨波部长在会上说，光明日报关于太原卷烟厂的报道，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的监督，部党组表示热忱的欢迎。卷烟厂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烟厂有，酒厂也有，其它一些厂也有类似问题。批评这件事，对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有很大好处。过去，我们部党组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在会议上反复讲过，也发过多次文件，还定出了《约法五章》，但现在看来，对下边经常检查不够，部机关一些同志也未按这五条办。接受烟酒一类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影响就更坏，不能把这件事当成生活小节，必须提到有关党风的高度上来对待。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争取三个根本好转，其中之一就是党风的根本好转。党风怎样，必然影响到民风，影响到社会风气，所以说，认真纠正卷烟厂这样的不正之风，就是贯彻十二大精神，就是落实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

紧接着，《光明日报》在9月27日刊出山西省委办公厅就本报报道卷烟厂问题发出的通知，敦促吸“关系牌”香烟者赶快退还烟款；同日，还发表了轻工部烟草工业研究所四同志退还烟款的消息和三封读者来信。如太原市供销社一读者来信说：“这个时期，在我们太原市，从机关到家庭院落，到处可听到人们在议论，‘关系牌’一类的不正之风，不能让它刮下去了。”河北省承德市一读者来信说：“揭露烟厂领导人和有关单位及个人的不正之风，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不这样做，党风的根本好转谈何容易！”

9月29日，报社发表了山西省经委就卷烟厂问题发出的通知。内称：“报道是对烟厂和省工业部门及企业的有力鞭策”，并特别强调广大职工群众有监督的权利，对违犯规定的人，要坚决抵制和检举揭发；对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要从严处理。太原市委也要求烟厂领导诚恳地接受批评，并要求其它单位党委也要认真学习省委办公厅的通知。

10月7日,报社又发表了记者采写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努力的报道。如轻工业部党委派出调查组进驻烟厂;山西省直属机关党委和省轻工业厅成立专门班子负责清退落实工作;太原市纪委派出的调查组由5人增至13人。《光明日报》还刊出了山西省轻工厅副厅长写的《我的检讨》、轻工厅一位处长交出了白拿的43条烟款,其他许多收过烟的人也纷纷还款。在清退过程中,有的虽有白条、送烟单据,但本人并没有接受香烟;有的白条上记的多而实际拿的少;有的白条记的少而实际多;有的付了款而没有销帐,还有属公用香烟而记在个人名下,还需进一步清理。

10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我执笔,并和徐尊六共同署名的《一个勇于抵制不正之风的战士》的通讯,表彰揭发人的事迹,还在一则短讯中表彰了原厂党委书记秦斌,他从不白抽厂里的烟,而是到市场去买,虽然这位老同志已去世,厂里的人还很怀念他。

《人民日报》于10月15日,就《光明日报》对“关系牌”香烟的报道,登了篇综合消息,还发表了短评《要有那么一点志气》,评论说“不正之风是能够刹住的,《光明日报》旗帜鲜明地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白拿香烟问题,抓住不放,……对纠正不正之风是一种切实的贡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其它报纸,也对《光明日报》的报道作了广播和评论。由于山西省委和轻工业部坚定地支持报社,对山西及轻工系统的反不正之风,起了很好的作用,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这组报道中,由于我们工作不细,也有一些缺陷。例如,公布的名单中,有王茂林同志收了四条香烟。罗省长指出这不确实,“他不会吸烟,也没收烟。”他还说,近日,太原市政府要进行换届选举,中组部对市长人选已作了考察,群众对不正之风反应强烈,这个名单的公布,恐怕对选举要产生影响,所以,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讲明茂林同志没有收过烟。他建议报社最好对此事发个更正,以挽回影响。

我听了头脑不禁嗡了一声,立刻冒出汗来。怪我们太疏忽大意了,事前向王茂林同志核

实一下就好了。省纪委副书记毕义举也对我说,原省公安厅厅长郭庆年同志向他诉委屈,说他的烟是烟厂按半价卖给他的。后来在清退过程中的确看到白条所记并不完全正确,为此,报社在10月7日公布部分单位和个人退款情况一览表时,特加一说明:“8月26日所列名单中,有经烟厂厂长索占忠批准送给太原市委书记王茂林同志四条烟,经查,王未收,是被烟厂办公室主任挪为招待用了。”后来我再去太原时,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维庆、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邦应一起,同我到王茂林同志家拜访,当面道歉。可惜王外出未归,只得写了一封致歉信,托维庆同志转他,总算了结了更正的心愿。

在离开太原前,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见了徐尊六和我,由省委副秘书长萧聪慈作记录。霍书记说光明日报对烟厂的报道很好,推动了山西反不正之风的斗争。记者表示这是与省委的支持,特别是罗书记的指导分不开的,由于记者的疏忽,在王茂林收烟的问题上给省委添了麻烦,甚感不安。霍书记说在个别枝节上出点问题难免,今后吸取教训就可以了。

此后,市纪委调查组全面查清了烟厂存在的问题,证明揭发的问题全部属实,上级有关领导为此调整了烟厂的领导班子。

事后,新闻界同行盛赞这组报道干得棒,有的说“漂亮”。我实事求是地说,这哪里是记者的功劳啊,这是在杜导正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搞成的。当初我只想揭发信登出就算完成任务了,哪里想到搞这么大规模和这样长的时间啊!

时间过去了十七八年,今日的那个卷烟厂怎样了?不幸的是,从1999年起,这个卷烟厂的职工和省烟草公司的离退休干部,多次上京到有关领导机关,揭发该厂厂长等的重大经济问题,现厂长已被免职,中国烟草专卖局已派出调查组去调查,相信不久即会水落石出。这使我想到了,新闻报道最多只能起个治标的作用而不能治本。要治本则必须改革企业制度,并伴之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法制的健全。不然腐败行为就会像毒菌一样,在适当的气候下重复滋生,烟厂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杀害项英的凶手刘厚总

□ 徐则浩

皖南事变后，项英在转辗隐蔽的日子里，被睡在身边的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像这样的反革命暗害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项英生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的无数次残酷“清剿”，项英坚定、沉着，带领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反“清剿”，屡屡化险为夷。反动派用重金悬赏缉拿项英，也化为泡影。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严令在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搜查清剿流散的新四军，缉捕项英，也没能得逞。而项英同副参谋长周子昆，带领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和一批警卫人员转辗隐蔽在泾县南部山区，由螺丝坑到濂坑，再到赤坑山，逐渐聚集新四军的失散人员由三十多人到七十多人，建立了党的临时总支部，同地方党组织也取得了联系。痛定思痛，项英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惨重损失深感内疚，一再表示突围出去后要向中央作检讨。

1941年2月底，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项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暂时隐蔽，策划向江北突围。突围的路线经过侦察初步确定下来了，突围

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项英隐蔽在山上的一个小洞——蜜蜂洞里。由于洞小，晚间只能横着住四个人，除项英外，还有周子昆、黄诚（周子昆的警卫员）、刘厚总（副官）住在这里。李志高、谢忠良、项英的警卫员以及其他人员则分散隐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处。3月14日凌晨，刘厚总趁项英、周子昆、黄诚熟睡之际，向他们开枪，项英、周子昆被打死，黄诚身中两枪，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刘厚总罪恶的手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这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又一历史惨剧。

是刘候忠还是刘厚总

刘厚总究竟是个什么人？多年来，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但总感到掌握的档案资料有限，迄今为止只有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一）“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呈报刘厚总供称枪杀项英一案的办理经过（1941年5月12日）；（二）黄绍耿令“泾县县长”田易畴彻查刘厚总案并详细具报的电文（1941年10月28日）；（三）《宣报》（“皖南行署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办）第875号副刊《皖南绥声》所载刘厚总：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1942年7月10日）；



1937年12月，中央为加强中共对新四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图为军分会书记项英

(四) 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1948年5月10日)。80年代初，我同唐锡强曾经直接访问了不少知情的老同志，查阅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1980年6月下旬，到刘厚总的家乡湖南耒阳作了调查访问。这次调查访问，基本理清了刘厚总的家世和他在当地赤卫队、游击队的活动以及他编入新四军后的情况。

在我们到湖南耒阳访问之前，新四军老同志刘奎在《红旗飘飘》第22集的回忆文章和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论著中，都曾提到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是“刘候忠”，但是耒阳县的同志都没有注意到。而该县公安局、民政科、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正在查询一个名叫刘厚总的人的下落。刘厚总，该县汇头乡曾家冲人，自1938年春随耒阳红军游击队整编到新四军开赴皖南后，曾于1939年春回家乡一次，此后杳无音讯。他家乡已没有直系亲属，知情的时代

人也大多去世。

后来，我们在县城找到了惟一的知情人，时年66岁，离休前任耒阳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王开运。

刘厚总，1904年生。这个年份，是王开运根据刘厚总比他大10岁推断的。在曾家冲，刘姓是大姓，刘厚总的父亲是刘秀仕，秀字辈、厚字辈、德字辈往下排。“刘厚总”三个字同前述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档案资料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肯定，先前我们党史文章中所写的“刘候忠”，是刘厚总之误。

据调查了解，刘厚总的家庭是贫苦农民。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赤卫队使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拼，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娶”为妻子的事。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

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是革命干部还是“山大王”

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耒阳游击队先后在天门山、通水铺集中整顿，后经谢竹峰同刘厚总商议把部队开到刘的家乡——江头刘祠，整训一个月左右。王开运就是在通水铺经刘厚总指派，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随部队开赴皖南，尔后在新四军中长期在皖东参加抗战的。王开运回忆说，耒阳游击队开赴皖南集中前，刘厚总曾把一部分枪支留下来，埋藏在家乡。

1938年3月，在南昌的新四军军部派中校参谋谢忠良（此前任八路军学兵大队副大队长）前往湘南郴县、耒阳，整编下山的红军游击队。学兵队提前结业的学员王征明、欧阳琮、张南基被派随谢忠良一道工作。他们先对由周里、谷子元、李林领导的郴县游击队进行整训，告一段落后，北上耒阳同刘厚总领导的耒阳游击队在江头刘祠会师。

王征明回忆当年耒阳游击队整训的情景时说：“刘厚总是坚持耒阳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当地人多知其名。有一次我们进城宣传抗日，刘同往。耒阳人闻听刘厚总来了，便纷纷围着他看。刘身高约1米75，膀大腰粗，相貌甚丑，面孔奇黑，鼠目黄牙，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想上有抵触。他手下一个排长暗中活动，对抗集中整编北上抗日。”

耒阳游击队整训期间，群众来访送子参军的甚多。按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不能随意接收的，但是耒阳游击队仍然接收了一部分，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此时的刘厚总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确实惶惶然不知所措。据现存耒阳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的谢竹峰回忆

稿本中说：“有次国民党县长陈必闻同我们谈判，追问监狱暴动三十多人，说是我们搞的。正在谈判时，刘厚总来电话，问几个逃出来的人与我有关系的，是否接收。我说把那几个留下。”“部队开到耒阳火车站，陈必闻不同意在城内大街走，改为沿城外公路到火车站。几十里外的群众，仍赶来欢送，场面极为热烈，大快人心。刘厚总问我，可不可以喊几句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我立即说不能喊，他就不喊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刘厚总这个人头脑实在太简单了。”

谢竹峰回忆稿中还说，1938年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后，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调戏妇女、侵犯群众利益、抓老百姓的鸡鸭烧吃等违反军纪的事发生。约在9月，刘厚总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同在这里学习的谢竹峰不期而遇。刘在第二十四班，谢在第三十九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耒阳打游击多年、从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山大王”思想甚重的刘厚总，组织性纪律性极差，难过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一心想回老家。谢竹峰在回忆材料中，维妙维肖地勾勒出刘厚总在中央党校的表现，谢说：在中央党校学习“快结束时，碰到刘厚总，他给了我20元用。他原来在耒阳当游击大队长，名声很大，群众叫他‘总老爷’，他的确是个土皇帝，从来没有离开耒阳。现在他在外面，社会常识少，‘总老爷’的架子又放不下，文化低，说也说不过别人，他相当孤立。他见到我非常亲热，生怕离开了我，怕和我失掉了联络，其实他的住地离我只有几十丈远，每日吃过饭即到我这里玩，他非常想念家乡，实际上他是想念他的少年老婆。他恳切要求我向中央组织部请求回南方工作。”

1939年春，谢竹峰同刘厚总得到中组部的批准，挂着二等训兵的符号，佩带八路军臂章从延安坐汽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伍云甫同志。又由西安经成都、重庆、遵义、贵阳等地，到桂林新四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回到湖南。刘厚总回到耒阳后，发现“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枪支还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队伍就地打游击了，便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要求分配

工作,先在教导总队短期学习,后在军部担任副官处副官。这样的工作分配,说明新四军干部部门对他的实际表现是了解的,而刘厚总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对组织的不满。他在副官处管理饲养班、木工班,工作吊儿郎当,作风流里流气,满嘴粗话。当年木工班战士、离休前任繁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周汉清,1980年10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刘厚总在副官处的表现说得很具体。周说:刘厚总当副官,副官是营一级干部(起码是副营级)。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他动摇,他怕死。对组织、对同志不满,动不动发肝火,开口骂人,骂娘,“×你娘”。有次日本飞机在云岭附近轰炸时,刘副官还在云岭街上调戏黄烟店斜对门的一位妇女。调戏妇女,他是经常的。刘副官意识不好,拉这个打那个。副官处有科长、副科长,他对我们说,不要听他们的,要听我的。

在皖南事变后的突围途中,1月14日在大康王附近,刘厚总同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相遇,随即一起行动,并被留在项英身边。久经斗争考验、政治警惕性非常之高的项英,竟对刘厚总这样一个人失察,实在是他的千虑一失。据项英当年的警卫员郑德胜回忆,他曾听到项英对周子昆说过,刘厚总这个人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皖南事变发生后,同项英在一起的谢忠良在《沉痛的回忆》一文(见《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专辑》一书)中说:“刘厚总当时是副官处副官,是个黑粗大汉,力气过人,枪法又准,深得项英同志的赏识。项英同志走到哪里,总是刘厚总跟着。他的最老的警卫员夏冬青同志因个子小,力气不大,枪法不准,就被疏远了。项英、周子昆就带着刘厚总、黄诚住在上面的洞里,我和李志高等二十几位同志住在下面的洞里。”

当时随项英一起行动的军部侦察排长张益平也回忆说:“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在1月14日傍晚突围途中,他遇见项英后便跟着项英。此人语言粗暴,太野蛮,排挤项英的警卫员。李志高、谢忠良曾提醒项英,说郑德胜、李德和是跟你多年的警卫员,应将他俩放在你跟前。但项英信任刘厚总,没有采纳李、谢意见。”周子昆的警卫员

黄诚的回忆,也讲到项英如何信任刘厚总。他说:“刘厚总平常老是喜欢跟在首长后面吹吹拍拍,有一股国民党阿谀奉承的气味。可是项副军长特别宠爱他,说他办事利落,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在突围中,到哪里都带着他。不久前在大观山隐蔽时,刘厚总看中了一位排长的新驳壳枪,提出要用自己的旧枪去换,排长不肯,他便告诉项副军长,后来由项副军长出面,叫排长把枪换给他了。”

本来,在濂坑石牛坞村附近隐蔽,把项英、周子昆安排在山上蜜蜂洞,是经过地方党的同志精心推荐后选定的。蜜蜂洞位处接近山顶的悬崖上,三面石壁环抱,地势险要。为“人迹罕到”之地,从对付国民党军队搜查清剿考虑是比较保险的,谁能想到出内奸呢!

项英、周子昆被害的具体经过,我同唐锡强曾写过一篇《项英、周子昆烈士被害经过纪实》(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一些研究工作者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好几位直接知情的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无需再在这里复述。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刘当时以为黄诚也被他打死)后,抢走项、周身上的“国币二万四千元,自来水笔三枝,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赤金捌两五钱),即仓惶逃窜到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有些研究工作者据此分析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动机,是谋财害命,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同他长期以来“山大王”思想、报复心理的恶性发展,对党、对组织的极端不满也有关系。

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

此后,刘厚总的行踪、表现,我们在国民党的档案材料中,就可以了解个大概了。

4月间,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各乡镇,“查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交由玉屏乡公所,飭即解送到府。”刘厚总向国民党旌德县政府供认,“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十六日深夜,乘隙将该项英

枪杀毙命。”4月28日，旌德县政府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部下押着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搜寻尸证。在该石洞中，“检获已燃未了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见有尸骸，亦别无其可疑迹象，足资证实。”“惟该石洞中，实曾有人匿居，尚堪认定。”而刘厚总指引这伙人到达蜜蜂洞，当他们分途搜索之际，乘机潜逃，翻了几座大山，到了太平县隔河里，随身携带的手枪三支，“悉放在隔河里保长处，赤金、钞票、钢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枪的人检查拿去。”刘厚总又跑到泾县茂林，向“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连长王惠九投效，并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点要求，同路去取枪款等件；第二点要求，去看项英的尸身；第三点要求，办理自首手续；第四点要求，为伊登报。”王惠九对他的上述要求，都未能办到，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又不同意刘厚总同去。“究竟东西是不是王惠九拿去，不得而知。”后来，刘厚总向国民党太平县政府投诚，国民党“太平县党部”将其移送“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移送“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核办。1942年7月10日《宣报》副刊《皖南绥声》上刊载刘厚总署名的反动文章《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极尽咒骂、造谣侮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新四军之能事，无耻地说：“我在皖南各县居留将近一年了。事实告诉我，中央对于被俘军□(官)的宽大优□(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现在是彻底的觉悟了”，“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好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将刘厚总递解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1945年10月，军统特务王仁德因违反军统纪律，也被关进渣滓洞7个月。据王仁德1972年写的材料称，刘厚总“独自一人关在楼下6号牢房。此人文化不高，与特务——上至所长濮齐伟、张少云，下至狱中看守，都搞得很熟，他在狱中亦很自由，监房的小院子都由他打扫。”“表面上看，他已没有抵触情绪，特务对他也无戒备，比有些在押特务还自由些。”1946年年底，渣滓洞看守所在押人

犯全部迁往白公馆看守所。据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的教师任可凤回忆说：“刘厚总在狱内负责管理图书。狭小的图书室仅六、七平方米，只作借书之用，不能在室内阅览。他的一张小床也安置在内，等于独居一室。白天不上锁，刘可自由入厕或在天井走走。晚间依然加锁，与其他囚人并无二致。”

1948年春，国民党军统局决定“开释”刘厚总，并发给二千五百万元，以资返籍。刘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钱。同年5月10日，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未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胜利进军。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刘厚总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有材料称，11月下旬，当人民解放军攻打重庆的炮声隆隆响起之际，国民党残军狼狈逃窜，成渝公路上乱成一团，这条“蚁命”死于乱军之中。这个说法，迄今虽无确凿的材料加以证明，但是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尚属可信。刘厚总死有余辜。

(责任编辑 文 贤)

东林党是我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以讲学活动为中心，评议时政，褒贬人物，在17世纪的江南拥有很高的声誉。书院的一首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晚明以来，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更因东林的旷世奇冤成为千古绝唱。

这副楹联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对后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因为这不仅是东林党一代人的心声，也是几千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义和良知。它所体现的“东林精神”不仅是无锡的，也是全国的；不仅是晚明的，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然而，面对他们的遭遇，又不免发出历史的感叹：东林党这一批人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晚明王朝的整体利益献身亡命，蒙冤受屈，然而他们又滞留在理想化的境界，在实践中表现为无能又无奈，软弱、退缩，麻木不仁，直至遭受灭顶之灾。

他们在不当权的时候，誉议国政，抨击当局，赢得抱道忤时者的追随和民众的拥护。天启年间命运出现了转机，从在野的清流，一变而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可谓盛极一时。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他们又坐失良机，很快丧失优势地位，短短四年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为什么这样一批声势显赫的饱学之士，不能提防一个目不识丁的宦官从背后举起的屠

刀？这样一个苦心经营17年、中国历史上为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士大夫集团，失败得如此惨重？虽然皇帝有被宦官蒙蔽的客观原因，但不能不追究这一事态的主观因素，这是沉重的历史教训。

考察他们当权后，主要忙的是两件事：一是“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起用一大批在前朝失势的党人；再一件事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凡是不合口味的都目为异类，加以排斥。东林内部又以乡里为界，分裂成许多小组织互相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想有所作为也很难成功。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没有利用有利的时机，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把主要精力和才智都消耗在党派斗争上，这是招致失败的一大失误。在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对阉党的聚集力量麻木不仁，丧失警惕，而且提出一个错误的政策，那就是“笼络群阉”，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无异是与虎谋皮。眼看阉党势力日益壮大，他们认识既不一

致，行动又迟缓，放着兵部不抓，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魏忠贤的爪牙插手内阁，首辅、吏部尚书相继被逐，次辅竟然胆怯得辞职，以图息事宁人。在大敌当前之际，没有反对最大的敌手，而是忙于提携同党和派系斗争，所以被阉党轻而易举地一举扑灭，肇成千古冤案。他们为官清廉，具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然而人品使人景仰的，行为却不足为训，这反映了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缺陷和误区。所以东林党的兴亡，是一曲令人永远遗憾的悲歌，评价东林党人不得不经受理智与情感的撞击。

东林悲歌，对东林党人来说悲壮的行为，对统治王朝来说就不是悲歌而是挽歌，因为像

我景仰又痛其愚顽 东林党

□ 刘志琴

东林党人这样赤诚的，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人心不惜肝脑涂地，最后却被他们所维护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屠杀忠臣赤子的时候，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这样提出问题还由于这三点认识：

一、认识晚明和东林党所处时代的意义。

众所周知，明朝亡在崇祯年间，但是清代人却说它亡于万历。哪有这样的评论呢？细想之下又不无道理。研究晚明在某种意义上比研究晚清更有典型意义，因为晚清已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社会的变异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渗透和参预，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的过渡缺少动力，只有外部势力的挑战引起回应，才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这种挑战——回应模式成为西方学者观察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主要观点，这确实反映了晚清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晚明不一样，处于 17 世纪的中国，不存在西方势力影响的问题，就是利玛窦传来的西方文化，仅仅局限上层的少数官员，对社会没有发生影响，《几何原理》译成中文后并未传播，更没有任何政治理论的引进，可以说晚明是没有受到西方近代化影响的原装的封建社会，考察这个时期的变化，有哪些到达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极限，又有哪些可能越出常规而有所突破，为真正了解封建时代的国情和民情，提供了一个可资解剖的社会面，所以要认识传统社会近代化的演进规律，不能不重视晚明社会和东林党的研究。

清人根据什么要撇开明亡于崇祯的事实，认为明亡于万历呢？封建王朝的灭亡一般来说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农民不能按照原样的方式生活下

去；再一种是统治机构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这两者不一定同时到来，万历王朝存在 48 年，共有农民起义 30 多起，大多是局部性的小打小闹，矛盾没有到沸腾点，这个王朝还能生存下去，但是统治机构却先期瘫痪。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缺官不补的情况相当惊人，监司、郡守旷年无官，朝中大员大半虚悬，都察院没有正官，内阁有时锁上大门，到万历后期中央六部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无专人负责，来往使臣无人接待，军饷无人解运，刑部长年不断狱，监狱长上青草，直弄得“职业尽失，上下解体”，这是历代王朝从没有过的现象，连晚清也没有弄到这种地步。

这种现象又是万历皇帝自毁长城的结果，1596 年皇帝委派宦官到地方组织“中使衙门”进行横征暴敛。按照明朝的财政制度，税收应归户部和地方政府征收交归国库，皇帝从中提取



东林书院仪门前现存乾隆初年石牌坊

一定的金花银供皇室消费，贪得无厌的皇帝受不了这种约束，撇开法定的官僚系统，另用自己的亲信组织地方政权，掠夺国家税收。本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是封建王朝合法的组织机构，也是皇帝统治社会的主要支柱。官员是国家的命臣，依据法定的统治秩序，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能，他们的职权要受到朝廷和法制的保护，这是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体现，任何君主都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则。万历皇帝公然抛开法制，无视国家法定的系统，另立中使衙门，凌驾在官府之上杀人越货，逍遥法外，那些忠于职守的地方官，奉法的士大夫，自然就成为他们横行不法的障碍，受到空前的迫害。这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用宦官组织地方政权，打击地方官员的违制行为。这一暴行在各地激发多起城市民变，奇怪的是，北到辽东，南到云南，西至陕西，东至沿海，风起云涌的城市民变中没有一例民变与农民起义相汇合，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并未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即使有城市暴动的导火线，在农村也燃烧不起来。由此可见，统治机构的先期瘫痪是皇帝肇下的祸根。明朝本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皇帝的倒行逆施，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激烈的党争又导致官僚集团严重分裂，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皇帝无限膨胀的贪欲和不受抑制的权力，又是皇权至上的产物，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阶级代表人的破坏和内部火并，统治集团自行解体的现象，反映封建王朝已失去自我调节的机制。一些有识之士惊呼“天崩地解”，“大厦将倾”，纵有忧国忧民之心，也束手无策。清人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断言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二、东林党活跃的年代，在西方已开始走向近代化，人文启蒙成为社会转型的先声。在中国也萌发了一股异于以往的社会思潮，与西方不同的是，这不是基于经济的动因，也不是开放式的人文启蒙，而是由“非君”思潮引发的政治伦理启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首先是万历王朝兴起一股对皇帝劝谏、批评和抨击的风潮，像海

瑞那样骂嘉靖皇帝的奏疏，至万历中叶已到了连篇累牍的地步。有的直数神宗的酒色财气，四毒俱全，有的疏陈“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讟愁叹，难堪入听。”其言词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痛骂的地步。批评皇帝在古代称为批鳞，官僚士大夫纷纷以批鳞为荣，有的还以抗上得到“批鳞君子”或“清流”的美名。在朝的大僚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无忌惮，归庄的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在民间传诵不息。讥评朝政更是到了街谈巷议的情景，首辅沈一贯记述万历二十六年的情形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喃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只要看一看流行在坊间里巷的戏文小说、民歌民谣、笑话、谜语，莫不为晚明从上到下这样广泛、激昂的非君思潮而震撼。

“非君”本是讽谏君王，并非就是启蒙。当王朝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官僚士大夫中会出现一些有识之士批评皇帝的过失，以唤起皇帝的励精图治，这本是封建伦理所许可的行为，但像这样蔚然成风，已超出一般的讽谏，它所起的效果已不仅仅是规劝帝王的过失，而是对君主肆虐的揭露和控诉。皇帝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最高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下跌是皇权急剧败落的重要特征，晚明“非君”思潮的崛起，充分反映层层隶属的封建社会结构，从最高层出现了溃裂。

从“非君”进而“抑尊”，提出抑制君主权力的思想，这是东林党后人提出的命题。从权力结构上思考怎样限制皇权专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也是十六、十七世纪中国政治伦理的启蒙，遗憾的是东林党人没有走出这一步，却把自己送进了历史的尽头。

东林党人是一批忠诚的皇权卫士，是虔诚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躬行者。在他们遭受陷害被捕的时候，民众奋起抗争，激发了城市民变，可他们明知受冤，却劝阻民众，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杨涟被押解途中“都城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旗而夺公，公四向叩道，告以君臣大义，始得解散。”左光斗被捕时，县民散发传单，

动员殴打捕人的缇骑，左却苦苦劝阻，俯首就擒。高攀龙被捕前闻讯，写下“君恩未报，结愿来生”的遗言自杀，遗嘱还要家人变卖田产供缇骑费用。黄尊素听说缇骑将逮捕证遗失，自动换上囚服投案，在临刑前还赋诗叩谢君父。李应升被捕时，数万人出动拒捕，李却一再拜求市民解散，还说什么：“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自动就缚。民众却不管这一套纲常说教，拿起武器冲进公堂，见是缇骑就打，比起人民这种嫉恶如仇的精神，东林党人的迂腐是多么可怜可笑！愚忠成为他们顽固的阶级偏见和精神枷锁，以视死如归，显示他们是一群真正效忠皇权的楷模，藉以平息民众的反抗。激发民变的导火线，却沦为民变的灭火器，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然而当局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俯首就擒，就放松对他们的残害。被捕的六名东林官员史称“六君子”受尽酷刑。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魏大中在狱中折磨致死，藏匿不报，数日后从牢穴中抬出，肉身腐烂，仅余白骨；左光斗等人的尸身都已残破不全，爬满蛆虫。在他们死后，喉骨还被剔出，烧成骨渣，被阉党泡成酒喝。在这残酷迫害的同时，又公布《东林党人榜》，株连大批士大夫，纷纷以东林的“鹰犬”、“帮手”、“遗奸”、“羽翼”，罗织蔓引，在全国搜捕，并通令海内使他们“躲闪无地，倒翻无期”，永世不得翻身。

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正是这样的悲剧，却给人们以启示，像东林党这样竭尽忠诚的循理之士，不也被封建统治者无情地吞噬了吗？置他们死命的不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君父吗？天理何在？皇帝的圣明又何在？被这悲剧惊醒了的人们终究要发出这样悲愤的呐喊。黄尊素倒下去了，他的儿子黄宗羲却拿起笔猛烈抨击这吃人的君主专制，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君主未取得统治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登上皇帝的宝座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因此“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他看来，“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君主既然“不以天下万民为事”，作臣的就没有必要“杀身以事君”，这说得是何等好呀！，这又

何尝不是东林党人用鲜血换来的沉重教训！黄尊素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黄宗羲没有父辈的冤狱，也得不出这样精彩的思想。东林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冤死，无情地揭露了封建专制者的昏愤、腐败和凶残，激励着人们思考、怀疑和鞭挞这沿袭一千多年的，也是他们拚死效忠的君主专制；并进而提出“抑尊”、“崇高尽独夫”、“势尊自蔽”的命题，从而超越“非君”论，从权力结构上限制君权，这才真正进入政治伦理的启蒙，启动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滥觞。从黄尊素到黄宗羲这父子两代人在认识上完成的飞跃，使我们看到光明与黑暗交替的曙光。所以东林党人所昭示的不是新时代的起点，而是旧时代的终场。这一起点和终点的一步之遥是东林党人无法超越的雷池，只落得引爆自身的结局。

三、东林党人是历史人物，对任何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影响都存在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二重评判。这两者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伯夷、叔齐在商朝灭亡后，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对历史不足为训，但他们不忘故国，忠贞不二的气节为历代传诵，在《史记》中居于列传的首位。关云长在三国时代只是一员猛将，论事功远远不及汉朝的霍去病，但在民间却视若神明。不论是精英文化或民间文化对历史人物都具有历史和道德评价二元化的传统。这启示我们对古人的评价不要追求完美，历史作用和道德价值一致的固然为今人称道，即使不一致也不妨碍今人的学习和继承。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已随逝去的岁月而消失，留下的话题尽可由历史学家去争论，对人民大众来说能作为国民素质补养的更看重道德精神，惟有这道德精神可以传之久远，万世留芳。所以对古人不要因为历史的功绩而在道德上溢美，也不为因为道德的高尚而拔高事功，一切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才是历史研究者的追求。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景仰东林党，又痛其无能、软弱和愚顽，这是我辈知识分子泣血饮恨的悲歌，永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者根据在东林书院讲演整理）

（责任编辑 文 贤）

学者·大师· 革命家黄侃

□
高
文

黄侃，字季刚，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与章太炎先生并称“国学大师”、“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同时，他又是一位早期农民运动的活动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一)

黄侃祖籍湖北蕲春，幼承家学而聪颖过人。七岁时即作诗曰：“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为官清正廉明，有“黄青天”之誉），可谓语出惊人。

1903年，黄侃15岁时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在校即与同乡田桐、黄安（今红安）董用威（即董必武）、湖南桃源宋教仁等同学议论时政，批评当局，宣传反清、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因此被开除学籍。后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见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其父黄云鹄曾与张之

洞相往来），张赏识其才，乃资助其官费留学日本。不久，黄侃即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6年前后，黄侃曾先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其在《哀贫民》一文中，以家乡农民为例，叙述了劳苦大众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榨下，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状况，对贫苦农民寄以无限同情。文中还明确指出：“富人夺之而我乃贫”，提出要解决贫富不均，必须革命。值得称道的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年方十几的黄侃，能注视农村实际，提出农民问题，鼓吹农民革命，的确是难能可贵的。1907年，他又在《民报》第18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指出他们讲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政治上的堕落，势必给国民道德带来极坏的影响，以致亡国。文中还论及革命党人要在道德行为上同立宪派泾渭分明，否则“德不逮而民无援”，国事将不堪问，这既是对改良派的针砭，也是对革命派的砥砺，同时也正是黄侃的性格、精神和做人标准的自白。

1910年，由于同盟会的活动，国内各地革命力量蓬勃兴起，湖北革命党人函促黄侃回国举事。黄侃回国后，再三分析当时的情势，他吸取了湖南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举事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当务之急是做好宣传发动的准备工作。于是，他深入鄂皖边孝义会中发动群众，并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到农民群众中组织演讲，宣传民族大义和中国危急情状，听众常聚集千余人。他的足迹遍及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广大穷乡僻壤，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成为著名的群众领袖。

1911年初，武汉革命文学团体“文学社”成立，社员都是新军和社会各界的革命中坚，黄侃不但力举其事，而且还亲自审定了会章。同年7月某晚，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笔、黄侃同乡詹大悲设便宴款待黄侃，并与之商谈时政。酒

后,黄侃针对当时一些改良派提出的什么“和平改革方案”,愤然提笔为《大江报》撰写时评,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

大悲叫绝!次日,此文见报,震撼江城,清廷惶惧,很快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詹大悲及该报副主笔何海鸣逮捕入狱。由于詹大悲在狱中坚持说时评系自己所作,故黄侃得以脱险。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一著名时评,大大激发和鼓舞了革命新军及各地人民群众的士气和义愤,成为后来著名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黄侃为人尤重大节,爱憎分明。1915年,章太炎先生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某宅内,黄侃闻悉后,曾两次晋京探望,后来索性以“研究学问”为名,搬入章太炎被禁处。但未过多久,便被警方逐出。黄侃气愤至极,以绝食表示抗争。其时,他的另一位尊师刘师培,后来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黄侃即起立瞋目,严词拒绝之,并气愤地说:“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黄侃和董必武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好朋友。他尤其推崇董必武的斗争精神,积极支持董必武的革命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解决会议代表的住宿问题,董必武曾找他联系。他便亲自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任校长的夫人黄绍兰,让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等十名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游团”的名义,住宿在博文女子学校。

黄侃一向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二)

黄侃先生作为国学大师,他的严谨治学、刻苦求研精神也是值得后人称道的。他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无论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回忆民国十七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时的情景说:“黄先生讲声韵学的确是很别致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使听者忘倦。”

黄先生主张治学先从继承入手,然后“入室操戈”,走出自己的路来,并须“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即是“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共达数千卷,都是一丝不苟,从不稍懈。故他施教则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著书则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而且能独辟蹊径,特别是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蔚成一家言。如把声、韵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不但标志着三百年来古音韵学研究取得的最大成绩和达到的最高阶段,而且从此也为后学指出了一条新路和提供了新的方法,其影响之广及于国内外。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妇女运动先驱者 李文宜

□ 茅于兰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周恩来在上海》电视连续剧中，观众可见到，周恩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被捕杀害之后，亲手将罗的一份遗书转交给上海的一位地下党女干部，遗书简单地写着：“望你学我之所学”。这位女干部就是当时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文宜。

六十九年后，新华社在1997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说：我国妇女运动先驱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李文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如今近三年过去了，我作为李文宜亲属的一员，对她长期继承罗亦农的遗志，坚持为我国的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贡献毕生精力，深感敬佩。她的革命事迹，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领导女师学潮 参加女权运动

作为武汉人，李文宜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读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就在北洋军阀反动的政治高压下，领导和参加了女师学潮和武汉妇女读书会、湖北女权运动同盟等革命活动。

1922年，武昌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当时，革命先驱董必武、包惠僧等人，在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他们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陈潭秋发表了《妇女应联合起来争取解放》一文，唤醒了湖北女师等校学生的革命觉悟，她们有的给家长写信，要求解除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有一些学生不顾湖北督军兼省长和教育厅长的所谓“为维风化禁止剪发”的禁令，大胆地剪短了头发。有一次为庆祝太平洋国际会议的召开，女师竟有部分学生抛头露面走上街头参加了游行，保守的女师校

领导认为这是无法无天的越轨行动，并且认定是该校教师刘子通在《武汉星期评论》上撰文鼓动的结果，就决定辞退了刘子通老师。

这件事在女师学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部分同学去质问校长王式玉为何辞退刘老师，并强烈要求校长继续聘请刘老师授课，校长置之不理，这个班的学生就集体罢课。校长想以保送她们上高师为诱饵来制止罢课，但同学并未上当。最后校长竟使出杀手锏，把其中带头闹事的五名同学开除出校。

罢课的事，李文宜因不在这个班上并不知道，后来听说



李文宜

要开除这五个同学，十分气愤。她立即站出来，领导同学到校长室向校长据理力争，要求校长收回成命，校长坚决不同意。这时候李文宜当机立断号召同学说：“姐妹们，整队吧，我们找教育厅长说理去，我们一定要为五位姐妹讨回公道！”

教育厅长要袒护校长，不敢和学生辩论，只得采取空城计的办法，整个教育厅找不到一个人。李文宜决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她请大家在大厅里坐以待旦。李文宜的父母知道此事后都表示支持，她母亲和姐姐还买了两屉包子和两大壶开水，送到教育厅请大家吃。第二天，学联代表和其他学校的代表也纷纷前来慰问，送来许多饼干、糖果表示支持，这使女师的同学更加充满信心。

直到第三天，教育厅长才来了，他把带头的李文宜和蓝淑文叫到厅长室去，说经过研究决定，给五位开除学籍的学生发给毕业文凭。但她们还差半年的学习时间和实习时间，校长同意为她们在校外办补习班。同学们讨论以后认为：不让他们返校念书使人反感，但能发给文凭就是恢复了她们的学籍。被开除的五名同学也表示满意，于是，她们高唱凯歌回到了学校。

紧接着，李文宜又积极参加了湖北的女权运动。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就在武昌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同时还成立了由党领导的“妇女读书会”，李文宜和她的女师同学都是读书会的成员。读书会请陈潭秋等人为大家讲解了《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俄国十月革命》、《妇女解放问题》等。

读书会还办了一个《妇女旬刊》杂志，大力宣传妇女应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要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解放。

随后，在妇女读书会的基础上，武汉又成立了“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

李文宜被推选为同盟会的领导机构理事会的委员。女权运动同盟会提出了十项奋斗目标，其中有争取男女在宪法上有同等权利，要求在宪法上增加条款规定蓄妾者以重婚论罪，禁止

买卖妇女，女子与男子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等。

“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后组织过多次有革命意义的社会活动，比如在1923年参加武汉各界一百多个团体五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会后举行了游行，高呼“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抵制日货”等。

“女权运动同盟会”还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武汉演讲。他在演讲中主张男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要平等，而且要通力合作，不要另立门户。当时李文宜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聆听了他的教诲。不久李大钊就英勇就义了。出人意料的是，三年后“女权运动同盟会”就被当局查禁，作为“非法团体”予以解散。

1924年李文宜在女师毕业了。她毕业考试的成绩名列第三，但因她带头闹学潮，被扣了“品行”分50分。毕业后别的同学都被武汉各小学聘去当教员，唯独李文宜没人敢请。她坐在家里闷闷不乐。后来她经好友介绍到武昌大学附小任教，并于1926年3月3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组织没有公开，和她秘密并肩战斗的还有蔡畅和赵君匋等。

解救妇女 反对缠足

早在二十年代，党中央就很重视开展妇女工作，在“女权运动同盟会”解散后，湖北的共产党组织决定重新组建“武汉妇女协会”。妇协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办一个“妇女补习学校”，以便从中发现和培养妇女干部。这个任务交给了李文宜。她为完成这项任务，在业余时间东奔西跑，从租房子、买桌椅、置办各种杂物开始，直到招生上课，她都一手包了。

当时，湖北省被军阀吴佩孚占领，直到1927年10月北伐军才把吴佩孚赶走，共产党由地下转为公开，中共武汉区委改成了湖北省委，省妇协的工作也开展起来。李文宜被选为妇协的组织部长。她在全省61个县、市发展了妇协组织，会员总数达到了三十二万多人。妇协会员在农民协会中成为一支有生力量，她们对土豪劣绅进行了斗争。

黄梅县有一个土豪姓张，是名族长，竟贩卖了七十多个寡妇。农协和妇协发动群众把他打倒了。在打倒土豪劣绅的同时，夫权也随之发生动摇。丈夫不敢欺压妻子，否则也会受到惩罚。许多受迫害的妇女，如被迫卖淫的娼妓、小老婆、婢女、童养媳、受丈夫打骂虐待的妻子、被父母包办婚姻的姑娘，都纷纷逃到省、市妇协去诉苦，要求妇协帮助她们脱离苦海，妇协都尽可能帮助她们。有一个娶了十个小老婆的富户，其中一个小老婆来妇协诉说她受丈夫和大老婆的虐待，妇协的蓝淑文听后十分生气，就学农协的办法，动员了几个女同志到那富户的家去，要抓她的丈夫和大老婆游街，他们听到风声就吓跑了。

有的妇女要求离婚的，妇协也帮助她们到法院起诉。有一个油漆商店店主的女儿叫倪梅英，因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愿出嫁，夫家父子竟带领二十多人到倪家来抢婚，强迫成婚，并禁止倪梅英的一切行动自由，还对倪实行种种迫害。梅英逃到妇协哭诉，夫家竟胆大包天，纠集一些流氓包围妇协，扬言不交出梅英，就要砸烂妇协。妇协的同志不畏强暴，仍帮助梅英到法院起诉，终于离婚成功。类似的在李文宜和她的同志帮助下获救的受苦妇女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二十年代的湖北还残留封建社会妇女缠足的陋习，为此，1927年湖北省妇协要求政府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禁令。禁令有以下条例：“取缔缠足以三个月为劝导期，如在劝导期内仍不放足，将课以罚款，并重新限期放足，如仍不听劝导，将由政府予以严惩。”

李文宜和妇协的其他同志全身心地投入此项运动。她们首先深入社会、家庭、学校、工厂、农村进行宣传和劝导。为了更有效地劝导，她们编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姐妹们，快听着，大家快快来放脚，包了脚，身体弱，走不得远路，做不得重活，自然要靠男人过，自然要受人折磨，怪不得男人打骂我。放了脚，多快活，走得远路，做得重活，自然不靠男人过。你看快活不快活？”有些妇女听到了歌声就暗暗流泪，触动了她们的感情，激发了她们放足的决心。还有一首放足歌是教妇女如何放足的方法，歌词是这样的：“放足乐，乐如何，请君听我的放足歌。棉花

塞足缝，走路要平过，酸醋同水洗，裹时勿要多，七日剪一尺，一月细功夫。夜里赤足睡，血脉好调和。放了一双足，就不怕风波。放足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足歌。”

宣传队深入民间，看见有裹脚布就没收，看见没有放脚的妇女就劝导，不听劝导就依法罚款，一次罚款仍不放脚，再来劝导，仍不听再罚款。有一次，她们在街上听见一户人家有幼女啼哭，入户一看，见一个老太婆正在给六岁的孙女裹脚。宣传队向她讲道理，禁止她这样做。她却说，“孙女裹脚是终生大事，罚几块钱算什么，你们别多管闲事。”宣传队看她这样顽固，就对她说：“放脚是政府的规定，你不给孙女放脚就拉你出去游街。”老太婆害怕了，不敢再给孙女裹脚了。经过这样宣传动员，放脚逐渐成了当地新的风气，后来许多青年男子也开通了，发出“不是大脚姑娘就不娶”的宣言。

新婚燕尔 痛失爱人罗亦农

1927年，正当北伐军胜利进驻武汉之际，蒋介石却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开着大卡车四处抓人，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党中央在汉口举行了“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在汉口设了长江局，由年轻有为的罗亦农担任长江局书记。

李文宜第一次见到罗亦农，是在1927年北伐胜利后武汉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时期。有一天李文宜去看望董必武，只见董必武很严肃地坐着一言不发，坐在旁边的钱介盘告诉她，李汉俊在詹大悲处下棋，结果两人同时被捕，都被杀害了。钱要她少出来活动，因为他们的名字，包括李文宜在内，都在报上被通缉了。李文宜听了心中很是悲伤，但她并不灰心丧气，决定要跟共产党走，决不后悔。

正在这时，向警予通知她，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做形势报告，问她去不去听？她听了十分高兴，来到了开会的场地——刘家祠堂，参加会的有四十多人，其中只有三个女同志，她们是向警予、赵世兰和李文宜。做报告的同志穿了一身浅

蓝色的夹衣裤，两脚踩在一条长凳上，讲得汗流浹背。他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已经恶劣到危险的关头，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奋斗，一定能够度过这一关。他讲得非常鼓舞人心，悲观的气氛一扫而空。李文宜向别人打听作报告的人是谁？人家告诉他，他就是党的领导人之一、长江局书记罗亦农。

当时赵世兰任长江局秘书，赵世兰去莫斯科学习后，蔡畅就派李文宜接替赵世兰，担任罗亦农的秘书。从此以后，李文宜就和罗亦农朝夕相处，她发现罗亦农是个很幽默爱开玩笑的人。

党中央从9月起陆续向上海迁移，罗亦农得到通知，要他结束长江局的工作，赴上海参加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罗定于11月初动身，他告诉李文宜，不久会调李去上海工作。

他在工作极端紧张和繁忙时，还托党内同志利用出差的机会在长沙买了几幅湘绣送给李文宜和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其中送给杨的一幅《马》，他特别嘱咐是他和李文宜共同送给杨之华的，内中的含义自然不言自明了。

有一天，中央领导同志李维汉、瞿秋白、罗亦农等正在楼上开会，李文宜在楼下工作。不一会，罗亦农下来告诉李文宜，刚才他们发现对面的草地上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在徘徊，恐怕是特务。于是，会就提前结束了，开会的人相继从后门偷偷地溜走了。过不几天，罗亦农回来了，手上还提了一个留声机，并对李文宜说：“你一个人呆在机关很寂寞吧，我买了几张唱片给你听。”罗亦农关怀的语言，使李文宜从内心涌出一股爱的暖流。

当罗亦农偶而有空闲时，他和李文宜常常在黄昏时到河边堤岸散步，美丽的夕阳笼罩着他们全身，他们互相越来越亲近，终于堕入爱河。

1927年11月4日罗亦农为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李文宜一起登上了去上海的长江轮。

到达上海后，他们住进了党组织为他们租的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当时共产党已转入地下，为避人耳目，机关必须家庭化。所以李文宜只得扮成家庭主妇，她和罗亦农也就正式同居了。

1928年元旦，在上海工作的党的领导同志决定在这里举行新年聚餐。凡是有夫人的都双双入席，如瞿秋白和杨之华，李富春和蔡畅，周恩来和邓颖超。罗亦农这时正式宣布他和李文宜久已同居，他们也坐在一起，大家举杯向他们祝贺。

形势越来越险恶，蒋介石早已悬赏巨额奖金通缉罗亦农。罗亦农早上出去，就不知晚上能否回来。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作掩护，这时李文宜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罗亦农又去武汉工作。当他从武汉回来不久，就被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引渡到专关政治犯的龙华监狱。党的同志想尽各种办法营救，都无济于事。有一天有一位同志找到李文宜，叫她坐上黄包车，到龙华一所大学的马路口，去看电线杆上贴的布告。她以为是要她去执行什么任务。当她找到电线杆，抬头一看，只见布告上写着：“共匪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下署“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日期是当日。在细雨迷蒙中，她的泪水和雨水溶成一片。她迈着沉重的双腿，寻找刑场。好不容易找到了，看见草地上一大摊血迹，旁边有一块雪白的毛巾，她认出是他的东西，两眼一黑就晕倒在地了。黄包车夫看她可怜，把她拉回了住地。她刚回到美专宿舍，就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说美专已有危险，要她立刻离开，她不得不离开她热爱的美术事业。在这里她只学了两个月，仅仅学到一些皮毛。（后来知道，出卖罗亦农的是党内叛徒何家兴和贺稚华夫妇。）

当她终日以泪洗面，沉浸在无边的痛苦中时，周恩来来看她，并交给她一张字条，原来是罗亦农的遗言，上面写着：“暂时（李文宜的原名），永别了，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灵若有知，将永远拥抱你。”看完字条，她泪如泉涌，但她决定学他的所学，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抗日前后艰难的妇女革命活动

1928年5月，李文宜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以及她的女儿独伊一同登上一艘货轮，开往大连，再经中东铁路到莫斯科，准备去中山大学学习。

这时,恰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参加六大的代表陆续来到莫斯科。代表们大多认识罗亦农,所以对李文宜很表同情。大会负责人还允许李文宜旁听六大会议。

六大结束后,李文宜和代表们还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军训结束后,中山大学也开学了,李文宜立即到中大报到。

李文宜被编在一个特别班里,这个班被戏称“老头子班”,其中有何叔衡、董必武、钱介盘、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他们学习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世界经济史》、《农民运动史》、《工人运动史》等等。

中大提出,为了回国做秘密工作便于隐蔽,最好学一门手艺,李文宜就学了四个月的纺纱技术。

1931年回上海后,李文宜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委员和女工委员。为方便革命工作,她到了一家纺纱厂工作。她改名叫李小妹,说自己丈夫死了,没有依靠,只好在工厂做工。她发现上海的纺纱机是从美国进口的,转速快;莫斯科的纺纱机比较落后,转速慢,她对新的机器不能适应,还要从头学,所以她只算是一名学徒工,每月只有六元钱的工资,还要给工头师傅一半。为了讨好工头,她索性连另外三块钱也存在师傅手里,而她的生活费全靠她当中医的老父亲每月寄二十元钱维持。

有了工作还要找住的地方,她从电线杆上贴的广告中找到了一个“灶披间”(连着厨房堆柴火的屋子),她就租下了。区妇委知道她有了住处,就给她分派工作。下班回来,她除了自己买菜做饭,还要写传单、刻蜡板,为党做宣传工作。

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还很盛行。有一天省委一位领导人到她的住处,对她说,“6月3日是反帝日(烧鸦片反英帝的日子),你要组织工人游行,要大家带上鸡蛋和西红柿。”李好奇地问:“是怕工人饿了充饥吗”?王说:“不是,是游行队伍经过领事馆时,拿西红柿和鸡蛋以及石头打进领事馆的大门去。”李说:“这样做恐怕不好,必定会引来巡捕,把工人抓去。我们应保护工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李当时不知道王是省

委书记(王并未做自我介绍),也不知道他是来作指示的,因此说话不太客气,哪知道竟惹了大祸,王先是给她扣了一顶“取消主义”的大帽子,后来又借口她去看望一位刚从狱中保释出狱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李国禹时,没有向党组织请假,这样她就被开除了党籍。

但是李文宜并没有因为自己被开除党籍而丧失了革命意志,她认为不是党员也照样能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1937年7月7日,北京芦沟桥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李文宜找了几个朋友商谈,决定组织一个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湖北妇女战时工作团”。工作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募集军鞋十万双,捐献给前方战士。此事得到了广大妇女的响应,十万双军鞋堆积如山,很快就给部队送去。

当日寇疯狂屠杀中国老百姓时,一批孤儿流浪街头,有的还被日寇送到日本做细菌试验品。为了抢救这批儿童,以邓颖超为首,包括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等名流,倡议成立儿童保育委员会,他们一致推举李文宜、李德全等人组织了筹备委员会。她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出一批批难童,收容在保育院内,随后,逐渐撤退到重庆去。

1943年,李文宜来到昆明,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并领导“云南妇女联谊会”、“云南职业妇女会”、“妇女读书会”等,还参加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宪政研究会”,积极宣传和动员知识妇女参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她还担任“云南妇女联谊会”主任、《云南妇女》编委。1945年10月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兼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同时继续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1946年,她被恢复了共产党党籍。1948年她出席了国际妇女和亚洲妇女代表大会。

解放后,她又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第一届妇联大会。此后,她相继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优秀女党员。

(责任编辑 程 度)

彦涵夫妇携手共沉浮

□ 康胜利



彦涵

在中国当代美术史特别是木刻艺术史上，有一个人们很熟悉的名字就是彦涵。这位享誉海内外、年逾耄耋的人民画家，正和其心心相印60载的战友、夫人白炎一起，携手共度安乐的晚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位来自延安的“老八路”，面对战争死亡之险、政治迫害之难、罹患重病之灾，两人始终相爱、相知、相守。不管命运把他们抛到哪里，在两张饱经磨难的脸上，始终流露着被亲情浸润过的泰然神情。他们的坎坷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

太行山区 战友喜结良缘

1939年，正是敌后抗日最艰苦的时期。在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临时驻地——山西潞城县北村，鲁艺木刻团团员彦涵与住在隔壁窑洞的中共北方局女资料员白炎相识了。在那战火连天的年月，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纯洁的爱情火花，彼此坦诚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时年23岁的彦涵原名刘宝森，生于江苏省东海县富安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被迫屡屡辍学，后来在舅舅的资助下，考进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预科班，先后师从方干民和潘天寿先生，学习素描和国画。他潜心攻读，画技日进。1937年“七七事变”后，彦涵放弃学业，动身奔赴延安，进了“鲁艺”的美术系。当时延安物资匮乏，油画所需的油彩画布，国画所需的笔墨纸砚很难寻觅，故鲁艺美术系专业课以木刻为主。他刻的第一幅作品是《马克思头像》。1938年11月7日，鲁艺学员彦涵、罗工柳一起举行了入党宣誓。不久，他参加了鲁艺木刻团，同罗工柳等一行四人由陕北进入晋南敌后太行山根据地。彦涵等四人刚到，便立即挥起刻刀，创作抗日作品，第一次把历史不长的中国木刻带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彦涵创作的取代门神的新年画，不仅农家和八路军总部争相张贴，彭德怀副总指挥还专门给木刻团写信鼓励并索要了一套。此后，彦涵又在窑洞昏黄的油灯下操刀刻制连环画《李大成》。此时他认识了

白炎。

当年18岁的白炎,秀气白皙,身材娇小,比起人高马大的彦涵来,一个是雄鹰、一个就是百灵。白炎的原籍在陕西省绥德县,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这个大家闺秀,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在本县读完小学,又到榆林上女子师范,读到第四个年头上,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她受进步教师的影响,不顾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和家里的劝阻,毅然到了延安。她先在陕北公学院学习,后又进了“抗大”并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组织上派她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白炎一行在路途中,曾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押起来。她和另一位女同志不顾生命危险,拂晓越墙逃脱,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信。经交涉,营救了其他同志,终于一起抵达了晋东南。

彦涵没想到,面前这个娇小、清纯的姑娘,竟有如此胆量。白炎也没有想到,这个身材魁梧、裹着瘦小军装、还剃着大光头的军人,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经过倾心交谈,他们彼此深深了解了对方,两根爱情的心弦各自在自己的心底拨动,他们终于相爱了。艰苦的战争环境,工作随时可能调动。没多久,白炎被调到太行剧团当文化教员,彦涵则奉调到八路军前总艺校教务科,两人相隔遥远,彼此十分思念。分别一年之后,彦涵无法抑制自己的思念之情,直率的他,脑子一热就去找艺校领导,要求把白炎也调来艺校工作。杨尚昆同志的夫人、前总艺校校长李伯钊和太行剧团团长赵子岳知晓内情后,热心成全此事。1940年,春风吹绿了太行山,在李伯钊校长的主持下,满面春风的彦涵和白炎举行了没有筵席的婚礼。

抗日烽火 共同出生入死

小两口结婚后,彦涵先是奉命筹建一个木刻工场,刻制一批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肖像。接着,艺校要筹建图书室,选派彦涵到国统区重庆去买书。这时,白炎已经怀孕,整天呕吐,但他们仍然决定舍弃个人的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彦涵随一支干部大队出发时,白炎送到村口,挥泪握别。

回到太行不久,他和白炎的儿子就出生了。这一时期,正值“百团大战”浴血奋战,彦涵的木刻作品纷纷问世。《奇袭阳明堡机场》、《纷纷建立根据地》、《攻克井陉煤矿》等二十多幅木刻汇成一册,名为《八路军华北抗战》,罗瑞卿为之题写了书名并作序。

1942年2月,彦涵被借调到一二九师政治部《战友报》刻插图。当年5月,日寇对我进行了“铁壁合围”。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师部趁黑夜越过黎涉公路,冲出了包围圈。

突围后,彦涵奉命回前总艺校。回到艺校驻地一看,爱妻白炎正在等待他的归来。

1941年,太行的崇山峻岭无处不是血火交织的抗日沙场,斗争越来越残酷。要在工作 and 战斗中抚养孩子是十分困难的。彦涵夫妇不得不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寄养在河北省武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中。

之后,彦涵、白炎又到晋西北一二零师所在地筹办艺校。1943年,中央命令艺校撤回延安。回到延安后的数年中,彦涵创作了《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草》、《来了亲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等大量作品,在各根据地流传。在奋力创作的同时,夫妇二人对留在敌后的儿子的思念,与日俱增。

抗战胜利时,在一二九师旅长陈锡联和他的夫人栗格及师政治部副主任黄镇的帮助下,彦涵、白炎终于找回了留在敌后的儿子。

1945年冬,延安鲁艺负责人江丰点名要彦涵参加由他任政委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彦涵全家来到张家口,此时该团已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改名为文艺学院。不久,彦涵只身来到白洋淀,创作了惩罚汉奸的《难逃法网》等作品。

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彦涵任河北省获鹿县大河村工作组组长。根据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他创作了《审问》、《豆选》、《向封建堡垒进军》等木刻作品。

1949年,平津战役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彦涵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佩戴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徽章,坐着美式大汽车兴高彩烈地进了北平城。

错划右派 夫妇相随相依

进入解放后的北平，彦涵夫妇开始了新的生活。彦涵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白炎则在华北大学美术系当助理员。1950年彦涵担任了中央美院教授，并从1953年开始，在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江丰的支持下，筹建美院版画系。当时，胡乔木把江丰、彦涵找去对他们说：“中国新兴木刻是有革命传统的，要传下去，不能到你们这儿就断了根。”他要彦涵负责把版画系搞起来，美院领导又决定，彦涵出任版画系主任。

在这期间，彦涵主动要求去抗美援朝前线，创作了《刚刚摘下的苹果》等一批作品。他还参加了新中国组织的第一个赴苏联艺术展览会代表团，并在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内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彭德怀将军在抗日最前线》，心情无比激动。

正当彦涵创作热情高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突然降临。1957年初夏开展“整风”，彦涵因正为军事博物馆画《八路军东渡黄河》，未参加运动。后来，上级召开会议鼓励大家鸣放。彦涵在会上为江丰遭受政治打击一事鸣不平。他哪里知道，江丰问题是中央领导定的性，他也跟着江丰被揪了出来。在中国文联党组讨论为彦涵定性时，由于意见分歧，四次争论都没有定下来。到第五轮讨论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出马主持，并最后决定，古元与彦涵只能留一个划一个。于是，按指标必划的一顶“右派分子”帽子便戴到了彦涵头上。彦涵倔强耿直，直到后来的“开除党籍”、“降级降薪”一系列厄运接踵而至时，他硬是不签字不服软。时任美术出版社编辑的白炎，看到彦涵气得不吃飯，光抽烟，只有情真意切地宽慰丈夫，多少个夜晚，夫妻相对无眠。

1958年3月，美协党支部一位负责人找到正在“改造思想”扫厕所的彦涵。说要把他下放到“北大荒”，彦涵表示不去。那人说，艾青、丁玲等右派都去啦，你为什么不去？彦涵却笑呵呵地

回敬说：“情况不一样嘛。”白炎劝他不要硬顶蛮抗，她怕丈夫如此抗下去会罪加一等。最后，上面要把彦涵下放到河北怀来县。白炎想到丈夫身体、心情都不好，家庭不能散。她决定和丈夫一起走，不管此去生也罢，死也罢，只想维护住一个相濡以沫的爱巢。

1959年仲春，彦涵的胃溃疡日渐严重，无日不吐，形销骨立，白炎日夜为之忧心如焚。统购统销的国营商店里没有鸡蛋，赶上当地几个农民在卖蛋，她就为丈夫买了几斤滋补一下身体，不料却惹了祸。有好事者汇报上去，训斥跟着就劈头盖脸落到白炎头上。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整得白炎有口难辩，泪往心里流。彦涵闻知，心疼妻子，又爱莫能助，只是一个劲地劝慰，他看着那给妻子带来“政治错误”的鸡蛋，如何还能下咽？不久，贫病交加的彦涵终于倒下了，胃穿孔导致昏迷不醒、气若游丝，经医生全力抢救，将胃切除五分之四才保住了性命。中国文联党组见彦涵身体状况衰弱不堪，便批准他回美协做些抄抄写写工作，全家也因此返京。

1959年秋冬时节，报纸头版头条刊登重大新闻，释放一批战犯并给一些右派“摘帽”，彦涵的名字与末代皇帝的名字同列一版。“摘帽”使彦涵、白炎长舒了一口气。但彦涵还是“摘帽右派”，属于“控制使用”一类，不能走出“另册”。倒是一些老同志不顾忌这个，排除来自上面的重重阻挠，让彦涵重新拿起刻刀。在一段时间里，萧三同志请他为《革命烈士诗抄》创作烈士肖像插图，他一鼓作气刻了吉鸿昌、叶挺、何叔衡等六幅；他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曹靖华、巴金、闻捷、鲁迅等多人的作品创作插图，还为军事博物馆创作了超大型木刻版画《百万雄师过大江》。彦涵不分昼夜地挥刀，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东山再起，二是要挣稿费减轻妻子的负担，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工资被降了一半，生活太拮据了。1962年，彦涵调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工作了半年，又随着院校调整回到中央美院任教。他一边教学，一边埋头创作了大量版画作品。



彦涵和夫人白炎

“文革”浩劫 双双再遭磨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降临了。彦涵再次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造反派斗彦涵，还逼迫在校学生、彦涵的儿子彦冰来斗父亲。彦冰事后对父亲说：“爸爸，您别往心里去啊！”彦涵苦笑着说：“儿子，没事，演戏嘛！”彦涵和李苦禅关在一屋，俩人相互“望风”，看守来了就“刻苦学毛选”，看守走了，就在里面练把式。关了一年零九个月，196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上面来人宣布彦涵等“牛鬼蛇神”每周可回家一次。李可染家人来接了，吴作人家人来接了……彦涵却不见自己的家人来接。心里一急，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脑海，莫非……？彦涵一出“牛棚”，工宣队的人就告诉他，白炎已被专政机关抓了。原来，白炎所在的外文出版社让白炎负责编辑一本反映大地主刘文采残酷剥削农民的泥塑画册，叫《收租院》。在收集资料并给泥塑拍照时，她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丈夫被关押“牛棚”而分心出错。可是，越怕出错便偏偏出错。画册发行前发现文字部分有误：受到地主剥削的应是100多户，不知怎么搞的少了一个“0”。白炎发现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她及时作了更正，多次作自我批评，还向社里写了书面检查。但是造反派上挂下联，无限

上纲，还是把她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投进了北京半步桥监狱。

这迎头一棒，把彦涵打懵了。他步履蹒跚地回到家中。家被抄过了，眼前一片狼藉。他想起妻子年轻时投奔革命、同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几十年，死也不相信她会是“现

行反革命”，他不敢再想，扭头踉踉跄跄进了一家酒馆，不顾自己仅残留五分之一的胃，平生头一次酌起酒来。

妻子在押停发工资，彦涵每月只发16元，父子俩如何糊口？只有变卖家中的东西，不久能卖的都卖光了，在面临断粮的关头，上面决定彦涵携子下“五七干校”，去干掏茅坑、起猪圈之类又脏又臭的活儿。

1972年，乍暖还寒之际，干校负责人通知彦涵回京，说是去画画。同时回来的还有一批画家。原来“文革”中，接待外宾的饭店、宾馆等场所，都挂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外宾误以为语录是针对他们的，因而很反感。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内外有别”，“布置要体现我国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民族文化”。根据这些指示，决定调回一批画家，画一批国画，悬挂在涉外场所。彦涵等人满怀兴奋的心情，苦干数月，圆满完成了创作任务，周总理看过后给予了表扬。

可是，事隔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一天，来了一批人把他们创作的画全部收走了，而且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内部展览”，展览会“前言”中把这批画定性为“黑画”，还组织这批画家前去参观，接受批判。在批判中，那些“造反派”无中生有，上纲上线，肆意歪曲。他们责问：

黄永玉画的《猫头鹰》为何睁只眼闭只眼？分明是对“文革”怀有“刻骨仇恨”！黄胄画的《任重道远》，那峰骆驼为何画得那么瘦？简直是“诬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许麟如画三个柿子一棵白菜，胆敢标榜“三世清白”！李苦禅的《荷花》为何正好8朵，还是残荷，难道不是“攻击八个样板戏”吗？彦涵的《大榕树》，把根画得那么粗壮，盘根错节，不是隐喻反动势力“根深蒂固”、永远不倒么？

这出批黑画的闹剧，迅速由京城泛滥到全国。电视、电台、报刊齐声鼓噪，北京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愤怒声讨“文艺黑线回潮”，中央美院有八人被纳入“黑画家”名册，版画系就占了两位：彦涵和黄永玉。在美院接受批判后，被分配到京北一个农场伙房去烧火。

改革开放 二老焕发青春

“文革”灰飞烟灭，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党中央着手纠正“文革”中和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彦涵、白炎怀着老战士的正直之心，申诉这二十多年的奇冤。1978年，彦涵在文化部第一个递上了申诉书，要求对1957年被划为“右派”问题进行复查。在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的支持下，中组部和文化部党组专门对他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至此，彦涵蒙受了21年的右派冤屈得到彻底昭雪，举家热烈祝贺。连向来滴酒不沾的白炎也举起了怀。

噩梦醒来，旭日东升。彦涵的名字及其作品开始屡屡出现在报刊上，各种职务和荣誉也纷至沓来。在第四届全国文联扩大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美协会议上他被选为常

务理事，并担任了美协书记处书记；1982年任中国版画协会副主席。其实，就在蒙受屈辱的21年中，彦涵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刻刀和画笔，前后创作了作品达三百余幅。平反后的90年代，光国内举办他的个人画展达15次之多。多年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或率团或个人，彦涵还出访了亚、欧、美洲一些国家，并应邀在法国等地举行个人画展。妻子白炎担任外文出版社党委书记，不管工作多忙多累，还是一如既往，照顾彦涵的身体，支持他的创作。自80年代末起，白炎开始为丈夫撰写传记。当时她曾说：“《中国当代画家丛书·彦涵传》是我和他生活半个世纪所得到的印象和感受而写成的。”这表达了一个妻子对丈夫最朴实、纯洁的爱。

数十年来，彦涵已创作了两千多幅版画和数百幅国画，除我国外，世界上有美、英、法、德、日、俄等国的三十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收藏了他的作品。前些年，连云港市政府拨款建立了“彦涵美术馆”，彦涵、白炎捐赠了300幅版画、油画。此外，他们还把70幅作品无偿捐赠给炎黄艺术馆。

1999年暮春时节，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互搀扶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久久凝视着碑上《胜利渡长江》浮雕，多少感喟涌上心头——这块浮雕的画稿是1953年由彦涵亲手设计的。46年过去了，参与这座丰碑设计的画家同仁所剩无几，他所刻画的那一代战士大都已离世而去。至今在彦涵的笔记本上，还保留着当年和他并肩战斗、光荣牺牲的32个烈士名单。正因为这样，他和妻子才更深知人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着。

（责任编辑 林耀）

欢迎函购《炎黄文化研究》

《炎黄春秋》学术增刊《炎黄文化研究》第6期已经出版。主要篇目有：《迎接新世纪创造新文化》（丁守和），《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苏双碧），《中华文化笔谈》（龚书锋、宁可、刘梦溪、杨义、刘泽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林被甸、董正华），《敦煌学九十年（1909年—1999）》（郝春文），《五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陈中立），《五十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回眸》（徐远和），《近年来我国藏学研究一瞥》（王尧），《论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罗琨），《中国上古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杨超），《老子论“道”的现代社会价值》（葛荣晋），《〈清代学术文化史论〉序》（戴逸），《〈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序》（刘桂生）。

本期共230页，定价7.50元，另附邮资1.50元。欲购者请汇款至本社发行部（地址、邮编、电话见本刊版权页）。

台湾百岁女作家苏雪林

□ 沈 晖

1999年4月21日，皖籍居台著名老作家苏雪林先生在台南逝世，享年102岁。大陆媒体《参考消息》在报道苏雪林去世的电讯稿中称其为“享誉国际的文坛耆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两岸迄今最长寿的作家”。由于台海阻隔，大陆读者对这位集作家、教授、学者、画家、翻译家于一身的文化老人的非凡经历知之甚少，对她煌煌著述更未知其详。

笔者有幸在她晚年于大陆编辑出版4卷本《苏雪林文集》，并与之通信15年，有缘两次赴台拜谒，朝夕相处月余，聆听她诉说百年人生之旅。闻道的喜悦和解惑的清明，如春风拂面，似甘泉沁心，现将访谈及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与读者一起走近苏先生，去一睹这位文坛传奇人物的魅人丰采。

女师才女苏小梅

苏雪林（1897—1999），生于前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原名苏小梅，学名苏梅，字雪林（因慕明代诗人高启咏梅佳句“雪

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取“雪林”为字）。20年代末成名后多用“雪林女士”、“绿漪女士”笔名发表作品。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苏村，据《太平苏氏宗谱》，太平岭下苏姓为四川眉山苏氏裔脉，苏雪林为宋代文学家苏辙第34代后裔。

太平岭下苏村，依偎在雄奇灵秀的黄山北麓，风景幽绝。奇峰奇云

的黄山烟霞，引发她幼年美丽的遐想，波光潋滟的太平湖水，陶冶她宽广的胸襟，山之刚，水之柔，铸就了她后来散文佳作阳刚阴柔两种美。

苏雪林自幼就是一个具有灵动不羁性情的女孩，天资聪慧，求知欲极强，她能想出各种办法逃避那个时代一般女孩黯淡无趣的童年生活。“只因出世早，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在家塾里混了几年，家里就不允许再读书了。”她央求祖父衙署里的老伯老妈，讲述神怪故事和有趣的民间传说，她还悄然无声地溜进叔兄们的书房，把



苏雪林在台北

《三国》、《水浒》、《说唐》、《封神》一类小说“偷”来，当作课本阅读，或找来纸笔临摹书中的插图，为自己营造一个快乐而艺术的小天地。如饥似渴的潜心自修，使她萌发了强烈的艺术冲动。11岁时，她受当时一本日俄战争连环画的启发，绘制一本厚厚的《猫儿国的故事》，描写猫与老鼠开战，情节穿插极其热闹，自成章回。13岁时四叔为了测试她有无做诗天份，出了《种花》二字，要她去诌一首七绝，半小时后，她交卷了——

林下荒鸡喔喔啼，宵来风雨太凄其；
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

首句走韵，四叔改为“满地残红绿满枝”，后二句则赞为“婉丽有风致，孺子可教。”诗炉之火一旦腾腾燃烧，就会产生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今观先生诗集《灯前诗草·少作集》，其天资、悟性与灵心令人惊诧：

碧栏干外望斜阳，燕子双飞水一塘。
日夕凉风亭畔起，薄衫时著柳绵香。

——《初夏》

乡村三月里，到处菜花香。
篱绕一池水，门开四面桑。
蛙声喧乱草，犊影带斜阳。
扶杖过桥去，云山已半藏。

——《晚景》

淡写轻描，情景逼现，这对于一位尚无师承仅凭自修的鬓龄女孩来说，诚属可贵。王观堂在《人间词话》中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一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姐姐与堂妹读了一点书后，便回到闺阁学刺绣缝纫，过着那个时代一般女孩的

正常生活。雪林对女红没有兴趣，终日与诗书笔墨打交道。她跟长兄学画山水，那浅墨著色的尺幅小品，气韵生动，颇具章法；诗在四叔的熏陶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的长篇常赢得长辈们嘉许。1914年，安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招生，消息传到偏僻的山村，激活了她上进求学、读书深造的热望，她“费了无数的眼泪、哭泣、哀怨、吵闹”，“甚至拚上一条小命”，以自杀相要挟，才争取得到读书的权利。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第一女师。在师范三年六个学期，年年第一，各科成绩优异，且能诗会画，每到年节，一些老师、家长向她求诗索画。那时为民国初年，女孩崭露头角真是凤毛麟角，“女师有个苏小梅”，“江城才女苏小梅”在斗大的安庆城，可谓家喻户晓。

以“五四人”自命

1917年在女师毕业后，遂留附小任教。1919年暑假，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苏雪林毅然放弃小学教员的职位，赴京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与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黄庐隐、冯沅君同在一班，亲列新文化先驱胡适、李大钊门墙受教。渊渊如海的古都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她的整个心灵都被一种



面市的苏雪林部分著作

从未经历过的狂飚突进的新思潮所鼓动，直到晚年她都难忘这一段影响她一生的求学经历。“每天我们都可以从名人的演讲里，戏剧宣传里，各会社的宣言里得到一点新刺激，一点新鼓动。我们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破坏。”“我是从‘五四’思潮里翻滚过来的人，‘五四’对我影响巨大。”1919年10月1日，她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对旧社会里妇女非人生活提出控诉，号召全社会的人都要从恶社会里拯救妇女同胞，使她们能过上人的生活。她还用白话文在校刊上做了一篇短篇小说《童养媳》，对乡村中至今还蓄养童养媳之陋习与罪恶进行揭露，“辛酸刻骨，悲风满纸”。接受新思想熏沐的苏雪林，以“五四人”自命，用了许多笔名向报刊投稿，并与同学周寅颐应《益世报》编辑成舍我之约主编该报《妇女周刊》。五四后盛谈的妇女解放、女子享有教育权、继承权、经济权等，她都诉诸文字予以鼓吹。尽管她多用笔名，如灵芬女士、老梅、杜芳、杜若等（注：据她晚年告诉我说，只愿以文章与读者见面，不愿以作者本人与读者见面），但细心的读者从文笔文风上仍能判断她就是苏梅，请听七十年前的一段历史回声——

“这是不喜欢用自己真姓名而好多用笔名发表作品的一位女作家……五六年前的北京文坛（注：指1921年前），凡是提到苏梅女士，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的。当时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出了许多擅长于文学的女生，其中最著名的号称四大金刚（注：指苏雪林、黄庐隐、冯沅君、程俊英），苏梅女士是四大金刚之一”（张若谷《现代中国女作家》，载《真美善》女作家专号）。

1921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创办的海外中法大学在京沪粤三地招收留学生，即将由女高师毕业的苏雪林，又鼓荡起乘长风破万里浪赴海外留学的雄心，毅然报名应考，作为首批105名留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进入法国里昂艺术学院深造，先学美术，后改习文学。1925年留法归来后，一面教学，一面从事新文学创作，丰沛的作品，宛若一朵朵绽放的鲜花开

放在新文学百花园中。

一举成名的《棘心》和《绿天》

1928年署名绿漪女士的散文集《绿天》和1929年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相继面世，使苏雪林一跃而为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与冰心女士、沅君女士、丁玲女士、凌叔华女士并称为新文学最受瞩目的五位女作家。《棘心》之名取自诗经“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棘是一种生长缓慢的小树，木初生称为棘心，世人多以此比喻人之成长，需要慈母的深情养育，故称人子思亲之心为棘心。在这部长篇中，她以自己留学法国的经历，再现个人、家庭、社会乃至本世纪初的动荡时局，以如诉如泣的文字，抒写一位出自旧家庭同时又接受新思想的“五四”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苦闷、彷徨与追求，展现五四后知识女性面临人生抉择时的心路历程。尤其是作品主人公杜醒秋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和对慈母的眷念之情，鲜活感人，读来催人泪下。一位叫一萍女士的曾回忆当年《棘心》初版发行的盛况：“京沪爱好文艺的青年，莫不人手一册，有人结婚，送《棘心》是很时髦的礼品。”一年不到，《棘心》便风行大江南北，畅销十余版。已谢世的作家兼翻译家朱雯先生，当年就是读了《棘心》受其艺术魅力感染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今年去世的萧乾老人，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看了小说后，撰写《评〈棘心〉》一文在《辅仁杂志》上发表，成为最早评论苏雪林作品的作者。台湾女作家叶蝉贞曾回忆她上中学时读《棘心》的心情：“那时候我们读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风花雪月小说，读得无病呻吟起来，读《棘心》才感到一股真性情、真情感的热流，由心底蒸蒸升起。五四时代已过去七十多年，那个时代的面貌，即使是过来的人也模糊不清了，今天重读《棘心》，那个时代的人物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面前，从这些鲜活的人物身上，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棘心》后来在香港、台湾重印，近年又在大陆出版发行，说明这部开描写留学生生活长篇小说之先河的作品，其现实主义特征与艺术魅力、阅读的审美情趣和时代并进，永远受到读者的青睐！

《绿天》是自20年代末流传至今的一本畅销散文名著。叶圣陶先生30年代曾将集子中的《收获》、《扁豆》选入初中国文,作为全国中学生学习写作的范文。今日台湾国文课本也一直把《秃的梧桐》这篇优美的散文,作为中学课本的保留篇目。苏雪林是现代文坛公认的散文大家,六十多年前文艺评论家阿英就说过:“苏绿漪是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她的作品里,对于自然描写最为出色,成就特别高”。她以童心看世界,以自然、母爱为主题,率真清新的文字,轻倩灵活的笔触,牵着读者的手,走进自然的怀抱,去领略奥妙大自然勃勃生机以及带给人类无尽的遐思。精妙的文采,豪放的才思,娓娓动人的抒情,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与人性的芬芳。作者笔下学养深厚的智慧澄液,心中高雅充实的生命力,是她散文撞击读者心灵夺人共鸣的魅力所在。诚如老作家林海音所言:《绿天》实在是一本富有诗意的散文,我在中学生时代读它,和今天我做了祖母再读它,一样使我深得其味。

学术界的“福尔摩斯”

苏雪林自青年时代就对学术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她受业师胡适先生的影响很深,尤其推崇胡适“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获得学术上的新发现”的观点。她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是1927年出版的,那时她刚满30岁,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这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专著,自出版至今已过去七十多年,一直受到学界重视,书中许多观点仍频频被中外学人引述。

李商隐的诗,素以隐僻、别有所指难以读懂,尤以诸多《无题》诗,寄托遥深,神秘莫测,故元好问有诗慨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千余年来,人们解读李商隐诗,众说纷纭,未得真髓。苏雪林在精研李商隐全部诗作后,又据《唐书》、《通鉴》、《唐才子传》等史料,考其年谱、交游、成诗年代与写作背景,终于寻到了诗人恋爱的蛛丝马迹,揭出这位风流才子浪漫恋情的一大秘密:原来他诗集中那些为数众

多的《无题》诗,及《可叹》、《一片》有题等于无题诗,是有意用若明若晦的怪僻言辞的典故炫惑读者的眼光,剥去矫饰的外表,他的诗其实大部分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曲折委婉地写其一生的艳遇和恋爱事迹。唐代风气是很开放的,为什么李商隐偏要这样扭扭捏捏说些叫人猜谜的话头呢?苏雪林对此作阐释:李商隐以曲笔、隐晦的手法来抒写他的恋爱,实别有苦衷,因他恋爱的对象,非为寻常女性,既有女道士(宋华阳),又有宫女及嫔妃(卢氏姊妹——飞鸾与轻凤),如不加掩饰直笔昭明,不但对方名誉不保,杀身之祸即在旦夕之间,就连诗人自己的下场也可想而知。但作为一代情圣的李商隐,如何因危险而抹去这一段刻骨铭心、令他时时心动的恋情呢?毕竟他是位风流才子,不敢说又忍不住不说,于是呕心挖脑,制作了一首首巧妙的诗谜,他用教后人猜谜的方法,窖藏了他的恋史,但窖上却精心安置了一定的标识,犹如矿山上的一块矿苗,教后来认得这标识的人,去寻找矿脉,开掘宝藏。所以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算得上是千古情诗中别开生面、最值得玩味的杰作。读者若有兴趣,不妨读一读《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你一定会被苏雪林灵眼明敏,深探李商隐心曲的严密考证所折服,借助这把解谜的钥匙,去打开李商隐无题诗的八宝箱,你就可以明了唐代宫帏制度及女道士、宫嫔的生活之秘,也能深切体味到这位晚唐诗人“深情绵邈”、“哀感幽伤”之作的难言之隐了。《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先生对《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大加称赞,言该书索隐钩沉,严密考证,解决了李商隐诗疑已久的悬案,称苏雪林为“文坛名探”、“故纸堆里的福尔摩斯”。

屈赋研究的新发现

如果说《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仅是对一位诗人的专题研究,那么苏雪林对屈赋的潜心研讨,则是对战国文化、上古神话乃至中国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的综合考察和探讨。

富有生气而又具开放人文精神的战国文化,诞生了一位伟大诗人屈原,这位楚国精英撰

写的“奇文郁起”、“精采绝伦”的二十多篇辞赋，引起后人广泛研究的兴趣。自东汉王逸肇始，两千多年来注疏蜂起，注家人才辈出，但所有解读者都沿袭一条传统的治学路径，以《说文》训诂为主，角度始终固定在本土文化圈中来研讨战国文化，疏解屈原作品，无视域外文化对战国文化的影响；在探讨屈原作品文内之意与文外之旨方面，不免有雾里看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局限，对某些渲染浓厚异域文化色彩的篇章，解释就牵强而失圆满，不能令人信服。比如，《天问》一篇，文字生僻深奥，文理瑰诡慧巧，文思幽秘神邈，文彩丰赡雅丽，典故出处又多不见中国经史，注者纷说，莫衷一是，臆测与迂曲附会之见，就势所难免了。

1980年83岁的苏雪林向世人奉献了她积50年之久精研屈赋的成果《屈赋新探》。这部180万字的宏篇巨著共分四集，第一集《屈原与九歌》，第二集《天问正简》，第三集《楚骚新诂》，第四集《屈赋论丛》。在这4本巨著中，她独具慧眼，另辟蹊径，不蹈前辈学人治学在中国正经正史的故纸堆里皓首穷经的旧辙，以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的新视野，对屈原作品进行东西方跨文化研究；以域外文化——西亚两河流域、波斯、埃及及古巴比伦、印度、古希腊文化中的宗教故事、神话传说、天文、地理、历史等与战国文化作比较，探讨西亚古文明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关系，把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中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源流演变、脉络分明的系统，并据20世纪考古学关于人类文明的新发现，居世界大文化的高度来审视战国文化。这种宏观与微观的多视角立体研究，亦即把屈原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放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座标上来对照，这种扩大研究资料范围，着眼于世界文化的治学路线，寻求文化发祥源点的方法，可以说找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正确路线，并由此揭示了屈原作品中罕为人知的奥妙——蕴藏着丰富的域外宗教和神话。她在《屈赋新探》中提出：世界几支文明古国的文化同出一源，发祥于西亚两河流域，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的一支，且处于文化冢子的地位。“世界文化同源论”、“域外文化秦汉以前来华说”，是她研究

屈赋的两大发现，这一石破天惊的见解，揭幽探秘的智慧，言之凿凿的考证，奠定了她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卓绝地位，也充分展示了她中西文化学识深厚的根柢。中华文化的命脉，正是有像苏雪林教授这样老一辈学人，矻矻以求，延绵传承，才得以发扬光大，炳耀千秋。为此，总部设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1993年4月向苏雪林颁发资深敬慰奖，对她的卓越成就表示敬意与褒奖。

她的一生跨越两个世纪，在百年人生之旅中，她一直钟情于教育，播撒人文的种籽，呵护人类希望之花朵。自小学教到大学，除了中途两次赴法国留学，一直未离开杏坛。她先后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去台后又在台北师范大学和台南成功大学执教，直到1973年75岁高龄时才放下教鞭。退休后的苏雪林教授退而不休，仍孜孜笔耕砚田，继续写作与研究。她自十多岁开笔，到百龄因骨质疏松症不能握管，才被迫放下，写作生涯绵延几近九十年。历史忠实地纪录了她非凡的业绩：出版著作五十多部近二千万言，中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绘画、传记、翻译、文艺批评与学术研究，几乎包容了文学艺术的各种门类。她是一位集诗人、作家、画家、学者、教授于一身的奇人和才女，在学术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她是一位极具魅力与个性特征的人物。

人们会惊异，是什么力量使她有这种与时代并进的非凡创造力，在诸多领域取得令常人难以企及的丰硕成果？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文艺之神，拨醒我心灵创作之火”，是“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使命，迫我矢志以求”，“我要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绞沥出来，以宝贵的生命去兑换艺术的完美”。综观她的一生，她正是以豪迈的民族激情，赤诚的爱国信仰，勇往直前的殉道精神，去抒写自己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她晚年与衰老、疾病抗争，不甘心放下笔的顽强斗志，最令人感怀。九秩大庆时，教育界的同仁和文艺圈中的新老作家为她贺寿，她豪情满怀地对来宾说：“有生之年，还要创作！”两年后她的散文集《遁斋随笔》面世；九五华诞前夕，她忍着

摔断腿骨的痛楚,仅用数月时间,就写出文情并茂的传记《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九八高龄时,又相继出版研究诗经专著《诗经杂俎》与山水画集《苏雪林山水》;去世前十天,台湾成功大学为庆贺她 102 岁生日,出版了 15 巨册 450 万字《苏雪林日记》。

魂归故里

“文字醺醺多古情,荷衣说艺斗心兵;梅魂菊影商量遍,竟至虫鱼了一生”(见《灯前诗草》)。这首诗道出了她一生与文学结缘的深情。手中有笔,心中有爱,肩上有担,不因年迈而弃置文学和学术研究为生命的理念,以飞蛾扑火般的执著从事创作与研究,去做一名艺术忠臣,这份真诚和热情,令人动容,催人感奋!六十多年前,她在为学生青年诗人王佑才的诗集《蝉之曲》作序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文学艺术家的使命,是要在荒地上撒布花种,在沙漠里掘开甘泉,我们要把这个荒凉的世界打扮成锦天绣地的乐园。”

她是一位与生命打过苦仗的人,少年时代求学奋斗,青年时代不美满的婚姻(她 28 岁与家庭包办的夫婿张宝龄结婚,不久二人即分居,未有子嗣),中年颠沛流离,晚年独居孤寂。平常人遭此处境,或许会消磨斗志,一蹶不振,但她却能以顽强独立的精神,诚笃淡泊的态度,面对多舛的命运,傲然挺身,走过生命的每一段历程,老来接受生命授予的荣誉奖章。自 1975 年照顾她 40 年的胞姐过世后,她一个人独立生活二十多年。尤其是 90 岁后,衰老、病痛、骨质疏松症折磨她,骨盆摔裂、腿骨摔断 5 次,靠钢钉固定,只能扶着铝制起步器,在室内稍作移动。她一生节俭自奉,简衣蔬食,保持皖南女性朴素持家的美德,从来舍不得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但是当朋友、学生、亲属经济窘迫时,她却倾囊相助。诗人朱湘狂傲孤僻,30 年代初南北飘流,她两次馈金救助;50 年代留法女画家潘张玉良贫病交困,她即时汇钱寄药给这位昔日里昂艺术学校的老同学。1937 年 8·13 淞沪之战,她目睹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抗击日军的悲壮场面,毅然

将自己嫁奁、薪俸与稿费买的两根金条(重 50 两 3 钱)捐作抗战费用,此事曾见诸《国闻周报·战时特刊》,举国传为美谈。

1998 年 5 月,度过 101 岁生日的苏雪林,强烈萌动回归故乡的愿望。在她得意门生唐亦男教授的安排下,她坐着轮椅,飞越海峡,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祖国大陆,经合肥过芜湖,到达魂牵梦绕的故园太平岭下,她自 1925 年离开故乡,到此番归省,悠悠 73 个年头的思乡梦终于圆了。在祖屋桂花树下,她盘桓流连,神情专注地凝视这里的一草一木,当年豆蔻年华的她,曾在树荫下读书画画;在家塾“海宁学舍”里,尽管屋内空空荡荡,昔日读书的桌椅不存,但格局仍是旧时模样,触景生情,脸上漾着一丝笑意。90 年前 13 岁的苏小梅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写下她第一首《种花》的七绝,那脸上掠过笑容,是她在经历百年人生、重归故里后最快慰、最舒心、最圆满的瞬间定格!

5 月 28 日,苏雪林兴致勃勃地乘缆车登临黄山北海,纵览黄山云起云飞的绝佳美景。她年轻时游过黄山,中年时写过黄山画过黄山,晚年又常在梦中神游黄山,没有想到能在 101 岁时重睹黄山群峰的秀色。风景区的人告诉我,文化老人苏雪林先生是登上黄山最年长的贵客,打破了刘海粟 95 岁登黄山的纪录,跟踪采访的电视记者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时间是 1998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1 时。

1999 年 4 月 21 日下午 3 时,苏雪林病逝于台南成功大学医学院。临终前她留下遗言,骨灰运回太平,安葬在其母墓旁。1999 年 8 月下旬,海峡两岸苏雪林教授学术研讨会在先生故里太平举行,两岸六十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百多位专家学者聚会太平,进行为期三天的学术研讨。会后与会代表乘车赴岭下苏村,参观苏雪林故居并举行灵骨安葬。墓地位于祖屋一箭之遥的风形山上,墓碑为黑色大理石,正面镌刻:“苏雪林教授之墓”,背面的碑文八个大字:“棘心不死绿天永存”。这是故乡及后人对她一生最精辟的概括。安息吧,苏雪林教授!您丰硕的文化遗产,值得海峡两岸千千万万读者承传含咀,永远的追思!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孙中山 四处台湾



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同祖国宝岛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四次访问或过境日本霸占下的台湾岛，在台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曾激发起台湾民众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在他 75 年前 3 月不幸逝世时，期盼中国革命成功从而摆脱殖民统治的台湾同胞，对他们十分崇敬的一代伟人，表达了深深的哀悼。

孙中山心系宝岛

1894 年，孙中山创建推翻清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翌年清朝政府甲午战败，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两年后，革命党人陈少白向孙中山谏言：到台湾去活动“以联络那里的中国人，发展势力”。经孙中山同意，陈赴台并在台北秘密发展数名会员，于 1897 年冬建立了兴中会台湾支会。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兴起，孙中山乘机在广东积极筹划惠州起义。当年 9 月 25 日，他独自从日本到达台湾，在台北新起町设立指挥所，从日本运送军械、武装人员和经费到祖国大陆，并拟“观察华南局势”俟机潜返内地；同时，他已在日本友人山田良政

建议下，争取到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协助。孙中山抵台时，受到儿玉等日方官员的迎接。10 月 8 日，孙中山在台北指挥了惠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也取得了活捉清将杜凤梧、缴获洋枪七百多支、子弹五万多发的胜利，冲击了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

儿玉源太郎等人所以愿意协助孙中山，一方面是日本联军侵华，清朝政权岌岌可危，日本政界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抱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期望；另一方面，是企图借用孙中山的声望，帮其稳定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但正当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继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不准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人继续保持联系，致使孙中山在台扩展革命的计划落空，不得不于 11 月 10 日离开台湾，孙中山首次的台湾之行，历时 44 天。

1905 年 8 月，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建立了同盟会。1910 年 7 月同盟会台湾分会宣告成立，成员曾发展到 76 人，因受日本当局的排斥与限制，分会成立 4 年后，被迫宣告解散。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军阀袁世凯出卖革命，孙中山组织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从福州取道台湾东渡日本。途经台湾时，日当局畏惧孙

中山与民众接触而掀起台胞的民族情绪，因此警卫森严。孙中山为此闷闷不乐，短暂停留后即离台。在台北住过的“梅屋敷”旅社，现改建为台北市国父史迹纪念馆，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孙中山赴台历史遗址。

1918年，孙中山发动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护法运动（即所谓“三次革命”）失败后，再次由汕头经台北东渡日本。当时，他很想与台北同台胞会面，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唤起台胞的民族意识，鼓舞他们的爱国精神。但日本当局用种种办法阻止他同台胞见面，而不得不于次日离台赴日。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促成“国民会议”召开以共商国是，自广州乘船北上，途中经停台湾但未上岸。这是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旅经台湾之行。

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年出版的《台湾省通志》刊载，孙中山在病中曾留言：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在台湾实行自治等。说他“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心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孙中山

为中国民主革命鞠躬尽瘁以及他对台湾同胞视为一体的关注，在爱国台胞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台胞尊崇和寄望的伟人

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台湾民众自1912年至1915年，先后于南投、嘉义、台中、台南、苗栗和台北等地，发动多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暴政的武装起义，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仅1913年同盟会成员罗福星在苗栗发动的抗日起义，被捕者即达1211人。罗福星在慷慨就义前留下了大义凛然的“自白书”，其中有四句藏头诗：“孙真国手著光唐，逸乐丰神入既章。仙客早贬灵妙药，救人于病身相当。”每句第一字合成“孙逸仙救”。孙逸仙是孙中山的号，罗福星在临刑前仍念念不忘孙中山，足见抗日志士对孙先生的崇敬和期盼。

1920年前后，在中国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影响下，台湾知识分子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把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的成功。2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新青年》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文中所谓的“中国革命”，指的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1923年创刊于日本，后转移到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发行的《台湾民报》（周刊），是当时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对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喉舌。该报1925年2月出版的一期中，曾发表题为《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文章，详细报道孙中山北上北京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盛况。在其后的一期里，又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



1925年孙中山逝世，台湾台中市民开追悼会

确》的报道，文中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说：“去年（即1924年）我们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伟人，俄国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的大革命家从此世夺去，那死神也未免太无情了”。文章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说他“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打仗，屡扑屡起，愈穷愈强，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实为中国所绝无而仅有。”

由于受到孙中山革命行动、理论学说和人魅力的影响，一些台胞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如世居台湾的雾峰人林资铿，在甲午战后变卖台湾家产，迁居厦门鼓浪屿并恢复了中国国籍。林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深为气愤，遂以家产资助孙中山并参加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曾任国民革命军闽南军司令，后任大元帅参军、孙中山侍从武官和大本营参议。1925年在闽南被军阀孙传芳部下杀害。又如台北人李友邦，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另如1926年底，曾有一些台湾青年从日据下的台湾来到祖国大陆，集聚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东，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后改组为“台湾革命青年团”，号召台湾青年参加祖国的革命运动，以达成打倒统治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

“哭望天涯吊伟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被日本占领达30年之久的台湾岛，引起台胞一片哀恸。《台湾民报》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说：“西望中原，我们禁不住泪泉满面了。”该刊不惧日本统治当局之忌，公开表露出中国人悲从哀来的真情。

台北民众团体也立即筹措召开追悼会。当时，日本第10任驻台总督伊泽多喜男不敢公然禁止追悼会的召开，便设法刁难和限制，日本警察传讯民众团体主事人，将追悼会的三项内容取消，即禁止朗读悼词，禁唱悼歌，不准演说。

但胸怀祖国、不畏强暴的台湾同胞，于3月

24日晚在台北文化讲座（现为台北市贵德街第9号、10号水门一带），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民众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评议员施至善首先致词，文协理事王敏川叙述孙中山生平，继由台湾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台湾民报》编辑张我军介绍孙中山临终情形。会上致词的民众团体有台湾有志社、台北无产青年会、台湾文运革新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等。

被日本警察禁止宣读的悼词，是由张我军用白话新诗形式写成，共50行485个字，强烈表达出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关心中国革命前途和崇敬孙中山的心声。诗中写道：

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暗淡无光了！……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西望中原禁不住泪落滔滔了。……中国的同胞哟！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哪！先生的肉体虽和我们长别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义，是必永远留着在人类的心目中活现。先生的事业，是必永远留着在世界上灿烂！

被台胞尊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为追悼会写了挽联：“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泉遗恨定难消。”

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至1929年6月南京中山陵建成举行“奉安大典”为止，台胞每年3月12日都要举行悼念活动。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时，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曾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表示台胞要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加倍努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在提出的口号中有：“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等。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心系宝岛台湾，而日本统治下的广大台胞对孙中山怀有深切的期盼和热爱，这反映出台海两岸中国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骨肉深情。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75周年的日子里，台海两岸同胞不应忘记这段重要史实。

（责任编辑 文 贤）

一座牌坊 三个时代的缩影

——“克林德”牌坊的建立与变迁

□ 赵友慈

进入中山公园的南大门，便有一座高大的汉白玉牌坊矗立在人们的眼前。牌坊气势宏伟，造型精美，四柱、三楼、蓝瓦、庑殿顶式，正楼阁坊上刻有“保卫和平”四个镏金大字。游人常常在此驻足，欣赏品味，摄影留念。

这座牌坊的身世极不寻常，它饱经风雨，历尽沧桑，是中国近百年荣辱悲欢的见证。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人击毙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掀起轩然大波，清朝政府派亲王赴德“谢罪”，建立克林德牌坊，为他竖碑铭志

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山东省兴起义和拳，烧教堂，杀洋教士，乃至仇视一切洋东西，斗争锋芒直指外国侵略势力。清政府采取“剿”的办法，曾派袁世凯到山东，与德国侵略军和教会武装联合，杀戮大批拳民。这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到1900年春，反帝爱国运动遍及长城内外和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加紧镇压，1900年4月，英国政府声明：如在两个月内不能剿平义和拳，它就要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样，以“铁手钢肠”向义和拳“问罪”。

6月，清政府眼见义和拳的熊熊烈火，已成燎原之势，无法扑灭了，不得不改用“抚”的策略，承认其合法，并更名为义和团。大批团民拥入北京，许多士兵也纷纷加入，各城门和交通路口义和团日夜盘查，官府衙门、贵族住宅、甚至皇宫都有义和团入驻。各国使馆人员和外国传

教士，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

列强见清廷已控制不了局势，决定直接出兵镇压义和团。在天津租界，英、美、法、德、俄、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八国组成联军，并于6月10日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径直向北京进犯。

面对外国军队的入侵，是战是和，清廷开了四天御前会议，慈禧最后站在了主战派一边。清政府于6月21日，发布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对外宣战的两天前，6月19日，清政府照会各国驻华公使，于24小时内离开北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函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延期离京，并要求次日上午九时答复。届时，各国公使未见覆文，德国公使克林德不愿中国人讥其恐惧而气势汹汹地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抗议。当他乘轿行至东单总布胡同西口时，适遇端



克林德牌坊。新中国成立后称保卫和平牌坊

王载漪的虎神营章京安海率队巡街，安海警告克林德停轿，克林德不理，安海举枪对准轿子，而克林德已开枪，安海躲过，即发一枪，将克林德击毙。

此前，克林德的双手已沾满中国人的鲜血。6月14日，义和团从德国使馆前经过，克林德指使德国士兵开枪，打死无辜团民二十多人。今天他被中国人击毙，原本罪有应得。可是，这一事件却成了列强特别是德国，与清政府“议和”时，威胁、勒索的重要借口。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无数民众遭屠杀，抢劫不止，皇宫、颐和园、三海及大量民宅被卷掠，仅法军统帅佛尔雷就劫掠珍宝40箱，日军掠夺户部所存库银数百万两，侵略军从颐和园抢掠的东西，用骆驼运往天津，连运数月。

到9月中旬，联军不断增兵至10万之众，由德国将领瓦德西统率，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北侵张家口，西扰娘子关。俄国则单独出兵17万人，侵扰我国东北。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屠杀义和团民不计其数。

12月22日，公使团（除前述八国外，又加上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提出“议和大纲”12条。条件之苛刻、对中国主权和社会危害之烈，都是前所未有。被侵略者吓破了胆、求降心切的慈禧，均一一“照允”。翌年9月7日，签订了几

乎使中国主权丧失殆尽的《辛丑条约》。

条约的第一条及附件二、三，都是与克林德被杀有关的内容：“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

大使品品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条约的第二条也与此有关：将击毙克林德的虎神营统领、支持过义和团的端王载漪定为死罪，由于他是亲王，免其死罪，发配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

从此时起，视为中华民族耻辱的“克林德”牌坊，在北京的大街上耀武扬威了18年。直到1918年，它才改名、易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谓之“公理战胜”。“克林德”牌坊改为“公理战胜”牌坊。实际并未改变中国受欺凌的地位，从而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7月28日，奥对塞宣战。随后，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参战，与奥结成同盟国；与此同时，法、英、俄、美、日本等国也先后参战，称为协约国，与同盟国相对抗。仅三个月，奥、匈冲突就发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从欧洲蔓延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共有33个国家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经过四年多厮杀，1918年11月11日，以同盟国失败宣告战争结束。这次大战，死伤三千余万人，经济损失三千三百多亿美元，给参战国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战争结束后，协约国大肆宣传，“公理战胜，强权失败”。由于中国于1917年宣布参战，参加协约国集团，也是战胜国。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北京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克林德”牌坊被拆除，改名为“公理战胜”牌坊，并移到中央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

大战结束后，为了讨论处理战后问题，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的27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以战胜国资格派专使团参加会议。专使团的成员是：陆征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陆为首席代表，王为第二代表。专使团向会议提出七项“希望条件”：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



击毙克林德的安海

线无线电报机构、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和关税自由权。后又提出取消1915年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由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的和会最高会议,以中国的上述要求“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之内”为由,拒绝讨论。

接着,中国代表又提出处置山东问题,即要求日本将在大战中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我国。讨论这个问题时,日本代表公布了1917年初,日与美、法、俄、意四国背着中国签订的承认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所有权益的秘密谅解协定。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指出,中国参战时,即已宣布废除过去与德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决定牺牲中国。他们在邀请日本代表参加、不让中国代表出席的最高会议上,将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内容写进了《凡尔赛和约》。

“和约”中称:“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它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它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和约”的上述条款,对中国来说,实为丧权辱国,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从而引发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

中国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没敢在“和约”上签字。北京中山公园内那个令中国人尴尬的“公理战胜”牌坊,却保留了下来。这完全应了陈独秀1919年5月在一篇《随感录》中所写的:“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注: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条”作为和会的主旨,其中

有:“公平解决殖民地纠纷”、“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等),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陈尖锐地指出: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只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上,决定将“公理战胜”牌坊改称“保卫和平”牌坊,体现了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象征

30年后新中国宣告成立前的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以“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精神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1952年3月21日,我国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著名人士宋庆龄、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茅盾、廖承志等11人,联合发出电报,建议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建议得到该地区许多国家爱好和平人士的热烈响应,并于6月30日召开预备会议。当年10月2日至13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该地区37个国家的三百多位著名人士出席。一些国际组织也派代表参加,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妇女联合会、国际学生联合会等。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毛泽东给大会发来贺电。宋庆龄致开幕词,郭沫若作了题为《团结一心,保卫和平》的总报告。大会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等。为了表达与会国家广大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大会决定将北京中山公园内的“公理战胜”牌坊改称“保卫和平”牌坊,并由郭沫若为牌坊题名,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牌坊上那四个镏金大字。

至此,这座有着极不寻常经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牌坊,才找到了它真正的归宿,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 洛松)

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

□ 熊向晖

《炎黄春秋》1999年8月号(总第89期)发表了王瑀撰写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编者在文前加上按语说:“李克农是中共特别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本刊为纪念这位深潜魔窟建奇功的一代英雄,特别发表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瑀同志写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尊敬之情。”由于《炎黄春秋》刊载的许多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因此,王瑀的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

笔者曾在李克农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对王瑀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两项质疑。

质疑之一

王瑀的文章说:“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过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情报工作很重要、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

这确实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是如何对待的呢?王瑀是这样写的:

“那时中央社会部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突然见李克农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都哑了,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竟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一情报组织遭到破坏,王石坚及许多干部被捕,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他像大病一场。”

在王瑀的笔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始而“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继而“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后,“像大病一场”。根据这些生理现象,王瑀在文章中竟说:“这件事情使我体会到李克农对情报组织和情报干部关心之深,爱护之切。”这样的推断岂不是明显的牵强附会?

为了和王瑀对“这件事情”的描述相对照,现全文抄录《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第751页至752页——1947年10月3日和6日的记载:

10月3日 从合众社一日电得知,陈布雷之女陈璉与其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达前跑脱,致电罗迈、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李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他处。陈璉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

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10月6日 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同日，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正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周恩来，看到合众社的一则电讯以后，就连续发出一系列周到缜密的指示。作为情报部（社会部）副部长并实际上主持部务的李克农，怎么会像王瑋写的那样只是“痛苦和焦虑”而无所作为呢？怎么会连周恩来10月6日“望告”的电报也不答复呢？这使读者对李克农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

李克农当时采取的措施，事关机密，可能王瑋不得而知。但事隔五十多年，王瑋已当过副部长，撰写文章介绍李克农，文中又特别强调“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的“重大事件”，对自己仍不了解的事，总该查查档案，问问知情的人吧。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即主管秘密情报（包括“王石坚系统”）指导工作的罗青长，至今健在，记忆清楚，又是王瑋的老上级，为什么不向他请教呢？

1996年12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开诚著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该书第四十五章中写了1947年9、10月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大事件”，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时，李克农率领中情部机关人员住在晋西北临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知道这一严重事件后，十分痛苦和焦虑，一连十几天，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哑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像大病一场。”（第441页）

王瑋的记述在内容和措词上与上文几乎完

全相同，只是增加了“突然见”、“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以及“后来我才知道”等表示亲见亲闻的字句。但是，开诚在这一段之后，在同一页上，还写了以下的话：

“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李克农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进行检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吸取教训。”

只有简短的几句话，提供的资料并不多，远不足以说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从中也可略见李克农在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及时采取了措施。而王瑋却连这几句简短的话也不提。介绍李克农光辉业绩的文章，因何出现这样大的漏洞呢？这是笔者提出的质疑之一。

质疑之二

199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本报讯”，正题是《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十五周年》，副题是《本报五版刊登熊向晖同志文章〈周总理的魅力〉》。“本报讯”中称：“本报五版特刊载熊向晖同志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摘录：《周总理的魅力》。原文题为《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本报《海外版》自1月7日起全文连载”。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以下简称《地下》）记述了1937年冬，笔者遵照周恩来的布置，到国民党胡宗南部工作，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同笔者联系的中央社会部驻西安人员几经变动，1941年后长期由王石坚联系。1947年胡宗南资送十几名部属赴美国留学，其中包括笔者及王石坚联系的另两名我党地下工作者陈忠经和申健。1949年5月笔者回到北京，先见罗青长。《地下》一文中有一段记述：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不久，周恩来接见罗青长和笔者，谈到王石坚被捕事。《地下》一文的有关记述是：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

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当时周恩来考虑,把被囚禁的军统重要分子一、二人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

王瑀的文章说:全国解放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一一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按照“中组部领导同志指示”,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定为叛徒”(定为叛徒的四个人中并无王石坚)。

《地下》一文发表后,几位不相识的读者写信给笔者,希望了解王石坚尔后的情况。对此,笔者并无所知。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全文转载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该刊编者在《熊向晖一文有关人物简介(二)》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199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将笔者的几篇文章汇集成书,书名《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师》,在该书《地下》一文里,笔者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注释,第41条注释是:“据台湾报刊1991年材料,王石坚‘随同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笔者认为,“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已可说明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政治面目。《炎黄春秋》发表的王瑀的文章写道:王石坚“被捕叛变投敌,去台湾担任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亚情研究所少将所长,死心塌地,忠心事敌,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笔者阅后甚为惊讶。李克农于1962年逝世,他

生前已“报告中央”把王石坚“定为叛徒”,而笔者在1995年出书时对王石坚的注释中却未提这一点,尽管笔者事先毫不知情,但难免被认为是原则性政治性的错误。为此笔者特意询问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长期是李克农主要助手的罗青长,他郑重地告诉笔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农报告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原调查部长期主管机要档案的同志从未见过李克农向中央写的关于定王石坚为叛徒的报告,也从未见过中央关于此事的批件。

更使笔者惊讶的是,王瑀的文章还写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王瑀未说“个别领导”是谁,但笔者于1973年10月至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也有王瑀所说的“个别领导”之嫌。

笔者在此着重指出,以下两点,从未听王瑀讲过:

第一点:所谓王石坚“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

第二点: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两点都是政治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鉴于王瑀已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将他炮制的这两点公之于世,笔者有权利、有责任公开向王瑀提出质疑:有何根据?是何居心?

情报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大机密性,一般人视之为神秘。“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瑀同志写的文章”,题目又是“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发表在著名的《炎黄春秋》上,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笔者对王瑀的这篇文章提出两项质疑,一项是为了维护李克农的声誉,二项是为王瑀文中所谓的“个别领导”辩诬。同时借此向可能被王瑀误导的读者作些澄清。这是符合《炎黄春秋》“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今古大事”的办刊宗旨的。



炎黄春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革命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您若错过了邮局2000年期刊的征订日期，欲订《炎黄春秋》杂志，请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办理订阅手续。没有时间限制，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每月4日出版，16开本，内文80页，60克双胶纸；彩封，157克铜版纸。每期售价4.80元人民币。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电话：(010) 64072452 邮编：100007

欢迎订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我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因存书不多，恕不拆套分卷出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举行新春联谊会



1月21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集会，喜迎2000年新春佳节。

研究会会长费孝通出席并讲话。（右图）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本着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服务于祖国统一和四化大业的宗旨，广泛地开展了学术文化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2000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将举行包括“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新千年九九重阳龙的传人炎帝陵祭祖大典等活动，历时五年编辑的8卷本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料丛书《炎黄汇典》将出版发行。

会后举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新春联谊会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

画家彦涵夫妇携手共沉浮

台湾百岁女作家苏雪林

妇女运动先驱者李文宜

杀害项英的凶手刘厚总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581/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